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全球化與都市治理：  
臺中市的城市戰略與發展轉型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Governance: The Urban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of Taichung City

學生：徐志維 撰  
指導教授：楊友仁 博士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

謹以本書獻給

徐炳南先生與邱煥嬌女士

## 鳴謝

這本論文的誕生必須感謝無數人的協助與支持。基於人數甚眾，在此謹以兩位為代表：葉書齊先生與許瑞員先生，若不是他們在論文的緊要關頭之際慨然襄贊，協助補充、統整繁雜的資料，作者定將方寸大亂。當然，倉促草就的論文如有任何疏漏錯誤之處，文責概由作者自負。

尚有許許多多直接或間接在我的研究所生涯、學生生涯，甚至是整個人生當中，帶來各種幫助、教益與影響的人們(特別是我的指導教授和各位授業老師，更包含在各個方面給予我激勵和啟發的每位朋友與同學)。對於他們，我實在無法一個都不提及——不得不權以前述二位概括無盡的謝意，在此預先致上十二萬分的歉意。

截至今日，我受到太多的關愛與照顧，然而付出與表示的太慢、太少。內心總有一股焦慮要回應這些期待和敦促，反致自縛手腳和踟躕不前。試以這本不成熟的論文作為新的出發點，勉勵自身面對與正視眾人的期待和敦促，進而敏於為他人付出和帶來更多的幫助。

以此為謝誌。

2013年8月13日于東海大學

## 摘要

這份論文要旨，在於考察全球化、城市戰略與城市發展之間的關聯性。首先探討全球化、城市戰略與城市發展的相關討論，包含既有的經驗研究，並建立合適的框架和研究取徑(第二章)。進而以台中市為個案，試圖解釋台中市原有城市戰略與發展模式的路徑(第三章)。及至 2002 年後，面對發展瓶頸與區域競爭，台中市的城市戰略與發展模式如何應對，以及是否出現轉型 (第四章)。最後，嘗試研究台中市近二十年來社會空間再結構的狀態，以評價城市戰略對社會空間的實質影響(第五章)。

研究認為臺中市全球化戰略的形構與擴張，同房地產的榮景彼此呼應，進而互相形構：臺中市的文化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戰略與空間(房地產)全球化戰略提供房地產行銷的熱門題材。我們分析上述三種全球化戰略的項目和內涵，並嘗試指出該新型戰略，實際上很可能仍是延續與過去相似的發展路徑。在時空條件互異的情形下，當前面臨的風險更遠而甚之，該風險主要並非源自經濟或文化全球化穿透程度加劇，更多是區域內部空間分異的展現。

## Abstract

This paper's content, lies in between the inspection globalization, the urban strategies a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First, we discuss the related discussion of globalization, city strategi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already used(Chapter 2), then take Taichung City as our case study,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city strategies an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aichung City(Chapter 3). Then after 2002, facing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s of Taichung City, the city government how how to creating a new developmental model or transformation(Chapter 4). Finally, we try to study the soci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Taichung City in nearly two-decade(Chapter 5).

Our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Taichung city's globalization strategies, are not only effected by but also echo each other with real estate boom. Strategie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 and spatial (real estate) globalization are providing popular theme for the real estate marketing.

We are trying to exploration the new development model of Taichung city, including the project and connotation of above three kind of globalization strategy. In fact, that "new development model" or "new strategy" probably still walked on the path of the past similar development way, and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urther risks and so. The main risk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penetration degree aggravate, but more presented the view of inter-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Taichung city.

##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3
1-1 引言.....	3
1-2 基本背景.....	4
1-3 前提概念辨析.....	5
1-3-1 城市.....	5
1-3-2 戰略.....	5
1-4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6
1-5 研究方法.....	8
1-5-1 延伸個案法.....	9
1-5-2 全球化的方法途徑：觀念—行動分析.....	10
1-5-3 小結.....	12
1-6 個案說明.....	12
1-7 章節安排.....	13
第二章 全球化與城市.....	15
2-1 全球化的各項爭議.....	15
2-2 城市的等級與世界/全球城市.....	18
2-3 發展型國家與城市轉型.....	21
2-3-1 發展型國家與城市機遇.....	21
2-3-2 城市轉型與城市治理.....	24
第三章 臺中市發展的歷史路徑與模式.....	28
3-1 草創時代.....	28
3-2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895 年-1945 年.....	30
3-3 戒嚴前期：1945 年-1977 年.....	35
3-4 戒嚴後期：1977 年-1989 年.....	38
3-5 巔峰與衰退：1989-1997 年.....	42
3-6 小結.....	47
第四章 臺中市的全球化戰略.....	50
4-1 臺中市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困境：1997 年-2001 年.....	50
4-2 領導、願景與戰略.....	53
4-3 文化全球化計畫.....	57
4-4 經濟全球化計畫.....	60
4-5 空間(房地產)全球化計劃.....	64
4-6 小結.....	67

第五章 結論.....	72
5-1 總結.....	72
5-2 研究限制與建議.....	75
參考文獻.....	76

## 表目錄

表 1-1	實證科學與反身性科學對照表.....	16
表 2-1	亞太區域的服務工業(service industry)政策模式(1978-2003).....	33
表 3-1	臺中市管內職業別戶數(臺中市管內概況昭和 12 年.....	41
表 3-2	臺中市各期都市計畫之計畫年期、面積(公頃).....	44
表 3-3	公辦市地重劃成果統計.....	47
表 3-4	民選後臺中市歷任市長與相關弊案.....	57
表 4-1	2001 年以前臺中市都市發展地位、性格與戰略目標.....	62
表 4-2	臺中市兩任市長領導風格(形象)比較表.....	64
表 4-3	臺中市近十年的城市戰略和城市定位.....	64
表 4-4	近年臺中市獲選國際城市治理評比獎項.....	65
表 4-5	近年臺中市參與、主辦重要國際會議.....	65
表 4-6	近十年已開發臺中市大型土地開發案(BOT 案).....	72
表 4-7	臺中市預計於 2012 年之前辦理四大指標性促參案件.....	73
表 4-8	地景命名學之「臺中建案化」.....	74
表 4-9	胡志強時期--臺中市政府提出之重要計畫與爭議.....	78



## 圖目錄

圖 1-1	臺中市與「全球」：城市的航線網絡示意圖.....	20
圖 1-2	研究路徑與架構圖.....	21
圖 3-1	臺中都會區都市體系示意圖.....	36
圖 3-2	描繪自 1904 年臺灣堡圖的臺中盆地聚落關係圖.....	38
圖 3-3	1901 年市區改正圖.....	40
圖 3-4	公辦重劃區分布圖.....	50
圖 3-5	臺中市都市計畫圖(第二次通盤檢討).....	53
圖 3-6	1976 年-2010 年間土地增值稅折線圖.....	53
圖 3-7	1980-2000 年各省轄市每年文化支出佔所有支出.....	54
圖 3-8	我國土地規劃與管制體系.....	56
圖 4-1	「讓世界看見臺中」-臺中市的國際盛會之夢.....	70
圖 4-2	「全球運籌中心」.....	71
圖 4-3	「市 113 公有市場用地」專案開發基地位置圖.....	73
圖 4-4	1985 第 1 季-2007 第 1 季 全臺房地產景氣對策信號趨勢圖.....	75
圖 4-5	七期重劃區豪宅一景.....	76
圖 4-6	臺中市城市戰略與房地產題材關聯之一.....	77
圖 5-1	1994-2010 年國外遷入人口逾千人縣市折線圖.....	83
圖 5-2	1994-2010 年國外遷入人口逾千人縣市折線圖(扣除台北縣市).....	84
圖 5-3	臺中市重大建設示意圖.....	85
圖 5-4	1998-200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折線圖.....	86
圖 5-5	1998-200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佔總人口比值折線圖.....	87
圖 5-6	1998-200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佔總遷入人口比值折線圖.....	87
圖 5-7	199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佔總遷入人口比值統計地圖(示意).....	88
圖 5-8	200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佔總遷入人口比值統計地圖(示意).....	88
圖 5-9	1999-200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集中指數折線圖.....	89
圖 5-10	1999-2008 年國外遷入逾千人縣市人口集中指數折線圖.....	90
圖 5-11	2000-2007 年各區綜合所得變異係數變化折線圖.....	91

# 第一章 導論

## 1-1 引言

從紐約到東京，自倫敦至上海，近二三十年來似乎正在走上相似道路：金融化、國際化，高牆深院的門禁社區、櫛比鱗次的商貿中心、各式爭奇鬥艷的巨型建設，以及反覆建構的文化論述...等等不斷累加在這些大城市之上。由此來看，城市似乎正在邁向全球化的同型道路。對此，城市研究者多有爭辯，動輒以跨國比較方式試圖分辯此一命題。本研究將探討全球化對城市戰略與發展形成何種影響，特別是城市政府在既有的路徑依循(全球/國家/在地)外，要如何因應全球化的衝擊；以及採取當前學界較少涉及的視角，即選擇一座次級城市(臺中市)做為我們的實證案例。

城市一方面被動的承受、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城市發展出自己的全球化藍圖，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不同城市是否擁有同一張全球化的藍圖？是否最終都步上相似的全球化道路？在這裡我們必須同時關注全球化如何形塑城市政府的戰略，該戰略是否影響其實際行動與作為，城市政府在全球化與在地社會之間的折衝過程，以及此一過程展現出來的發展路徑又是如何？

對於城市政府的領導者而言(合民意代表)，未必真有一套清晰與正式書面的「全球化戰略」，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城市的領導者時常受限於視角、格局與結構性限制，所謂「全球化戰略」大多數更像是一種滯後反應的集合。然而全球化戰略有時也深具能動性，所在城市的全球化程度(特別是經濟與金融方面)縱使不深，城市政府重要的公共論述、政策與建設規劃仍可能勾勒出某些全球化特質。我們將會在這份研究中剖析此一現象，析論箇中脈絡與機制。

在全球化與城市的討論中，我們還會依循慣例，分析城市空間在此一進程的變遷，以及政府戰略與城市空間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有別於一般全球城市(global city)討論下的個案，本研究擇取個案的經濟全球化穿透程度相對較淺，我們由此更能將目光集中在城市政府戰略的觀念來源與影響之上。

## 1-2 基本背景

近年來在城市研究的領域中，全球化業已成為重要的中介變項與應變項。全球化作為一個深具爭議性的命題，並未妨礙研究者、政策決策與執行者、企業管理者、投資人、旅客及普羅大眾對此的重視，乃至於賦予它重要的象徵意涵與實質影響力。在此可以說，當前我們面臨的不僅僅是一個「全球化時代」，也是一個「全球化概念的時代」(Held, et al.,2004)，若欲了解全球化對當前世界的影響性，除了透過考察全球性經濟、貿易、政治與技術實際上的流通與交流，全球化相關概念、論述與評論被地方「引用」、「轉述」及「再製造」的過程也是值得我們關注探討的議題。

應如何看待及分析全球化之於城市？首先全球化之於城市應放置在城市化進程來看待。在人類歷史中，城市化進程曾以不同模式出現和中斷，直到 19 世紀工業革命後，世界範圍內的城市化進程開始出現普遍性的發展模式，後人多將其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並稱。「現代化」的城市化進程主要體現在工業經濟與相應的政治制度與社會變遷，市場經濟鬆綁了鄉村人口，大量勞動人口與家庭湧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使得 19 世紀裡世界各個重要城市的人口增長率大幅成長(Kotkin, 2006)，特別是各國、各大洲重要城市間的貿易往來頻繁，甚至形成部分廣泛且日益強化的全球網絡與潮流的建立。這種全球規模的交通往來，已經不純粹是經濟趨力的形塑，政治與軍事力量的介入更是推波助瀾的關鍵。此後縱使屢有關稅壁壘、孤立主義的內縮性政策，迄今仍無法回到「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時代了。

隨著開發中國家持續高速的城市化，未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城市人口都將攀至高峰。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預估，到 2015 年全球城市化水平，已開發國家將達到 84%，開發中國家為 57%(World Bank,2000)。桑德斯(Doug Saunders)更在《落腳城市》中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人類徹底從鄉間的農業生活移入城市的世紀(Saunders,2011)，人口破百萬的大城市在未來將只增不減。在人口集中的同時，若干主要大城市做為全球網絡的節點，亦逐漸在區域甚至全球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等方面取得領導地位，之所以成為專門的研究對象，正是它們在眾多區域性核心間有著更高位階的功能與影響力。

要言之，全球化之所以會步入城市領導者的視野，與都市政權的利基有密不可分關聯性。面對全球化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衝擊，都市政權如要維持乃至擴大其發展基礎，可能需要正視全球化的影響。特別是伴隨高速世界城市化進程，全球城市的網絡體系亦因各式資本的積累集中而增強擴增其範圍，競爭與創新成為新世紀都市政權的共識與生存法門。

同時間發生轉變的並不只有城市的發展戰略，還有發生在城市空間面向

上諸多的爭議與評論。全球化並非萬靈丹，許多爭議與評論源自於對城市價值的看法歧異，特別是社會學界一般對政府創收利益的傾向抱持謹慎批判的態度。在全球化與城市政府的關係上，就有成長機器、企業城市與雙元城市...等等各種描述與分析。特別是雙元城市可能性的存在，為城市的全球化增長投射厚重的陰影：貧民窟與奢豪的門禁社區並存在一個城市中，教育、治安、就業、商業、公共服務有著嚴重的空間不均衡狀態，空間與階級上的極化令社會危機一蹴即發。這在國外早已不是新聞，2005 年的巴黎暴動與 2011 年的倫敦暴動似乎都在印證雙元城市下日益剝離裂解的社會空間。

相較於社會空間的衝擊，在城市空間中的都市地景更為直觀可辨。都市地景甚或都市奇觀，有時是私人企業的投資，也有純粹的公共建設，更多的是政府規劃、開放民間投資與經營(BOT)，是一座城市的外在意象及發展模式最具體的表現。都市地景興起(或是被扼殺)的過程，恰恰蘊藏著市場、政治與地方三者之間的競合關係。

### 1-3 前提概念辨析

#### 1-3-1 城市

「城市」一般指有明確行政疆界、政府組織的行政區級，例如臺中市即明指其作為中華民國五個第一級「地方行政區劃」及「地方自治團體」之一。根據《中華民國地方制度法》的規定，「在人口聚居達 125 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此處的「市」即「城市」(city)。「城市」做為研究範圍有明確的界線可茲辨認，其領導、主管單位，我們稱之為「城市政府」，則是在城市範圍內計畫和執行行政任務的行政機關，而城市及城市公民在此則為行政客體，由城市行政機關代理行使職權(行政主體)。

我們在討論關於「戰略」、「計畫」等用詞時，「城市」和「城市政府」至少表達下列三項前提：

1. 在具體行政範圍內的計畫、政策與建設。
2. 具體的行動者(代理行使公共事務，至少在法律位階上具有自主性和獨立性，儘管不如國家那般擁有威權及行政的合法性)
3. 在前兩點的範圍與治理(或管理)下的個人與群體之地理、文化、制度與社會

### 1-3-2 戰略

本研究對城市政府的探討主要放置在它的「戰略」之上。在過去的城市研究裡，城市戰略計畫一般以建議性和前瞻性研究的形式呈現，較少去考察城市及其政府既有戰略的形成脈絡、過程與後果。城市的「戰略」(strategics)有別於「都市計畫」(city planning)<sup>1</sup>與「政策」(policy)，通常沒有明確而一體的書面計畫，它毋寧是城市及城市政府在各種宣示、行動與影響的集合。在此我們對城市戰略的定義和 Peter Newman 與 Andy Thornley(2005)頗為類似，綜合前面的討論後，修正為以下定義：

1. 城市戰略係在特定城市範圍內施行。
2. 包含了明確的願景和使命的城市總規劃或戰略政策框架，也有戰略性並不那般清晰，但是能夠反應出城市政府戰略傾向的項目和方案。
3. 城市戰略不侷限在明文政策內，它廣泛的存在於政府的施政、宣稱、行銷用語，也可能反映在城市重要建設、都市計畫與領導者的管理特質等等。
4. 相較於具體政策的細節，對城市戰略的研究更專注在方向、目標和平衡，亦即它是如何被建立以及維持的。
5. 不過於糾結在單一政策與建設上，相關利益團體的博弈細節和治理網絡；而是著眼於城市戰略的成因、在整體且多重的治理層級與博弈關係中的動因與歷程分析，以及它的(宏觀)社會後果。

我們之所以使用「戰略」而非「策略」做為“strategics”的譯詞，則是想要指出所謂的「戰略」有其特定脈絡，它係在全球化進程及語境之下，遭遇經濟、社會和政治環境的夾擊，反過來從全球化進程及語境中找尋出路。因此「戰略」的面貌，它選擇強調特定議題，以及選擇忽略其他某些議題，均切實反映全球化對城市發展的再現與影響。同樣重要的，城市及城市政府反覆強調並試圖實現的戰略規劃也正在成為全球化內涵的一部分，並反饋至城市社會當中，我們亦可視之為「全球化戰略」的一環。

## 1-4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臺灣堪稱發展型國家研究中的重要典範之一，因而對於臺灣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過程，已有為數眾多的研究作各方面挖掘。在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脈絡下，各個民族國家無不面臨轉變，臺灣是否也不例外，以及若產生轉變或再形構，其作

---

<sup>1</sup>也譯作「城市規劃」，但是「都市計畫」在臺灣有特定的指涉。

為「後」發展型國家的面貌又是如何，漸成為近年研究的重心所在。

對於全球化，慣常理解為一種主要由經濟驅力推展下的過程。經濟、貿易的拓張跨越民族國家的邊際，同時帶動技術革新、組織重構與政治變化，進而塑造如今的全球社會的空間面貌。

可知全球化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進程，然而這個進程的方向性、驅力與具體過程仍是撲朔迷離。從世界體系論(world-systems approach) 到全球城市論(world city approach)，皆秉持經濟力與技術力是全球化進程核心的論點，認為全球化進程依照經濟力與技術力的積累差距，形成核心、半邊陲(次級)與邊陲(三級)的全球體系格局。

隨著二十世紀末新興國家的崛起，衝擊既有體系格局，全球化進程下的「秩序」似乎需要重新被省視。全球化進程確實持續發展中，卻在不同區域既產生一致性的步調(同型化)，也產生不一致的步調(差異化)。更明確的說，在核心、半邊陲與邊陲的擴散模式外，尚有力圖打破此一差異格局的驅動力存在，它(們)促使區域城市挑戰全球化進程的秩序(但不是推翻它)，進而改變全球化與國家發展的轉型。

由此，在全球化與國家發展轉型的議題中，新的治理層級與單位開始浮現，比如國際組織與城市政府(city government)。「全球城市」、「在地國家」與「企業城市」等等概念均是用以描述「城市政府」此一治理形式的再形構性質，此類概念的核心旨在「都市」(urban)或「地方」(place)層級，將「都市」或「地方」重新定位為治理架構下關鍵性的分析/行動單位。反映在民族國家疆域內，即是以集中化為主的國家統制，轉向以分散化為潮流的地方治理之過程。

全球化脈絡下，對於都市發展與治理有幾個研究取向越來越多人運用，一是經濟地理學式的論題，探討都市在區域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生產、消費、金融)網絡中進行的開拓、再鑲嵌與穩固其節點的策略與作為；二是在文化政策方面，探討都市的文化治理，對文化產業的經營，並如何介入象徵意義的爭奪場域之中。

經濟論述與文化論述既是都市治理欲爭奪和建構的對象，亦是都市治理成形與確立所不可或缺的資源。藉由掌握「新經濟」與「新文化」的論述，試圖納入都市治理的一環，以增益其治理性。全球化是當前形構「新經濟」、「新文化」乃至「新治理形式」最具正當性，也是最便利的理論工具。實際上全球化也賦予個別都市一定的經濟資本，以便在全球的政治和經濟網絡上佔據關鍵節點，從而成為不同位階都市心嚮往之的藍圖。

都市治理逐漸在全球化過程中浮現新的輪廓，並吸引眾多學科研究者的關注。當前對於全球化與城市發展的研究多以世界/全球城市為主，特別是在城市戰略方面，如倫敦、東京、紐約，或一國之內的核心城市(metropolis)，如北京、上海、首爾，以及臺北與高雄等，這類都市往往同時具有歷史性的積累優勢，更有中央國家的干預，較易形成全球城市的條件。過去對全球城市的關注正是放置在這些在經濟、文化、創新、人力、政治等資本最具實力的大城市之上(如紐約、倫敦與東京)，近期則掀起進一步探討崛起中的全球城市(globalizing cities)的熱潮(如香港、上海與新加坡)。然而對於更大範圍內的中小型都市而言，卻因為被認定不具成為全球城市的潛力而往往排除在討論之列。

然而城市的等級與網絡是動態的過程，不同層級或網絡位置的城市在全球化過程中各自面對新的挑戰與機遇。過去被排除在全球化與城市戰略討論外的「次級城市」正能增進我們對此動態過程的理解。次級城市(second tier cities)，特別是發展型國家的次級城市，未必擁有前述大城市的全球性資本，甚至缺乏國家資源，在這樣的環境侷限性與路徑依賴下，其呈現的全球化戰略為何，和它在這樣的戰略下的行動、計畫和發展模式是否相似於那些巨大的「全球城市」，以及中間遭遇的衝突、困境和轉折又是什麼，是本研究關注之處。

本文將問題意識與研究對象安置在發展的政治經濟學以及都市社會學的脈絡下，試圖在援引既有的城市研究與理論之外，以發展型國家、發展型社會的框架來反省西方的全球化辯證及城市發展經驗，更可藉以觀看發展型國家的城市政府是如何進行計畫、策略和論述模型、挪移與嫁接，從中呈現何種「治理性」。

綜合而言，我們的研究目的在於透過全球化戰略的考察，以臺中市的都市發展為研究對象，緊扣文化治理與經濟治理的區域論述、建構、鑲嵌和競合，以探討城市政府的戰略和發展依循的路徑，以及其對城市空間的再建構。

爲了指出在全球、國家、地方城市三者發展治理過程中曲折曖昧的辯證性，並理解臺中市的都市發展時現的衝突和弔詭，我們以當前學界在全球化與全球城市的既有理論與經驗案例的討論為經，以臺中市在過去數十年來的實際發展為緯，提出下列問題：

在全球的經驗與理論層面上，全球化對城市發展與城市戰略產生何種影響？是否出現同形化的趨勢？城市戰略如何可能影響城市發展？

在次級城市的個案層面上，台中市過去與現在的發展路徑為何？該戰略影響城市發展的機制和結果為何？

## 1-5 研究方法

### 1-5-1 延伸個案法

承前述的研究目的，我們試圖橋接全球化相關理論、國外城市經驗與臺灣個案之間的關聯性。受限於各種研究限制，無法直接使用不同城市案例間的比較方法來達成研究目的，而必須透過個案分析的方式進行。然而究竟如何連繫巨觀層次的理論與微觀層次的個案？對此我們預先進行方法論上的回顧與檢討，以保證本研究的可信度。

上世紀 90 年代，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界建立其霸權，迫使個案研究(case study)必須回應諸如「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等嚴峻置疑，Michael Burawoy 提出延伸個案法(the extended case method)以茲回應。不同於眾多拒斥實證主義、甚至反對「科學方法」的研究者，Michael Burawoy 的拓展個案法乃是以反身性科學(reflexive science)為理論基礎，試圖將個案研究與實證方法進行連結，指出了微觀層次到巨觀層次的道路(M. Burawoy, 1998)。

延伸個案法關注如何自特殊個案提煉出一般性，從而超越個案研究的侷限。Burawoy(1998)認為實證科學下的調查研究法無法擺脫脈絡效應(context effects)的問題，而以反身性科學為基礎的延伸個案法對此提供了替代性的方案(M. Burawoy, 1998)。

為補充調查研究法忽視脈絡效應的缺陷，Burawoy(1998)歸納反身性科學中的脈絡與對話(dialogue)要素做為延伸個案法的方法論基礎，衍伸出四項準則：介入(intervention)、過程(process)、結構化(structuration)與理論重構(theory reconstruction)。尤其是理論重構準則，使個案研究不再似調查研究法執著於通過隨機抽樣取得代表性，而是側重於將個案延伸至理論。兩種方法論的對照關係可見下表 1-1。

要言之，Burawoy 主張的延伸個案法，目的並非取代調查研究法，而是針對脈絡效應的缺陷，提出觀察者親身置入脈絡、正視個案研究中的「權力效應」(power effects)，與之進行對話，藉以補充實證科學的不足，有別於以往個案研究中濃厚的詮釋取向。

不過延伸個案法同時也是為了橋接馬克思主義與實證研究之間的鴻溝，其理論重構中的理論亦指馬克思主義，故而相較起實證傳統的解釋取向，延伸個案法



更加側重研究的批判面向，特別是對宰制性權力持有反身性的敏感。

延伸個案法在樣本稀缺及特殊提問的情境下特別具有啟發，亦於難以進行比較分析的情況時能夠提煉理論的一般性。以本研究而言，囿於經費與人力等限制，必須採取個案研究，而延伸個案法正好能在此補足方法論上面的基礎。

表 1-1 實證科學與反身性科學對照表

實證科學			反身性科學		
實證準則	調查研究法	脈絡效應	反身性準則	延伸個案法	權力效應
反應性	刺激/回饋	訪談	介入	從觀察者延伸至參與者	宰制
可信性	標準化	受訪者	過程	延伸至時間與空間的向度做觀察	沉默
可重覆性	穩定條件	田野	結構化	從過程延伸至結構	反對
代表性	母體抽樣 <sup>2</sup>	情境	理論重構	理論延伸	一般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譯自 M. Burawoy(1998)

總的來說，立基延伸個案法，我們能夠從個案出發，進而期望超越個案，甚至對整體進行進一步的認識與把握。並透過個案與理論之間的「折返跑」、交互參照而達到與理論對話的可能性。

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延伸個案法中「個案」的選擇十分重要。Burawoy 在介紹延伸個案法時，用他 1972 年針對非洲國家尚比亞在獨立後推行的「尚比亞化」(Zambianization)研究為例。透過參與觀察，Burawoy 研究殖民主業中進用尚比亞人替代外籍僱員的變化過程。該研究不僅僅分析了當下的生產關係，還將此一生產關係放置在時空軸中做分析，進而回應 Frantz Fanon 提出的後殖民革命理論(theory of “postcolonial revolution”)，提出更為細緻的階級分析(M. Burawoy, 1998)。

尚比亞個案相對於後殖民革命理論的重要性，在於 Burawoy 重構 Fanon 的階級分析，不僅是對該理論的印證，更是補充與擴充。在應用延伸個案法時，便是要帶著足夠的理論意識，力圖尋找現實(個案)與廣泛的歷史模式及巨觀結構之間的連繫。選擇的個案是否能夠凸顯這樣的連繫，以及研究者是否能時刻反思到該連繫，並展現在研究當中，遂成為延伸個案法成功的關鍵。

<sup>2</sup> 原文作“sample to population”並不恰當，在調查研究法中認為這樣並不足以令研究樣本具備代表性，更要通過隨機抽樣的手段來確保，隨機(random)甚至是調查研究法反應性、可信性、可重覆性與代表性的最高準則之一，然而 Burawoy 對此未置一詞。

## 1-5-2 全球化的方法途徑：觀念—行動分析

眾多學科及論述場域均使用全球化一詞來概括全球範圍內，各區域之間不斷增多的經濟互聯情形為首的重要變化。同時也造成不論怎麼定義全球化，還是難以掩飾它範圍廣泛，被跨學界以不同方式應用的多樣性面貌。

研究者必須在全球化的實存爭議之外，另闢新的研究取徑和研究工具，以避免陷入定義全球化的泥淖，以及全球/在地或流動/固著這類僵化的二元對立之中。研究者暫時擱置對全球化進行直接定義，它可能表現為多種特徵和傾向，而不是封閉性的結果，令全球化研究允許多元相對的、流動的、關係性的視角，在這樣的多元視角下，全球化的內涵和評價亦會(允許)因人而異。

McMichael(2005)就全球化的多種觀點，提出五種類型(有關全球化相關辯證，我們在第二章有更細緻的討論)：

- (1) 將全球化視為一個過程(process)：經濟式的定義——運輸和通訊成本大幅降低；傳統人為壁壘遭到破壞，跨界行動於是盛行(如 Stiglitz)。
- (2) 將全球化視為一個組織化原則(organizing principle)：解疆域化(如 Scholte)；去地方脈絡化、時間—空間重構(如 Giddens)；時間/空間壓縮的現象如(Harvey; Castells; Helleiner)；生命政治規訓的語式(如 Hoogvelt)；替代民族國家中心的、區域的與國際的既有秩序(如 Held)。
- (3) 將全球化視為一種產出(outcome)：歷史的無可逆轉發展階段，在此的世界是經濟整合領先於國家中心(如 Radice; Robinson)。
- (4) 將全球化視為一個時機(conjuncture)：視為在金融化(系統)下，後布列敦森林體系(post-Bretton Woods)的歷史性特殊國際關係(如 Arrighi)，或是動盪的國際金融系統之企業管理形式(如 Amin; Panitchl; Sklair)。
- (5) 將全球化視為一個計畫(project)：源自於新自由主義政治之意識形態的辯解(如 Gill; Cox; McMichael)，進而指涉「想像全球化」、「實現全球化」的相關觀念、規劃、架構、藍圖與戰略。

五種看待全球化的不同方式，代表的是理解全球化的至少五種途徑。當中 McMichael 提出將全球化視為一個計畫(project)，強調全球化作為思想觀念、意識型態，是如何影響政治經濟等場域，甚至成為支配性的行動規範。

全球化計劃係指在二十世紀晚期，全球化(globalization)取代發展(development)成為政治、商業菁英一系列的論述和計劃(McMichael, 2004)。全球

化計劃可以如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及 World Bank(世界銀行)那般的實體組織或國際治理體制,也可以如新自由主義和企業全球主義般,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觀念或意識形態。後者未必有清晰明確的方略,甚至同時存在有所出入的定義和內容,然而並不妨礙這些觀念在全球範圍內對真實世界的形塑能力。

不過爲了避免過度的結構主義, McMichael(2005)援引 Polanyi 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的方法,分析企業全球化(corporate globalization)及全球化計劃霸權下的全球反對運動爲多重的抵抗(multiplicity of resistances),仰賴的正也是全球化下方能浮現的反對運動網絡(net-work movement)。

McMichael 探討的雖是企業全球化及其反對運動作爲考察全球化特質的取徑,我們可依循他的思路,除了慣常的物質觀點,亦從全球化計劃的取徑考察城市的戰略,在此能將目光聚焦在全球化計劃對城市戰略的穿透過程,以及同樣重要的,城市戰略本身也證成、擴張了全球化計劃的內涵與影響範圍。

### 1-5-3 小結

爲避免僅僅是條列描述性的事件過程,而缺乏機制性的解釋分析,將從巨觀的整體層面出發,爬梳全球、國家與地方城市三個不同治理層級之間的歷史脈絡與相關概念、理論和爭辯。基於選取個案的特殊性,爲了更好的把握全球化對城市戰略的影響(或者說是城市戰略的全球化面向)和回應巨觀層次的經驗和理論,我們選擇觀念—行動分析,作爲我們考察全球化與都市政治的方法。

## 1-6 個案說明

在第二章我們將自全球的層面探討「全球化對城市發展與戰略」此一議題,並略爲述及發展型國家與亞太城市的全球化過程。同時,我們也關注 Markusen 所謂的次級城市(second tier cities)在全球化歷程中面臨的變化,並指出無論是理論或經驗層次,次級城市在全球化/全球城市競爭過程中的轉型和戰略抉擇,有其研究的重要性。

關於次級城市的類型, A. Markusen(1999)提出四種次級城市的結構: A.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以北義大利、矽谷和橘郡等具社會資本與制度厚實的區域爲代表; B. Hub-and-Spoke District (幅湊式區域), 以特定大型企業基地

為發展主力的城市如日本的豐田市、韓國的蔚山及浦項市；C. Satellite Platform District (衛星平台式區域)，為數個小型工業區環繞的城市，例如印第安那州的埃爾克哈特市、韓國的龜尾市、日本的大分市與熊本市；D. State-anchored Industrial District (國家定錨的工業區域)，即以仰賴國家主導、建設的工業區域。

過去次級城市作為新工業區域而崛起，特別在發展型國家，它們作為有別於首要城市的金融、政治功能，而是作為引領區域(甚至全國)產業發展、轉型的新工業中心(new industrial hubs)。然而在面對前述發展型國家於發展計劃崩潰的危機之際，在出口導向政策(export-oriented)下形構並發展的次級城市如何適應新環境的變動，以及在國家中心的經濟主義合理性漸次退位的同時，如何重構因應新全球計畫下的新都市主義和發展策略，確保都市的持續性擴張(和攻克、復甦其一時期內積累失敗的都市計畫)，並保持城市政府的相對自主性，是面臨區域競爭、後發展型國家的都市所身處的問題。

臺中市在全球化/全球城市的戰略競合的考察上，具有次級都市的重要性與代表性。首先，臺中市與臺北、高雄類似，既是當代臺灣最重要的都會區之一，同時長年以降均有國際化發展的企圖與政策。其次，臺中市具有稱之為次級城市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不同於臺北、首爾、新加坡等世界/全球化城市，次級城市面臨的是更加有限的資源、還有位處全球金融經濟網絡邊緣化的弱勢。第三，在城市治理、制度建構與文化形塑上，次級城市較首要城市更能分辨國家 / 城市介入的層次。第四，臺中市的政府結構在近年經歷了戲劇性變化，當中包含精省和合併升格為大臺中等歷程。最後，在臺灣三大都會(臺北、臺中、高雄)當中，臺中市的人口成長和稅收變化都有其特殊之處。綜合上述三點，試圖說明今日臺中市的特質並非自然生成，而是鑲嵌於特定的時空路徑之中，不僅僅是 M. Porter(1980)在討論產業群聚時的「國家內的特殊地方化」，更是全球—國家—城市在空間建構過程中的競爭和排除。

因此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本研究將以臺中市作為進一步研究全球化城市發展與戰略的個案。我們理由與目的是多元，而能符合 Burawoy 延伸個案法的要求：

1. 臺中市多年來致力提升國際能見度、與國際接軌和「走向世界」，其全球化戰略路徑清晰可見。
2. 臺中市獨特的發展背景、過程和位置，提供我們在全球化/全球城市研究上的有趣案例。
3. 相較於涉入經濟全球化程度既深的世界城市，或是後進國家的首要城市，後進國家中的後進城市為何/如何試圖趕超、進入全球網絡，提供全球化計畫視角的重要個案。
4. 透過臺中市的戰略規劃和實際發展的考察與闡釋，我們希望能解釋全球化的

動力，以及城市發展上的趨同/趨異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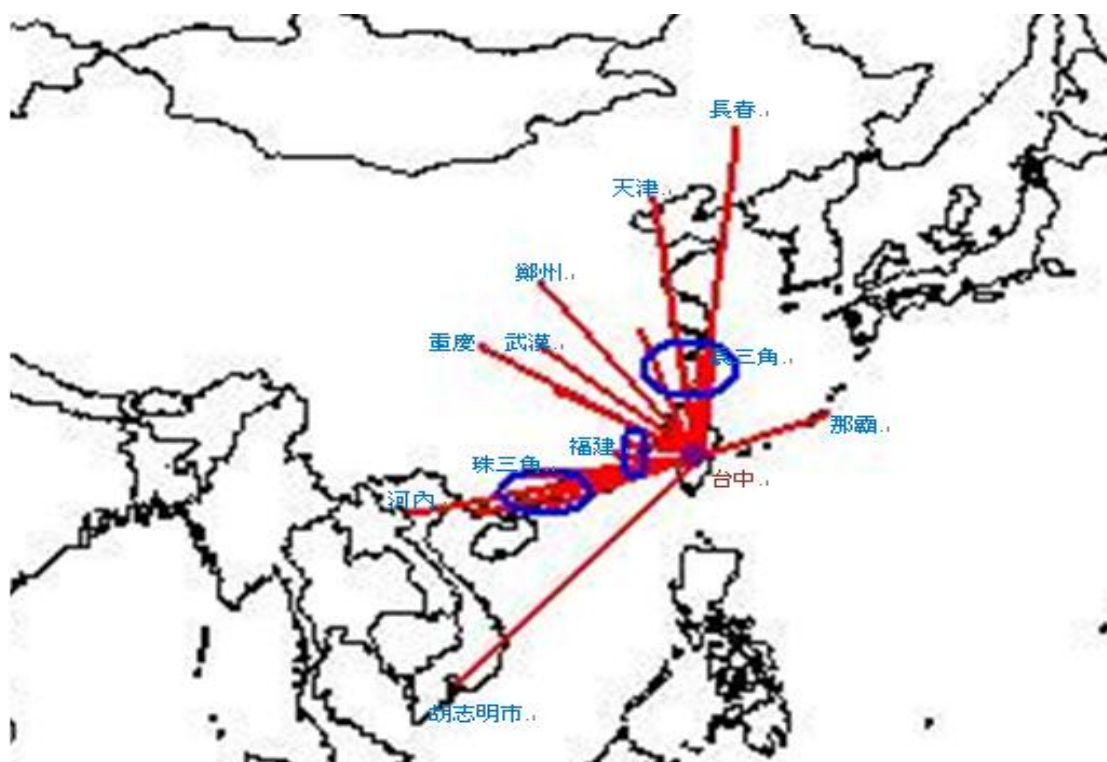


圖 1-1 臺中市與「全球」：城市的航線網絡示意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中航空站官方網站(2013)、本研究自行繪製

## 1-7 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內容可以分做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旨在對全球化、城市體系與城市發展進行系統的綜合分析，係將目前從西方到國內的相關理論與研究加以綜融討論。當中將會觸及一些其他城市的重要案例，可以做為個案研究時的具體參照，增益我們對選取個案的理解與評價。

第二部分是個案研究。我們將具體進行個案的歷程分析，描述該城市的發展趨勢和治理模式的演變，以及形成當前治理模式和發展戰略的可能因素。

根據前述的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本研究的分析路徑請詳見下圖 1-2。

首先在第一章的〈導論〉，透過對全球化與城市發展的簡單描述，發展出我們研究目的和研究路徑。為了能更加精準標定全球化在本研究中的要素，在第二

章探討全球化、城市戰略與城市發展的相關討論，包含既有的經驗研究，並建立合適的框架和研究取徑，並做為個案分析時的比較對象。第三章與第四章是個案研究，我們以臺中市作為全球化戰略深入考察的個案，按照時間分期，分章描述臺中市城市發展的路徑，包含基本的治理(政權)格局、領導人、重要政策、治理特性、遭遇的重大挑戰、巨型建設、願景論述、市政議程，以及使用的戰略手段。第五章則主要運用計量方法，檢證台中市社會空間的再結構樣態，以評價城市戰略對社會空間的實質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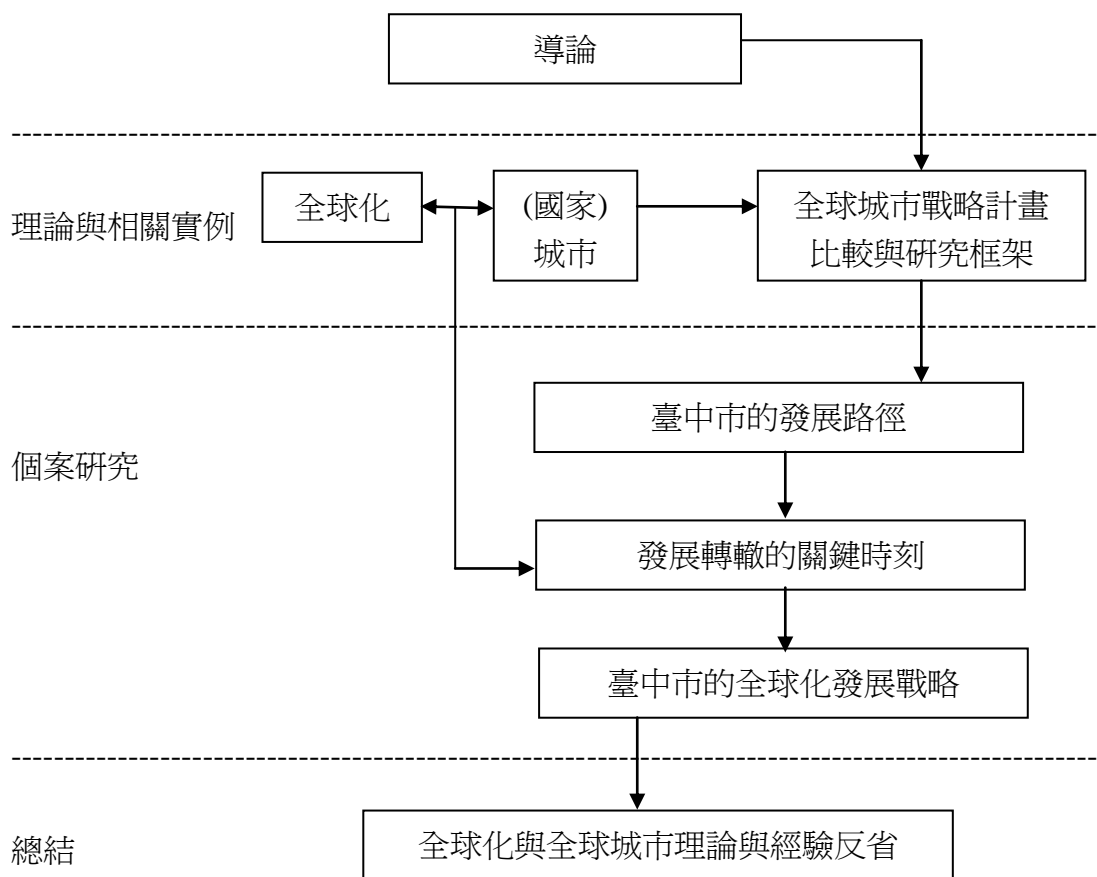


圖 1-2 研究路徑與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 第二章 全球化與城市

「全球化」一詞在今日被廣泛運用，以致於它顯得無所不包，無所不能。一如學習社會學時常聽到的一句話：當它什麼都能解釋，也就什麼也解釋不了。P. Dicken(2003)即稱全球化是這個時代的流行語，用以描述當前世界經濟發生的根本性變化，儘管其含義已經變得模糊。爲了能較好挖掘「全球化」在城市戰略與城市發展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爲了理解全球化改變了甚麼，影響了甚麼，以及可以使用哪些手段去考察，特別是眾多缺乏數據，未宣之於口，更沒有明文規章的全球化影響，我們將在本章節對既有的全球化與城市發展、城市戰略研究進行回顧。

在全球化與城市發展的議題上，除了全球與城市，通常還存在第三個治理層級：國家。事實上當前對全球化的學術討論，許多議題是延續舊有的近現代社會討論，比如城市化，再比如國際化。國家與地方，國家與社會等傳統民族國家的研究命題在所謂的全球化時代中亦是如此，國家並未真正引退消失，而是以不同形式參與在政治經濟與社會過程中。

從制度論的角度來看，全球化並非無差別的宰制一切，全球化實際上是以多維度的方式穿透和影響當前城市政治，其影響的方式和程度視在地既有的制度空間和路徑依賴而定，故而全球化並非憑空打造全新的政治經濟模式。因此我們將要先回顧全球化相關的議題與爭議(第 1 節)；第 2 節討論世界/全球城市相關的研究；最後第 3 節則討論國際政治經濟脈絡下的發展型國家及其城市的轉型。

### 2-1 全球化的各項爭議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最初很可能由 T. Levitt 於 1985 年提出(Cohen, R. & Kennedy P., 2000, 2001)，時值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工業消退」(Newman & Thornley, 2005)、福利國家體制出現危機、新自由主義廣泛影響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政策，以及舊有的國際體系出現巨變等等，我們開始討論民族國家範疇之外的因素，比如國際分工、跨國投資、產業外移、國際移民、弭平時空限制的資訊技術，還有生活周遭越來越明顯的外國文化象徵。

廣泛的定義全球化，如 Held 等人(1999, 2004)所言，全球化可以被視爲「當代所有社會生活面向中，一種日益廣泛、深化且迅速的世界性聯繫關係，並且達

到歷史上空前的發展型態」，自此延伸而來，隱含若干全球化相關研究的共同命題：全球範圍的普遍性、互動、趨同(模仿)、轉型與重構、鑲嵌與去鑲嵌。由此可見「全球化」一詞浮現的背景，跨越的空間、時間之廣，牽涉的人事物之深，俱使該詞彙從使用、定義、程度到評價的爭論遍及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場域。

Guillen(2001)歸納圍繞這些場域的五點全球化核心置疑：1.全球化真的發生了嗎？ 2.全球化是否促使聚合現象的產生？ 3.全球化是否破壞民族國家的權力？ 4.全球性與現代性的有何差別？ 以及 5.全球文化是否正在形成？<sup>3</sup>這五點核心置疑既概括的說明了全球化對既有理論與經驗研究可能帶來的新發現與挑戰，也反映全球化相關學說與研究存在極大歧異的可能性。

Held 等人(1999, 2004)概括當前全球化的爭論—也可以說是(隱含的)價值立場—劃分為三種類型：極端全球主義者(hyper-globalization)、懷疑論者以及轉型主義論者(transformationalists)。極端全球主義者和懷疑論者持有的全球化觀點、邏輯和主張，儘管彼此對反，卻都是預設某種全球化理念型(ideal type)，特別是某種經濟或文化密集聯繫的單一過程(Held et al. 1999; 2004)，概括其主要觀點，係將全球化定義為一系列的發展過程，即全世界的人們被整合至一個單一(single)的世界社會，或全球社會裡的變化過程。比如全球性的自由市場、新自由秩序、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甚或 21 世紀的共產國際主義(M. Hardt & A. Negri, 2000; 2008)，對此 Held 等人(1999; 2004)自方法論的角度已指出極端全球主義者和懷疑論者的瓶頸，即全球化在目的和經驗層次上均難以被論證。

轉型主義論者則多從過程著眼全球化，認為全球化是引發社會、政治與經濟變遷的主要趨使動力(Held et al. 1999; 2004)。然而除此之外，轉型主義論者彼此之間因研究旨趣或理論關懷的差異，對全球化變遷的方向、動力來源、過程機制，以及影響都莫衷一是。下方我們以四位社會理論學者對全球化的描述，簡略說明轉型主義論者對全球化的辯證，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全球化過程的動態與交互影響特徵。

將全球化相關討論略作時序排列，可以看到關於全球化的描述與定義會隨著理論層次的辯論，以及經驗層次的發展而產生衍變：首先針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盛行的現代化、後現代性、世界體系論與國際關係理論，逐漸喪失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Giddens(1990, 2000)藉由描述和觀察全球化，提出對當時社會與理論的反省，他認為全球化是一種時間、空間上的去耦的過程(decoupling)，不受距離(表面上分離的民族國家、宗教、區域)限制的行為和(共同)生活，更具體而

---

<sup>3</sup> Held(1999; 2001)進一步提供五個衡量三種全球化論調的指標：(1)概念 (2)歷史軌跡動力 (3)動力 (4)社會經濟後果 (5)對國家權力和治理的影響。



言，全球化可被界定為連結遠處地方的世界性社會關係的增強，而地方事件就此受到遠地發生事件的形塑，反之亦然。Giddens 主要是藉由全球化的理念型定義來駁斥民族國家業已消亡，以及援引 U. Beck 風險社會的概念，指出風險事件(如車諾比事件)全球性外溢的現象。

相較於 Giddens 為反思世界體系論的經濟決定傾向，而強調全球化與(民族國家)政治之間的關係，D. Harvey(1996, 2011)則從全球資本主義與空間地理學的觀點，指出全球化是一種時間、空間壓縮的現象(這和 Bauman 有類似的定義)。此一觀點又源自於 Harvey 早年對都市空間的資本積累，以及新自由主義、企業城市主義的一系列分析。Harvey(1978)在傳統馬克思主義關注的資本主義生產面向之外，指出都市發展的另一重動力：消費。生產與消費構築都市發展進程的雙迴圈，從而提供資本主義體系適度的彈性空間。此一都市空間資本積累的法則，在全球化(同時 Harvey 仍使用「後現代」一詞)脈絡下更加強化，因此在 Harvey 的觀點看來，國家的權力在勞動—資本關係的強制力量依舊，但是在資本—資本關係中，早已取得自主性的資本力量，在全球的金融體系下更非國家所能控制。

除卻政治經濟方面引發的變革，技術革命亦是常被視作全球化的重要特徵之一。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降的技術革命(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網際網路)，致使人與人、人與社會、社會與社會之間的組織型態亦出現革命性變化，M. Castells(1995, 1998)著眼於此，強調科技技術的進步，使得全球經濟整合，並在經濟整合的基礎上出現新的社會形態：「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新科技所引發的高生產力將伴隨產生彈性的工作與不穩定的生產關係，並催動著全球社會網絡化的形成；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之中，跨國資本的移動及空間的流動所推動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都將浮現，網絡社會儼然成形。網絡社會不僅是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它更是新的社會型態、新的邏輯思維(Castells, 1995, 1998)，在以新資訊為基礎的時代，社會被圍繞著人的世界、資訊的世界、思想的世界、形象的世界和服務的世界所支配。

Castells 提供了對全球化觀察的思路，即以網絡觀點取代過去的結構觀點，流動的空間取代固著的地點。類似的思考反映在更多元化的全球化研究上，特別是文化與觀念的視角。比如 Appadurai(1996, 2009)從全球流動的面向，提出全球文化流的五大向度：族群景觀、媒體景觀、科技景觀、財金景觀和意識型態景觀，並引申 B. Anderson 想像的共同體概念，指出需要將全球化看作複雜、交疊又裂散的秩序，以及由全球的個人、群體受歷史限制而想像、建構出來的多元世界。Appadurai 進而強調，在這個多元的想像世界裡，地方的行動者具備抵抗官方和創造自身想像的能動性。

綜上所述，在我們的討論裡，傾向於轉型論者的立場，認同 M. Albrow(1996)

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實踐、價值、技術的擴散化，並影響全世界人們的生活」，然而此一擴散過程係多元且充斥歧義，必然伴隨資訊佚失、擴充、轉譯和再生產等歷程。特別是全球消費主義的盛行，在地的全球再生產既強調規模、模仿、協同、學習、追趕與標準化，也重視精緻、特色、自主、創新、超越與客製化，從企業製造、商業行銷、文化創意，再到中央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發展戰略，甚至是稍有餘力的升斗小民之日常生活，無不被此一弔詭情境所捲入。

在全球化的弔詭情境中，轉型論者認為參與/被參與全球化的成員們，它們在全球化過成中，各自「由許多不同的擁有自身地理滲透動力和程度的分支組成，因而全球轉型有一個可變的軌跡」(Giddens, 1990, 2000; Urry, 2002, 2007; Newman & Thornley, 2005)。在此，全球化既有強制性的影響力令行動者需要作出回應，也提供行動者回應和規劃策略時的潛在能量，並在這一系列回應過程中強化全球化的不同層面與影響。

最後，全球化研究的另一個常見的特徵，在於它的定義、研究取徑及方法、結果的解釋/詮釋、乃至於政策建議，時常混同實然與應然面。研究者自身，或者其研究對象對於全球化的應然觀念，常影響其對實際狀況的判斷。因此研究者有必要釐清自身及研究對象對於全球化的價值觀，並透過合適的方式展現/不展現在全球化的研究上。

## 2-2 城市的等級與世界/全球城市

從稀疏平常的「村莊或集市」、「城鎮」、「城市」、「大城市」就表示我們對城市等級體系此一概念和毫不陌生，而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係首度試圖描述城市等級體系的空間理論。等級體系各有實質和理論的一面，體系中的每個城市分別在全球、國家和區域三個層級中定下位置，雖然可以單純按人口多寡或城市規模排定其位階，不過更多時候，一座城市在體系中的位置，往往反映對該城市政治、經濟、聲譽、資源、文化和影響力的評價。

「等級體系」意謂城市之間彼此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等方面，互依互賴達到某種程度，足以分別在區域、國家與全球範圍內形成穩定的網絡。在前文我們亦概述全球化的主要背景與特徵，正是全球經濟體系的成型，令全球範圍的城市等級體系浮現。事實上 18 世紀到 20 世紀前葉，拜西方殖民和商貿全球化之故，已經形成全球範圍的城市等級體系。此時的城市成為殖民統治和跨國分工中至關重要的節點，通過等級式的政治與經濟模式，建構核心—半邊陲—邊陲的等差體系，位在核心的是殖民母國的首都(如倫敦)，由內而外依序是母國的次級城市(如利物

浦)，殖民地的重要城市(如孟買)，以及更外圍的邊陲城市(如德里)，類似體系的確立對於民族國家(特別是中央集權國家，無論其是否為殖民國家)十分重要，因為它關乎政治、經濟與象徵資本等重要資源的掠奪和再配置。

透過國際分工和資本主義體制，城市等級體系不僅存在於國家範圍，也存在於世界範圍，同樣有著資源的剝削和重分配的模式。因此那些全世界最富有、聲名最顯赫的城市，被冠之以「世界城市」(world city)之名。

「世界城市」最早係德國學者 Goethe 於 1889 年提出，之後英國學者 Geddes 在 1915 年明確定義世界城市的概念，即在世界商業活動中佔有甚大比例的城市，並加以區分為偏向統領作用(如巴黎、柏林)和商業、交通網絡系統中的工業中心(如芝加哥)(周振華, 2008)。然而直到全球化時代前夕的全球城市體系，城市之間的跨國互動與網絡大多置於民族國家的統理尺度之下。

隨著二戰後全球性工業與金融體系的確立，P. Hall(1966)認為單一工業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造就了世界城市體系，他分析城市在政治、貿易、金融、通訊、文化、技術和高等教育等面向的規模和強度。

在 1970 年代後經濟全球化深化發展的趨勢下，國家在經濟發展扮演的支配性角色出現變化(周志龍, 2012)，以及跨國公司活動為重心的新國際勞動分工越形重要。Hymer 和 Heenan 等人藉由分析和排序跨國公司總部的區分偏好和區分和地位以確定世界體系中某些城市的戰略統治能力(Hymer, 1972; Heenan, 1977; 余佳, 2010)。Conhen(1981)進一步認為世界城市在上述大環境變化發展，因而有別於過去世界城市僅是國家級的國際城市。他以「跨國公司指數」(multinational index)<sup>4</sup>和「跨國金融指數」(multinational banking index)作為衡量全球城市的指數。

在 Conhen 等人經驗研究的基礎之上，J. Fridman(1986)提出「世界城市假說」，試圖為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提供有關空間組織方面的理論基礎。Fridman 認為世界城市的出現是由於全球經濟的再結構於空間所產生的變化，全球性的生產和資本流動使得控制功能集中在少數城市，特別是透過生產者服務業的控制上。新的國際勞動分工須透過世界城市作為指揮中心(Control Center)，因此世界城市的標準不再是規模和製造業。他並指出城市應如何和全球化經貿脈絡結合，以及城市如何調整空間和功能上的布局。據此，Fridman 提出全球城市應當符合下列要點(Fridman, 1986; 劉智年, 2008)：

(1) 須成為主要金融中心

---

<sup>4</sup> 指該城市中所有的全球 500 大企業

- (2) 須擁有跨國(包括區域)公司總部
- (3) 須擁有國際性組織機構
- (4) 商業服務部門的快速成長
- (5) 位居主要的交通運輸節點
- (6) 重要的生產製造中心
- (7) 足夠的人口規模

按照上述要點的符合程度，可以進一步對世界城市予以排序，主要區分為核心國家首要城市(Core primary world cities)、核心國家次要城市(Core secondary word cities)、半邊陲國家首要城市(Semi-peripheral primary world cities)等四類，比如臺北市就處於「半邊陲國家首要城市」的位階上。

S. Sassen(2001, 2005)在 1991 年亦是自新興的生產網絡模式發展世界城市(world cities)的概念。她先指出「生產、商品、信息等因素在全球範圍內流動，會不會形成集聚過程的一種新的空間概念？」，進而分析資本流動的增長，不僅帶來了生產組織的地理區位及金融市場網絡的變化，還要求形成確保對這種新型的生產和金融組織進行管理和控制，並提供相關服務的新的生產形式，世界城市遂成為全球生產網絡關注的焦點。不同於 Fridman 將世界城市視作全球資本的指揮中心，Sassen 傾向認為世界城市是高階的金融和商務服務中心。換言之，在 Sassen 的討論中，全球城市的城市政府(紐約、倫敦與東京)並不直接控制、管理與指揮全球金融與商務，它們更多是提供引誘全球金融與商務中心的合適區位。她考察紐約、倫敦與東京三座城市崛起、奠定為世界城市的歷史脈絡、區域計畫與限制條件，可以說在建立一套全球城市理論與檢證方法的同時，也提供發展成為全球城市的指南。

隨著冷戰結束，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日益走向自由化和全球化，促使全球性生產區位與消費市場的位移和擴張，更多的自然與人力資源被投入生產與消費的迴路中，世界於焉進入高度競爭化的時代。各種產業專殊化與競爭強度愈強，生產性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s,包括金融、保險、法律工商服務、經濟等具有知識密集，以及為客戶提供專門性服務的行業)愈是增長。帶動各式資本的流通愈是頻繁，跨國投資的現象自是更加普遍，反饋至全球金融與商務中心的發展，此即 Sassen(2001, 2005)所稱「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浮現。

相較於 90 年代以前的「世界城市」，Sassen(2001, 2005)認為有新的形塑力量影響「全球城市」的生成。她主張全球機構在 90 年代後加劇集中的趨勢，少數的全球城市集聚更多的全球功能：各類服務、金融、資訊以及媒體等活動的生產、創新與消費。

對於世界/全球城市理論已有諸多批判，比如等級體系的建立標準(一般是計量的)是否適當？是否過於經濟決定論？世界/全球城市是否真的具有全球性的影響力？甚至實際上是否真的存在此一簡單的等級體系？諸如此類的各種批評(Pred, 1977; Taylor, 2003)。以這些批評為基點，世界/全球城市的研究在關注「世界/全球城市的性質是甚麼？」的問題之外，亦開始注意世界/全球城市重要屬性的生成動力、世界/全球城市之間的連繫，以及世界/全球城市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說，在既存的全球城市之外，研究者的興趣更多轉向「全球化城市」(globalizing cities)，關注那些在當前和可預見的未來中，全球層次上越來越重要的城市(N. Brenner et al., 2003)。

比如前面提到 Castells 的資訊技術革命與網絡社會理論，即被應用於世界/全球城市理論或研究之上。Castells(1996)提出在世界流束網絡中考察世界/全球城市的概念框架，亦即以網絡替代等級體系，關注城市和城市之間的鏈結，而不僅是統計數據面的排比。而世界城市在此是「先進服務的生產和消費的中心，以及它們的附屬地區社會在全球網絡中的鏈結」的過程。如果說 Sessen 關注「操縱全球性指揮和控制功能的群體」鑲嵌於全球城市的現象，Castells 則是關注全球城市如何因佔據網絡化流束空間中的核心(hub)位址而掌控權力。比起地理區位，在世界流束網絡中，網絡關係對於城市的權力和影響力的集中和穩固更為重要。

無論是等級體系，或是網絡體系，無不表明城市與城市之間「不平等」現象的根深蒂固。Sessen 和 Castells 均承認在當前世界，只有少數幾個城市利用其以資訊為基礎的生產複合體，佔有穩定和指導經濟交易流動的地位(J. Allen, 1999, 2009)。從生產、消費、金融、地產、資訊、政治到文化，總有少數城市在一些甚至多數權力面向佔據人力和資源優勢，在不同的影響力網絡裡取得支配性位置。在這些世界/全球城市裡，各式資本與權力以多種獨特的方式混合與生產，因而強化它們在全球城市網絡中的優勢地位。

舉例而言，文化工業論中最重要的個案是洛杉磯，其電影工業即是文化權力與資本主義經濟混合與生產的典型，洛杉磯特有且完整的電影工業迴路，使其在文化和經濟向度的影響力均在全球城市網絡中舉足輕重。洛杉磯並不僅是電影工業群聚的區位而已，電影工業屬於大洛杉磯地區城市化過程中的一環，此一過程被 A. Soja(1994, 2004)視為「由國家控制的而由地方推進的資本主義城市化」，經過漫長的歷史，洛杉磯今日仍是環太平洋帶最重要的金融與文化中心之一。

下一節，我們將更具體的比較和討論，發展型國家與城市轉型的相關討論，這些討論基本反映出從「世界/全球城市」到「全球化城市」的研究轉向。

## 2-3 發展型國家與城市轉型

### 2-3-1 發展型國家與城市機遇

在全球化的眾多爭辯中，國家的影響力是否退位一直是爭議話題。基於全球城市的重要特色是其國際特質與國際連繫，如何去除國家疆界的層層限制似乎是首要之務，以西方經驗為主體的世界/全球城市理論便存在明顯的去國家管制傾向，甚至揭示部分的新城市發展邏輯：掙脫了民族國家的明確架構，作為(相對)自主的行動者，城市在國際層面日益活躍，城市能夠也應該要擺脫國家的各式干涉(同時也去除自身對市場的管制)。

在歐美國家，縱使近現代的城市化開展肇始於工業革命、國際分工與技術革命；政治，特別是中央國家的分配和安排仍相當關鍵。從穩固的城市體系(中地體系)與專業化城市(工業重鎮、港口、大學城、文化城、娛樂或退休聖地、軍事中心和科技城)即可看出，國家的安排在戰後相當長時段內扮演決定性的角色(P. Hohenberg & L. Lees, 1995, 2009)。然而隨著全球性經濟和貿易的結構性變革，許多專業化城市的命運面臨巨大轉折，特別是那些深具工業傳統的城市，如利物浦、列日和波鴻，對於參與正在邊界外迅速形成的新城市網絡頗為緩慢，以致於這些城市陷入漫長的衰落。相對於專業化城市，政治性較強的國家或地區首府型城市，多樣化的資源基礎通常使其避免專業化城市的命運，卻也不能置身在全球性城市網絡之外。首府型城市為在充斥競爭的世界城市網絡中保持地位，勢必頻繁進行巨大計畫和建設以符合新經濟模式的要求。

新的權力網絡和治理論述的崛起，勢必衝擊原有的以民族國家為主的政治體制。今日，儘管韋伯宣稱的現代國家定義：「唯一合法地行使暴力之權力來源」依舊有效，但是面對跨國經濟、全球文化及技術上時空壓縮等發展，再再挑戰現代國家的基礎(如稅收不足、稅收分配問題)，以致在大政府、福利國家體制之下出現管理、調節社會的合法性危機。

關於現代國家面臨的上述「危機」，有學說認為是全球化的結果，亦有學說否認現代國家真的出現「危機」，或者這些危機並非全球化所肇致的結果，這些治理性危機很可能是發展主義論述建構的謊言，最主要的觀念迷障表現即「新自由主義」。後者的觀點比如 Geoffrey(1998)探討全球化市場和國家自主權的消長爭議時，提出當前的全球化的市場體制非但不會造成去鑲嵌化，反而是強化各國的鑲嵌性，這是因為全球化進程在各國速率不一，呈現嚴重的時空不均衡的緣故。

多數研究亦指出，在亞太區域(Asia-Pacific region)多個重要城市的崛起過程中，國家直接投入基礎建設與經濟活動，或是以國家型計畫干涉城市的空間發展。此一模式被歸入這些國家近數十年代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儘管不同國家的「經濟奇蹟」時間段略有出入)的討論當中，被視為民族國家介入經濟發展，主要是由技術官僚領導經濟改革，以國家干預的方式「將資源集中在戰略產業上並保持有序的經濟發展而限制競爭」(Hill and Kim, 2000)，此即「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一般研究者討論的發展型國家個案通常包括了日本、臺灣、南韓、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

80年代起，各個發展型國家逐漸遭遇經濟全球化的強力挑戰，該挑戰源自於新的勞動力市場崛起(例如中國)，以及強大的國際貸款機構。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曾被譽為經濟奇蹟的發展型國家似乎出現了積累體制上的危機，以致於發展型國家的國家統理模式面臨轉型。

「全球化計畫」(global project)正是在80至90年代被建構和傳播至全球，包括提供給各個發展型國家作為解決方案。在全球化計畫底下，在經濟方面最具影響力的即是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的經濟策略(McMicheal, 2004)；在政治部分，被強力輸出的是民主方案，不過兩者往往是彼此相關的方案，均可被視為此一階段的新興積累體制與治理形式。

全球和區域的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動促發的積累體制與治理形式轉型，也影響發展型國家與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該區域國家與政府的行動多受到殖民時期的影響，M. Douglass(1998)認為不同城市對殖民化的不同回應，塑造了其後對全球化的回應。

除了殖民時期的歷史依循，亞太城市的地位與發展常由發展型國家所決定。城市的經濟和空間發展時常由國家政策所支配，特別是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較極端的個案是國家定錨的工業區域(state-anchored industrial district)，無論是技術較低端的加工出口區城市，如潭子；或是國家資源更形集中的高科技園區所在城市，如新竹，均是因國家空間與經濟政策而興起的城市。其它類型的城市也深刻受到中央政府的影響，特別是往往在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中處於弱勢，城市在財政、人力、技術資源和重大開發等方面，時常沒有獨自運用和施為的能力，並可能仰賴中央政府解決城市的問題(Douglass, 2001)。

因此當發展型國家遭逢全球化的各種危機，亞太城市較過去擁有更多的機遇和自主性，並且渴望增強包含所有事務在內的城市發展戰略方式的能力(Douglass, 2001)，以尋求、確保都市政權的正當性。

因此亞太區域城市的都市政權近年面對的全球化衝擊，時常被描述為治理危機，同時也被視作是都市的發展機會。如何將危機轉換成機會，環繞於此產生諸多競爭或成長論述，甚至引導區域內城市群在發展策略上出現相似的制度轉折，特別是以文化經濟與服務經濟為主軸的各項建設，被部分學者歸結為「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Scott, 1997; 2000; Hutton, 2005)。「文化轉向」，配合「巨型都市計畫」(mega-urban project)直接形塑和影響的是都市整體區域的再發展、「新經濟(new economy)」的建構，並促成地方網絡與地方文化的再結構化。

這種轉變不僅是基於結構性的國際因素，更緣於發展型國家的轉型，及區域競爭格局的浮現。治理網絡的解構與重構，既有的結構條件的路徑依循，交互構作上述的文化轉向。

在近年經濟地理學的討論裡，區域內與區域間的去領域鑲嵌(territorially dis-embeddedness)和再領域鑲嵌(territorially re-embeddedness)即是對於全球化脈絡下都市發展轉折，造成的社會空間斷裂與重構進行探究。嚴格說來，「文化轉向」雖是諸多都市在此一階段發展轉折的共同特徵，其導因、內涵和結果仍是需置回在地脈絡而定。

比如發展型國家實際上並不會立即並全盤接受全球化計畫的主要宣稱，縱使中央國家的統治者與官僚個人服膺相關思想，他們仍大多深受過去自上而下的總體規劃(藍圖)形式的約制。面對此一情形，城市政府必須繼續依循自過去衍生出來的發展模式，進而透過全球競爭與學習找尋資源和躍升的契機，另一方面還要持續的同中央國家反覆交涉與爭取。

從東亞發展型國家與城市的既有研究，我們能看到「經濟全球化可能在國家層面瓦解國家的統治，並將權力分散給區域組織或者城市政府」的論斷尚未成立(Newman & Thornley, 2005)。我們還能看到在該區域出現的城市等級變化，「全球化城市」大行其道，全球化和全球城市被看作是可欲的。

### 2-3-2 城市轉型與城市治理

前一小節我們討論亞太地區的區域變化，在這一小節我們從城市轉型(urban change)和城市治理(city governance)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亞太城市在近二三十年間的變化。

到目前為止，我們透過全球化與全球城市的若干辯論，指出城市與城市政府在近年面臨的大環境變化為何，以及可能帶來哪些挑戰和機會。然而城市與城市



政府在全球化過程中會如何應對眾多的變化？

如同我們一貫強調的路徑依賴觀點，許多研究者指出地方政治對全球化的回應受到多種要素的制約，比如 Savith 和 Kantor(2002, 2005)關注兩套因素：一是各式等級維度政府之間關係，二是塑造地方政治文化的準則及價值觀的因素。Newman & Thornley(2005)則指出一般確定的變量是政治文化和要求的表達，以及城市政府對城市中具有影響的力量的連貫回應的能力。

全球化對於城市政治與發展的一大衝擊是促發近幾年日趨激烈的城市競爭。全球的城市進行等級式的評比、排序已經司空見慣，這些評比引發城市為保持和提升位置的競爭。這些評比一方面體現競爭激烈的全球資本市場，二方面則是城市政府認識到類似評比的象徵性意涵：全球化對城市的多層次穿透，形塑市民社會和政治表達，這些評比很可能會影響其執政的正當性。

城市競爭概念的擴張正可視作全球化的一種過程。M. Porter(1985)提出競爭優勢模型(competitive advantage model)應為源流之一，該理論雖是針對企業，卻很快的和 Harvey(1989, 2010)所謂的「城市的企業主義」，以及世界/全球城市理論合流，成為具全球性影響力的觀念。

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打開資本跨國流動的限制，許多城市突然發現它們對於資本的談判地位已經大幅度削弱了(M. Royle & R. Rogerson, 2009)，另外有一些城市則是注意到這個改變自身城市等級位置的「機遇」。因此城市的發展戰略越來越以城市環境為目標，以吸引有發展前途的企業。主要方式是改變城市形象(巨型計畫、宜人的文化氛圍和休閒設施)；改變城市經濟吸引力，以保證發展和增長(M. Royle & R. Rogerson, 2009)。

於是自 80 年代以降，基於增進競爭力的目標，一系列對於城市轉型的討論和計畫被提上議程。如同前一小節所述，亞太區域國家和城市在近二三十年間面臨巨變，T. Hutton(2005)就分析亞太區域國家和城市在提升競爭力的選項上，至少有三階段的回應過程，城市發展亦隨著此一回應軌跡而出現轉型(參見下頁表 2-1)。

自階段 I 到階段 II 當中可以清楚看到，以城市戰略與轉型而言，在全球化衝擊與治理危機脈絡下，亞太區域城市已形成某種程度的「組織同形(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DiMaggio & Powell, 1983)，當中「文化轉向」和「象徵實踐(symbolic practice)」論述對於城市轉型更成為具有召喚力的標語(slogan)。

表 2-1 亞太區域的服務工業(service industry)政策模式(1978-2003)

<b>階段 I. 對經濟和政治震撼的政策回應：新發展軌跡 (1978-1986)</b>	
A. 總體國家發展策略的轉型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深圳經濟特區(1979) • 開放 14 座沿海城市特區(1984)
B. 劇烈的經濟衰退環境： 基礎工業和區域轉口貿易角色急遽 衰退	1.溫哥華(不景氣，1982-1984) 2.新加坡(不景氣，1985；「新方向」發展戰略)
<b>階段 II. 對全球化和再結構的政策回應：「主流化」服務業政策 (1987-1997)</b>	
A. 服務業和新發展路徑： 後福特主義和後工業主義	1.香港：後工業大都會的相關政策 2.名古屋：服務業和高階工業生產 3.首爾：先進全球城市區域的服務業
B. 服務業和「知識經濟」： IT 產業和「都市資訊密集服務業」	1.新加坡：「智慧城市」計畫 2.馬來西亞：「大馬多媒體超級走廊」 3.日本：「資訊密集服務業」模式
C. 服務業和全球化戰略： 外國直接投資、都市巨型計畫，以及全球城市的再想像	1.上海：浦東新區的都市巨型計畫 2.橫濱：21 世紀未來港計畫 3.越南：“Doi Moi(改革)”和外國直接投資導向的產業結構服務化 4.北京：2008 年北京奧運作為全球象徵
<b>階段 III. 對危機和「文化轉向」的政策回應：實驗和創新 (1998-2003)</b>	
A. 對服務工業的「震撼」衝擊： 「亞洲危機(ex. 亞洲金融風暴)」、SARS，以及恐怖主義	戰術性的回應：法制革新、價格調節、市場化、基於安全考量的「鎮壓」和「損害管控」計畫
B. 服務業和「文化轉向」： 城市文化政策與「新城市文化經濟」的浮現	1. 服務業和永續發展：墨爾本、西雅圖、波特蘭、布里斯班 2. 「永續發展的奧運」：2000 年雪梨奧運 3.服務業和區域發展合作：大珠江三角洲 4.城市作為文化生產的全球中心：洛杉磯、東京 5.創造性服務業和內城的「新經濟」：新加坡、舊金山、西雅圖和溫哥華

資料來源：修改自 T. Hutton(2005)

不過何以會是文化轉向？「文化」與「轉向」的內涵為何？「都市再發展」是新瓶舊酒式的延續既有的地方發展脈絡(同時也承繼過去都市政權的窠臼和困

境)，抑或以暴烈的方式向舊政治經濟體制訣別？我們將在中市「文化城」的戰略/論述的變遷分析時，具體探索文化轉向相關的政策思維是如何被地方政府擇選、再塑造/包裝，並且被運用於達成特定的組織任務(tasks)。

從中我們能清楚看到亞太城市轉型中的「全球化過程」以及折射出它們的「全球化計畫」。如同城市化，每個階段並非均勻的影響各個城市，每個城市可能有不同的戰略，制度滯後和制度依循更令城市的轉型呈現空間和時間上的不均衡；然而城市彼此之間又是互相影響(通過競爭、學習和合作)，故而時常可以看到相似戰略的在不同時期被採用，然而採用的形式、過程和結果又各有不同。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多數制度會滯後於全球化計畫的問題，因此許多全球化項目是由實驗性的政策、論述、文化和建築環境所構成。臺灣的重要城市亦不免於外，特別是北高兩都近二十年來時常被安置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下建構其再發展，特別是集中在特定的區域，例如新都心與都市計畫區(周素卿, 2003)。

城市轉型也包含治理模式的轉型。「治理」(governance)亦譯作「統理」，往往對應於「統治」(government，也作「統制」)，源自於古希臘文“κυβερνάω”，柏拉圖在其著作時用它表示「引導」之意。在過去，“governance”與“government”時常混用，“governance”更多指「國家事務相關的憲法及法律活動；或是處理特定利害關係人的特定機構或專業單位」(Jessop, 1998;轉引自劉坤億, 2002)。

隨著現今國家與政治的型態不再是單純的由上而下的管制，而是日益趨向多元、多層次的政策網絡，跨國家、跨城市、跨公私部門的協商與交易過程。面對此一趨勢，舊有的“government”概念已不敷使用，遂將“governance”和其區隔以反映複雜的社會狀態。在學術研究方面，便是從過去的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轉而傾向關係性的協調機制和網絡的架構。不再固守層級分明的權力結構與疆界，而是關注網絡節點上的相互作用與脈絡歷程。

在當前實務與學術的研究上，治理的概念運用極廣，不同學科間對「治理」的理解和使用可能有相當差異。在我們的研究中，將治理作為個案城市(臺中市)戰略和發展的解釋框架，「發展轉型」則是城市政府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的環境條件與層次互動時發展出的治理傾向。

以王振寰、黃書緯(2001)對上海「發展轉型」研究為例。他們以調節理論分析上海從社會主義城市到世界城市的轉型過程，特別是上海市經濟結構在轉型為中國對外主要城市過程中的制度鑲嵌，以及釐清轉型之後的上海市是否符膺世界城市的標準。作者們透過比較世界城市理論與上海私營企業的研究數據，認為上海還不足以成為世界城市。

發展型國家在城市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在該研究中表露無遺，然而王振寰和黃書緯的研究對於制度的描述缺乏動態的、過程的分析，特別是中央制度與地方(上海市)制度的衝突未被突顯，過於強調國家總體調控的能力依舊宰制城市方針；預設全球/世界城市治理的單一面貌的同時，也降低對城市治理與發展的評估與預測能力。

我們應當注意到治理並不只是形式與技術，更是治理技術與治理合理性的結合，亦即「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僅從形式與技術方面衡量城市的發展與轉型，易輕易將世界/全球城市視做城市發展的高階型態，忽略各級城市面對各種迥異的時空與社會脈絡，形成特定的治理性。Foucault 認為，治理性源自於正確管理孩童、家庭、公共領域和國家的方式(Foucault, 1997)，並隨著時代變遷，治理性亦展現在優生學、營養學、住宅政策、都市計畫、社會醫療與公共衛生等等方面。在我們對城市戰略與發展模式考察的同時，當中隱含的治理性亦會是分析面向之一。特別是透過治理性的分析，在後續的個案研究中，我們能夠看到全球化既是改變自身城市等級位置的「機遇」，也是新的「發展焦慮」來源。

### 第三章 臺中市發展的歷史路徑與模式

在本章(第三章)我們將回溯臺中市發展的歷史路徑，歸納臺中市發展的基本模式、重要機制和戰略根源。由於關注於臺中市的整體發展和戰略，因而我們將焦點從利益團體和政權構造，轉移到城市身處的更廣泛權力網絡，該權力網絡可分做全球、國家與地方三個層級，關注不同層級對城市的穿透過程與形式，並嘗試尋找可能影響路徑轉折的「關鍵時刻」(conjuncture)。

#### 3-1 草創時代

今日臺中市亦被稱為大臺中地區，係由原臺中市和原臺中縣合併而成。自2010 合併迄今不過三年，加之原臺中市多年來皆是大臺中地區都市體系中的唯一核心(參見圖 3-1)，原臺中縣發展的空間形式則以鄉村和臺中市的衛星城鎮為主要構成。因此我們的個案討論係以原臺中市的發展和城市政府的戰略為主軸，在牽涉到區域競合和近三年合併升格後的臺中市時，才會處理原臺中縣的部分，後一種情況下會以「大臺中市(地區)」代稱以做區別，除此之外凡是提及臺中市，均在原的臺中市行政區劃範圍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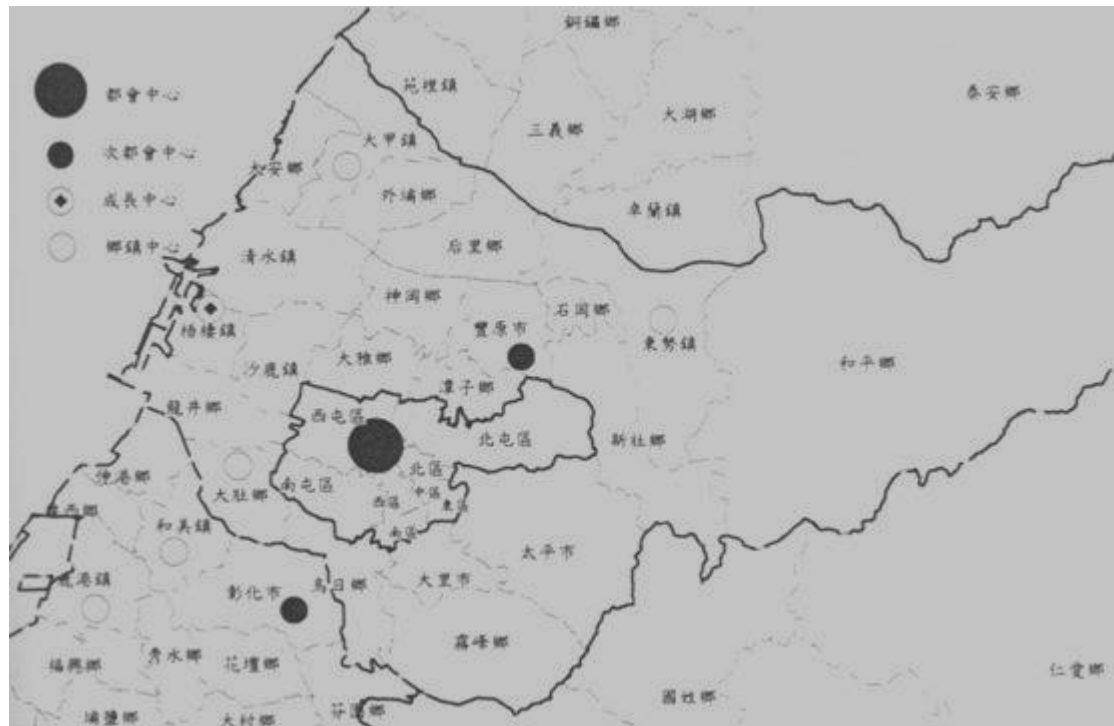


圖 3-1 臺中都會區都市體系示意圖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建設學院(2001)

臺中市位於臺灣中部，土地面積為 163.4256 平方公里，東西長 14.2 公里，南北寬 11.3 公里。臺中市主要為盆地地形(臺中盆地)，四周全為臺中縣鄉鎮所包圍。西以大肚山台地為界，同臺中縣的沙鹿鎮、龍井鄉、大肚鄉為鄰，往南則是臺中縣的烏日鄉、大里市，北接臺中市潭子鄉。東邊則是位於新社台地和臺中盆地中間地帶的大坑風景區，全市最高點亦在該山區，海拔 859 公尺的頭料山，此區因地形和位置之故，有「臺中後花園」、「臺中陽明山」之稱，以東與臺中縣新社鄉和太平市為鄰。

河川方面，臺中盆地雖無大型河川流經，卻有多條水道東北橫向西南方向注入臺中縣南緣的烏溪，恰與臺中市環狀的發展軸呈現正交(逢甲大學建設學院，2001)。主要的河道有內環的綠川與柳川，中環的梅川、麻園頭溪，外環的石碑溪、南屯溪、新庄溪，以及最外緣的筏子溪、大里溪、旱溪等，因此臺中盆地的水脈與水資源堪稱豐沛，對於臺中市發展在不同年代亦有不同影響和意義。

臺中市行政區劃分為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北屯區、西屯區及南屯區等八區。事實上在 1945 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重建省制，改臺中市為省轄市之際，臺中市僅有中、東、西、南、北區等五區，北屯、西屯和南屯三區原係臺中縣三鄉，1947 年併入臺中市，遂定下八區的格局。

回溯大臺中地區的發展史，最初的發展是在康熙年間的犁頭店(今日南屯區)，之後發展較好的市街分別是雍正年間沿邱厝溪(今柳川上游)東南岸形成的大墩街(約今日北區)，後因地處葫蘆墩(今豐原)到彰化一線的中途，成為米穀、土產、大陸進口貨的交易點；雍正乾隆年間始墾，日後形成市街的葫蘆墩，並因道光年間八寶圳開鑿之故而興盛；乾隆年間形成市街的大里杙(今大里區)是早期臺中盆地三大聚落之一(另兩大聚落是犁頭店和四張犁)，後來更是臺灣第六大街市，清代有「一府、二鹿、三艋舺、四竹塹、五諸羅、六大里杙」之謂。西屯地區更於康熙年間始墾、乾隆年間陸續開墾完成，道光年間形成市街「西大墩」(台中市發展史，1989；篠原正巳，1996)。

從以上的發展概述可知，臺中盆地在清領時期的發展並不以臺中市傳統的市區(中、東、西、南、北區)為中心，來臺開墾的漢族多在方便灌溉、容易防守(平埔族)之地聚集，形成以血緣、地緣為核心的移民社會，在臺中盆地呈點狀式的發展，其開墾並在清領晚期遍佈臺中盆地，形成臺中地方多望族大姓，甚至是國府時代臺中地方派系的淵源，重要者如霧峰林家(發軔於大里杙)、西屯西大墩廖家、北屯賴家、北屯邱(丘)家和豐原葫蘆墩張家，當中廖家、賴家、邱家和張家的本家或旁支在日後均在臺中市地方自治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同他們在臺中開墾過程中支配的土地資源和親族連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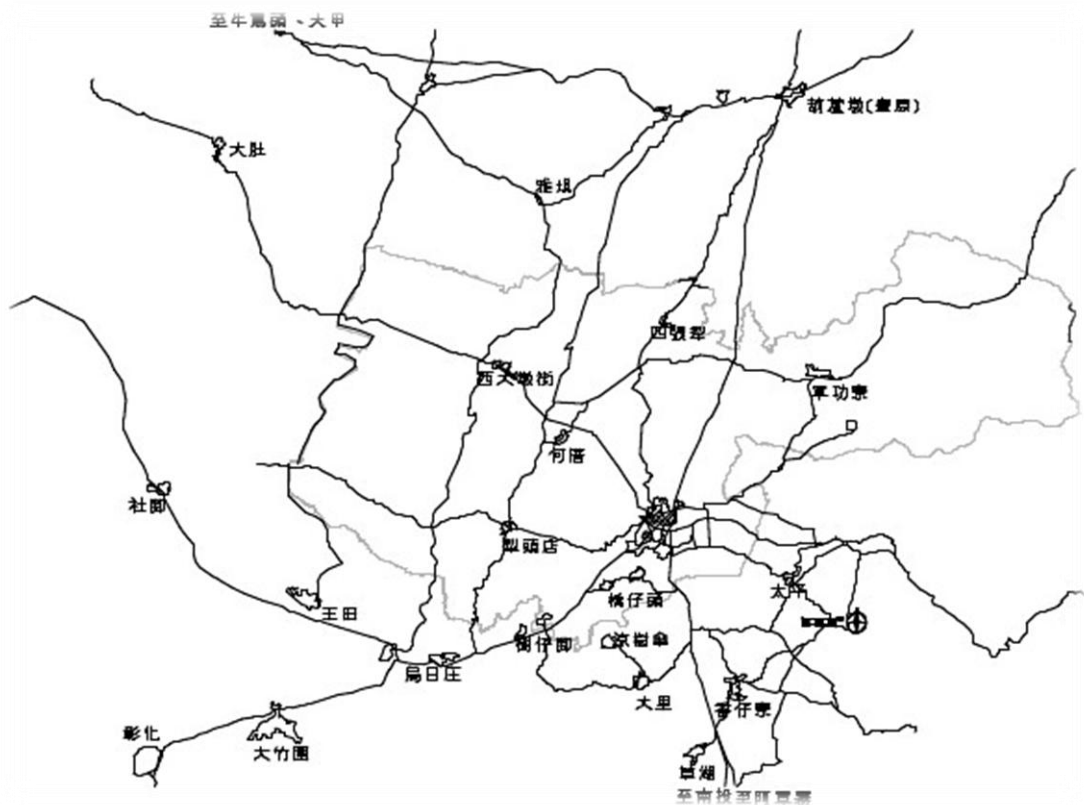


圖 3-2 描繪自 1904 年臺灣堡圖的臺中盆地聚落關係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遠流出版社(1996)，轉引自張嘉玲(2004)

和臺南、高雄與臺北，甚至新竹、嘉義、彰化等地相較，臺中市的建城較晚，遲至 1871 年光緒 17 年，因臺中位居臺灣西線的中央，臺灣巡撫劉銘傳在臺中盆地興築臺灣省城<sup>5</sup>。為方便建築理想的城池，臺中省城並非以大墩街為中心，而是選擇大墩街以東(東大墩)、尚是水田墾漫之地建城。日治後的縱貫鐵路與市區改正亦均以昔日省城區域為中心，是造成大墩街在日治時期以後衰落的主因(王振寰, 1996)。

臺灣省城的興築因劉銘傳的去職，以及後繼巡撫邵友濂以地方經濟發展條件不佳、建設新城經費龐大等理由，於 1894(光緒二十年)將省城北移臺北。臺中成為省城的計畫雖然失敗，但是對於臺中市的發展有極為重要的影響：過去中部區域的政經中心係彰化縣城(今彰化市)，雖然做為省城只有短暫時日，臺中市日後仍取代彰化成為中部的區域中心；日本政府以臺中城為中心，建設鐵路和道路系統，使臺中市成為交通樞紐；最後，劉銘傳捨大墩街另闢新城，日治時期亦以新城為都市規畫之核心，確立之後長達百年的臺中市發展的空間格局。

<sup>5</sup> 劉銘傳經再三勘查地形後認為「臺灣既經分省，須由中路建設省城，方可控制南北，而『橋仔頭』襟山帶海，控制全臺，實堪建立省會。」(魏蓉華, 1991)

### 3-2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895 年-1945 年

1895 年(明治 28 年)公布臺灣的行政區域編制，地方政制仍沿用清朝時的州廳街庄制，分別是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州及花蓮、臺東二廳；州廳之下設郡役所，郡之下設街庄。隨後五州二廳變七大縣，縣下置郡，郡下設鄉鎮。改制為二十一縣市時廢郡，臺中州成爲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四縣市，其中臺中市周邊同一體的大屯郡含北屯、西屯、南屯、烏日、大里、太平和霧峰七庄。

日治初期(1897 年)臺中市內城與城外大墩街的戶口與人口數(534:2,358)僅及豐原(893:5,432)一半，更只有彰化(3268:14,068)的六分之一強。然而到了 1943 年(昭和 18 年)，臺中市經歷多次都市計畫，規模和戶數人口均大幅飛躍，市區人口(不含大屯郡)已達 103,386 人(篠原正巳, 1996)，爲中部區域之最。

臺中市都市發展與現代化始於日治時期，最主要的發展計畫即多次的都市計畫。臺中經劉銘傳建城而粗備規模，不過城內僅有政治文教機關，其餘可謂空白，這提供日本人極佳的都市計畫的實驗場所。

由於日本移民劇增，住宅問題的解決成爲首要事項。1898 年英國技師巴爾頓及濱野彌四郎對臺中市街進行衛生工事調查，巴爾頓認爲同心圓會使得建築繁雜且會產生商業區過於集中的現象，有內外不平衡之憂慮，故而建議採取當時歐洲國家在殖民地常見之土地區劃方式，即以方格子狀市街取代圓形市街(楊欽堯, 2009)。根據巴爾頓的建議，木下周一於 1900 年提出第一次市區計畫(市区計画)，並發佈「臺中市區改正圖」，是日治時期臺灣最早的市區計畫，道路系統較巴爾頓複雜，提出市街紋理的觀念，以棋盤式街廓取代聚落的舊紋理。

1900 年的市區計畫係繼承劉銘傳的省城規畫，城域內總面積 996,150 坪(篠原正巳, 1996)。巴爾頓認爲臺中市街道不宜過於狹窄，要將官方機構「市役所」置於中央地區，其他醫院、博物館、圖書館等公共建築則分散各處，尤其是要有公園(後來臺中公園)之設置，以調劑市民的身心靈(楊欽堯, 2009)。之後日本政府還有大大小小各式市區計畫在臺中推行。重要的有 1911 年(明治 44 年)臺中廳公告第 178 號市區改正計畫，將綠川截彎取直、公布新計畫道路，以及將計畫道路上的舊有建築限期拆除，結果是令清代以前的老街「俱成灰飛煙滅，原貌全失」(魏蓉華, 1991)。



在交通建設方面，以 1908 年(明治 41 年)貫通的臺灣縱貫鐵道、以及爲了貫通儀式而闢建的臺中公園爲契機，臺中街道的格局煥然一新(篠原正巳, 1996)。之後隨著歷屆改正計畫與市區的擴張，街道亦日益整備，到 1921 年時，臺中市的街道格局已與今日市五區的主要幹道大抵相符。再到 1943 年，臺中州告示第 415 號公告大臺中市的都市計畫，計畫區域範圍擴及大屯郡各庄里。外環型的道路開始出現，今時臺中的道路特色「環狀道路包圍棋盤式的街區」首見於此次市區擴張發展計畫，此次亦是日治時期最後一次市區改正計畫(魏蓉華, 1991; 林怡秀,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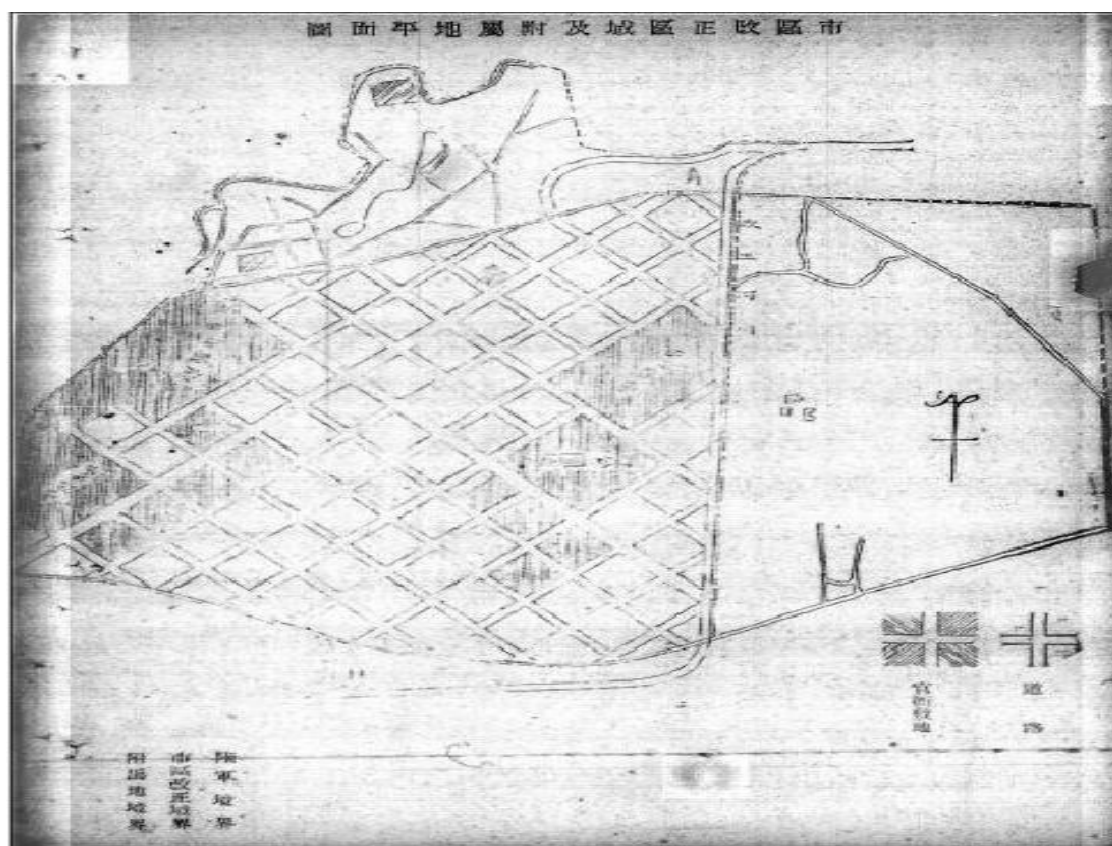


圖 3-3 1901 年市區改正圖

資料來源：臺中縣報第三百二十四號，轉引自張嘉玲(2004)

不斷擴張的臺中市市區，以及高速成長的人口增長，與臺中市日趨完備的都市機能脫離不了關係(魏蓉華, 1991)。根據 1936 年(昭和 11 年)的調查數據，農業戶數僅佔總職業戶數 6.94%，佔最大比例者爲日稼(日薪打工者)。值得注意的是官公吏比例達到 10.53%，日人臺人比例更達 9.84:1，不過有意思的是，此一比例在同一時期其它臺灣都市當中並不突顯，甚至可以說是偏低的。對照臺中市市區改正計畫無論規模、次數、用費均在全臺前列，相對偏低的官公吏比例似乎能側面說明改正計畫的成效。

日治時期的臺中市發展與計畫的意義為何？我們想從城市化過程與殖民現代性的角度加以綜論。

表 3-1 臺中市管內職業別戶數(臺中市管內概況昭和 12 年)

種別	官公吏	農業	工業	商業	日稼	其它	總計
內地人	1,574	12	298	491	178	2,017	4,580
本島人	160	1,131	774	2,004	4,544	2,708	11,321
朝鮮人	—	—	—	7	—	9	16
中華民國人	—	—	130	150	192	74	546
其他外國人	—	—	—	—	—	2	2
計	1734	1,143	1,202	2,652	4,914	4,820	16,465
比例	10.53%	6.94%	7.3%	16.11%	29.85%	29.27	100%

資料來源：修改自篠原正巳(1996)

臺中街(市)的拔地而起，透過以市區(改正)計畫為主的政策，日本統治者和規畫者的「戰略」不外乎三方面：一是遂行殖民統治；二是服務日本移民；三是試驗都市計畫、打造合乎理想的城市，這三方面同時又是彼此相關的。

首先，臺中市規畫和發展最重要的目的仍是遂行殖民政治與經濟的控制和榨取。日人為證明日本殖民統治的合理性，採取有別於西歐國家一味榨取殖民地的模式，扶植臺灣現代化(特別是經濟與交通現代化)以提高產值，此即縱貫鐵路和臺中市街的整備。此外，日本帝國在統治臺灣的五十一年間，進行多項的調查，包含各式市區計畫前的調查，亦以統計方式詳細記錄殖民地在地政府的運作，留下相當完整且數量龐大的統計資訊。這些統計資訊不僅有利於日本人在臺灣的統治，也便於針對臺灣都市的發展進行各項推估和計畫。

日本統治者在遂行殖民政治與經濟的榨取外，服務日本移民，打造適合統治民族居住之城市也是重要目的。日本人將缺乏在地脈絡的舊臺中省城建設成縱橫交錯、如棋盤般方正的街町，間或垂柳扶蘇的柳川與綠川，斯情斯景令異鄉遊子回憶起故鄉，故將臺中市稱為「小京都」。不是東京而是京都，反映日本殖民者自身的東方主義，同時融合想像中美好而理想的東方與西方，並於殖民地再現。

A. Said(1999)在《東方主義》中揭露「東方」是如何他者化、進入權力/知識論述的生產體系中。因而東方學的東方是安置在二元對立的脈絡下而被建構的東方，並成為西方凝視、知識與欲望的客體。同時東方主義不僅是建立在想像、虛構之上的論述，它之所以具有力量、擁有生產性，乃是源自論述不但在歷史中發

展、構成文化「常識」中的重要部分，有些還專屬於建制的領域(Potter,1996;轉引自 Rose,2006:202)，更在於它建構在經濟利用和物質壓迫等權力關係之上，特別是殖民體系的空間脈絡本身即有助於(亦改變了)東方主義的生產性。

正因東方主義是經殖民地國的空間脈絡而再生產，它就同時成為「西方人」與「東方人」想像與知識中的「東方」。西方的知識體系自我生產出細緻而複雜的東方學，藉由將差異他者化、刻板化和同質化而生產支配現代西方人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知識體系，即建構理性的、進步的西方「我者」，對立於落後、浪漫的東方「他者」。國家治理性遂經精密且制度化的操作，將(西方現代國家)國民的身體置入此一論述體系之中以生產和規訓。如乾淨、清潔的現代國民身體對比骯髒、孱弱的東亞國民身體，最典型的例子當屬「東亞病夫」的圖像了。

衛生政治的國民身體時常與現代性論述結合，並在各個場域實踐。以都市計畫為例，十八與十九世紀的巴黎和倫敦，計畫者將公園當成是都市之肺，並運用醫學的概念，使公園和大道比擬成城市的動脈(Sennitt,2003)，同時將下層階級的住宅與社區排除於「動脈」區域之外。表面的理由是爲了保持個人能順利在城市移動，根本上卻是杜絕「階級混血」的可能性。爲令「動脈」真正清潔暢通，其週遭的建築盡可能維持一致性，並在這些區域建立大型紀念碑或奇觀建築，如巴黎的拱廊街、香榭里舍大道上的凱旋門，整體城市變得「可見」，也讓市民無所遁形，原先被認爲是藏污納垢的區域不是透明化就是被隔離，實際就是服膺科學與理性的城市結構。

根據日人氏平要編纂的台中市史(1920)記載，日治初期的大墩街「街道狹隘卑濕，溝渠設備不全而污水四溢，一旦有傳染性疾病，易使惡疫流行。且多是石礫路面，舉步難行」(魏蓉華, 1991)。對應清代大墩街道的狹窄雜亂、缺乏公共空間，又偏低矮的建築，日治時期多次的市區(改正)計畫恰恰反映出日本統治者和規畫者對於現代化城市的「西方主義(想像)」。一方面開設下水道，拓寬、拉直原本狹隘的街道，正如同巴黎奧斯曼計畫(Haussmann's plan)那般打造乾淨、整齊、有條理的城市。一開始劉銘傳遺留下來、未完成的新城廓，正好讓日本人試驗在本土未能徹底操作的現代化城市藍圖；待臺中市街擴張至舊市區(大墩街)，日本統治者爲遂行計畫，也是爲了遂行現代化治理、轉化舊空間與舊市民，不惜抹平存在已有百年的舊市街。

臺中街道的拓張，亦意味著日本殖民政府透過改變傳統的社區邊界，替以日式街町與警備的行政畫分，乃重構原有社區的權力結構。不僅基層權力結構的重構，人民的都市記憶也開始再建構化：伴隨大量日籍移民而來的是充滿日本風情的町名，比如「橘町」、「綠川町」、「初音町」、「幸町」、「曙町」、「櫻町」...等等，與此相對的是，郊區(屯區)的地名直至 1936 年仍大體保留舊名：「頂橋子頭」、「公

館」、「樹子腳」、「半坪厝」、「後壠子」...等等(篠原正巳, 1996)。一邊是改正後文明而現代化的計畫城市, 另一邊則仍是未開化、傳統漢族聚落的鄉村, 差異從地名即可略窺一二。

在不斷擴張的市區計畫與建設過程中, 殖民政府十分重視綠化帶的設置, 除了臺中公園, 在日治中後期的多次改正計畫中均提出公園道的規畫。公園道的構想可直接回溯至 E. Howard 於 1898 年提出的「田園都市」(garden cities), 此城市設計理念在明治 40 年以後引入日本, 並成為現代化的象徵(山本剛郎, 2001)。Yi-Fu Tuan(段義浮, 1974)即認為, 對於荒野和鄉村的態度起源於城市, 荒野意味著渾沌, 花園和農場意味了田園生活; 城市則意味著秩序、自由及榮耀, 但也意味了世俗物慾; 不過西方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和十九世紀自然浪漫主義之後, 輿論卻貶抑城市以彰顯鄉村和自然的價值; 現在, 荒野代表了秩序和自由, 核心城市卻成為社會棄民所掌理的混亂叢林, 郊區則獲取了好名聲。

在日本, 特別是 1923 年關東大震災之後, 對照狹隘危險的緊密城市, 「田園都市」迅速取得現代化象徵的地位(山本剛郎, 2001)。市區一定比例的綠地和綠化帶, 不僅能提供足夠的避難場所, 更能改善都市環境與給予市民休閒去處。田園都市綠化帶的城市理念也在 1931 年「臺中市區計畫綠園地指定」中首度出現, 並在 1943 年的大臺中市都市計畫取得明確的地位(林怡秀, 2008)。

日本人在剷平舊市街的同時, 田園城市的理想也體現在保存部分的清代遺跡、以及容許臺中地區的臺人擁有部分的自主性之上。主事者貫徹都市計畫之際, 移置若干劉銘傳時代的歷史建物, 比如省城北門和臺中考棚; 臺人的自主性主要在文化和教育方面, 特別是由中部仕紳林獻堂、辜顯榮等人捐資, 於 1915 年成立第一所專為培育臺籍學子所設立之中學校: 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即今日臺中一中)。日治時期臺中市的文化活動昌盛, 以林獻堂等人成立的臺灣文化協會為首, 臺中成為全臺文化思想交流與民族運動之地, 進入皇民化時代後才逐漸的凋零(湯國榮, 1996)。此一背景加上臺中的「小京都」風情, 臺中文化城的讚譽遂不脛而走。

總的來說, 日治時期的臺中市發展與戰略需安置在殖民脈絡下檢視。臺中市的治理體現日本人對西方城市, 以及殖民地應有面貌的雙重想像。道路、鐵路是現代城市的大動脈, 如其阻塞則城市便會生病; 為保持城市的血液循環順暢, 應市區改正、都市計畫要求而拆遷聚落既是必要, 也是國民的義務(小田亮, 2001), 與此相關的, 都市公園、城市衛生建設、教育推廣、犯罪防治等等均有類似的意涵。透過理想城市各種實際的建設, 以及隱含的象徵意義, 比如小京都、文化城、田園城市、理性而進步的市區改正計畫, 合理化其差別化的殖民政策與空間規畫。

日治時期的殖民經驗影響臺中市的發展路徑甚鉅，不僅是放射狀與棋盤式的空間發展模式，更包含：1.都市計畫作為都市擴張的手段；2.日本都市計畫的若干特質在日後成為臺中市發展戰略的核心(儘管概念內涵、手段和目的均有所差異)，比如文化城、田園都市，也包含不吝嘗試各種西方與東方「進步」事物的性格，以及夷平剷除原有都市紋理的慣性思維。經歷日本人的積極治理，我們將在後面看到，回應 M. Douglass(1998)指出的，城市對全球化的回應會深受殖民歷史及遺留的殖民性所影響。

### 3-3 戒嚴前期：1945 年-1977 年

1945 年終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重建省制，改臺中市為省轄市，在納入南屯、西屯與北屯三鄉後奠定臺中市的行政區劃(面積 163.43 平方公里)，直到 2010 年的合併升格為止，區級以上的行政區劃未再出現變動。

表 3-2 臺中市各期都市計畫之計畫年期、面積(公頃)、人口密度

公布實施日期	計畫範圍	計畫年期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計畫面積	計畫飽和人口	粗密度(人/公頃)	
45.11.1.	舊市區	民國 62 年	2,617.72	3.685	464,624	227	
64.5.23.	一期擴大西屯地區	民國 83 年	707.40	——	160,000	240	
68.8.25	大坑風景區	——	3,300.00	——	——	——	
66.1.18	二、三、四擴大都市計畫	軍功里地區	民國 85 年	102.45	12610.17	21,500	215
		水景里地區					
		舊社、三光里、平田里、平和里、松竹里地區	民國 85 年	556.86		139,200	267
		四張犁地區	民國 85 年	59.82		14,000	234
		後庄里地區	民國 85 年	98.22		22,500	232
		西南屯地區	民國 85 年	429.66		126,300	295
		南屯楓樹里地區	民國 85 年	87.48		20,000	235
		文山里地區	民國 85 年	108.50		22,800	217
		春社里地區					
	西屯福安里地區	民國 85 年	180.80		30,760	178	

公布實施日期	計畫範圍	計畫年期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計畫面積	計畫飽和人口	粗密度(人/公頃)
75. 2. 22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不包含大坑風景區)通盤檢討(第一次通盤檢討)	民國 95 年	8,532.73	12610.17	1,300,000	201
84. 2 .25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含大坑風景區)通盤檢討(第二次通盤檢討)	民國 95 年	12600.13	12600.13	1,300,000	295
94.10.20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含大坑風景區)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	-----	-----	-----	-----	----- --

資料來源：修改自邱瑜瑾(1996)

戰後到七零年代的臺中市都市發展，基本仍依循日治時代的空間格局，沿放射狀與環狀的公路網朝屯區方向擴張。戰後臺中市人口急速增長(特別是自中國大陸遷徙來臺的軍民)，既有的都市計畫已不敷使用，1953年(民國42年)起臺中市政府重新檢討提出規劃案，日後因臺中工商業的發展，臺中市政府先後提出各式都市計畫，成為日後市地重劃與重要建設的施政根本依據(參見上表3-2)。

在1960年代以前，臺中市的都市發展處於零碎化時期，國民黨尚未建立明確的侍從體制，日後影響臺中市發展甚鉅的地方派系在此一時期(五十年代初中期)崛起。地方派系之後長期主導市議員和省議員選舉至八十年代，更能左右市長選舉，70年代前民選的臺中市市長即多半具有派系背景。

面對在選舉時「喊水會結凍」、根基於盤根錯節的地緣與宗族連帶的地方派系，國民黨一方面給予地方派系區域性獨占經濟、省營行庫的特權貸款、公共部門的採購以及地方政府公權力所換取的經濟利益等酬庸，藉以攏絡派系、期望能以此獲得派系對它的政治支持(Wu, 1987; 朱雲漢、陳明通, 1992; 邱瑜瑾, 1996; 王振寰, 1996); 另一方面也刻意至少培養兩個派系互相制衡，並透過不改選中央民代、省長、直轄市長等選舉安排，以減少地方派系對中央政策的干預性(賴志彰, 1997)。

在 90 年代，有多篇關注臺中市發展與都市成長聯盟的研究誕生，他們都注意到威權國家、地方政府、私部門菁英與社區居民在都市發展上的利益衝突，以及結盟、協商與對抗的社會過程(陳美智, 1994; 王振寰, 1996; 湯國榮, 1996; 賴志彰, 1997)，研究者們大多指出在 1977 年以前的臺中市地方政府，其作為大多受限於當時政治經濟環境(威權國家、冷戰結構)，而難有自身的發展意志和戰略可言。

當中主要的限制有兩大類：一是國家級防空疏散計畫下對都市營建和擴張的管制；二是重農、保農的思想指導下對都市計畫的桎梏與限建(黃樹仁, 2002)。

隨著國民黨的黨國—地方侍從體制越趨彈性和完備，開始允許有限度的民主開放。加上地方成長意識的興起，地方派系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反而出現競合變化，並提供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與發展上的相對自主性，地方派系亦逐漸深入涉入都市發展的過程中(陳美智, 1994; 王振寰, 1996; 湯國榮, 1996; 賴志彰, 1997)。

相較於停滯難前的空間發展，50 年代的臺中市政府將大部份的注意力放在經濟成長。「(經濟)成長」迄今仍是臺中市最重要的發展核心，如同湯國榮(1996)所指出的，自從 1953 年國府實施第一期經建計畫後，經濟成長便成為國家發展的主要目標，配合國家的經濟發展，推動工業開發與重大建設以帶動都市的發展是臺中市在該階段都市成長的主要動力。經濟成長是發展型國家通見的共識，也是政府重要的正當性來源，特別是在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經濟起飛」時期，臺中市政府會與多數市民團體透過媒體或是議會，要求市政府推動各項都市建設和措施來增進全市的繁榮(湯國榮, 1996)。由湯國榮(1996)整理之「1961-1977 年臺中市都市成長議題」一表，可看到都市成長意識的內容不外乎：1.都市計畫道路的興闢、拓寬、巷道打通與輻射型、環狀道路的規劃與開闢；2.都市計畫範圍的擴大(應以百萬人口為目標進行計畫)；3.工業區的開發與擴大；4.觀光事業的提倡；5.提高土地利用；6.國際機場的開闢；7.省城機關單位遷移至臺中市。事實上這些訴求部分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的發展經驗，部分則出於經濟成長與現代化的目的，也有臺中市希望不被(政治)邊緣化的心聲。這些成長意識形態在之後多年均是臺中市的基本「市策」。

總結 50 年代-70 年代的城市發展與戰略，可以做出以下五點陳述。一是國家意志凌駕於城市的發展；二是城市發展與戰略配合國家規畫，國家規畫下形成的都市成長意識形態將成為臺中市最重要的戰略方針和價值觀；三是地方派系正在成為臺中市都市政權中的重要行動主體；四是不均等的國家—地方關係，既限制臺中市向屯區的發展，也令中區超強度開發而埋下日後長期衰敗的遠因；五是過

於追求經濟成長(以及缺乏足夠的都市社會空間)，「文化城」自此蒙塵，並將一再為市民所呼喚。

和對「文化城」殷殷呼喚相對的是，過於狹隘和「無章」的都市空間孳生由非正式部門所支配的都市地景，夏鑄九(1993)認為這是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依賴發展下之依賴都市化，非正式部門與聚落形成依賴城市裡的依賴文化。他們堵塞了日本人遺留的「血管」，代表性地景之一是綠川、柳川沿岸的大量違建，這些違建戶多數是大陸內戰後的遷臺移民。綠川兩岸的違建在 60 年代中期開始陸續被拆除，到近年剩下若干違建猶存，形成「吊腳樓」的特殊景致，只是這些殘餘的違建仍於 2010 年因臺鐵高架化工程徹底被拆除。

### 3-4 戒嚴後期：1977 年-1989 年

70 年代號稱臺灣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為滿足發展所需，70 年代臺中地區陸續有國家重大經濟建設完成：1971 年臺中(潭子)加工出口區、1973 年臺中港開埠(十大建設)、1976 年臺中工業區第一期完工、1978 年中山高速公路全線開通(十大建設)。這些大型經濟建設均位處臺中屯區外圍(甚至更遠)，緊抓此一機遇，臺中市於 1977 年開始如火如荼展開的第四—六期市地重劃，以及六十米文心路外環道的開闢，臺中市的城市空間正式向屯區發展。

#### 3-4-1 市地重劃

事實上早在 1965 年張啓仲擔任市長期間，便已開辦第一期市地重劃，後來兩任市長均陸續興辦市地重劃，不過這三期重劃面積都不大，僅有 1、20 公頃(參見表 3-3)。

表 3-3 公辦市地重劃成果統計

重劃期別	重劃區名稱	辦理時間起訖年月	重劃總面積(公頃)	提供建築面積(公頃)	辦理時任市長
第一期	大智	54.12-56.08	14.5283	11.0995	張啓仲
第二期	麻園頭	59.06-60.02	24.2614	17.5778	林澄秋
第三期	忠明	64.03-64.11	18.6491	10.9186	陳瑞堂



重劃期別	重劃區名稱	辦理時間起訖年月	重劃總面積(公頃)	提供建築面積(公頃)	辦理時任市長
第四期	中正	68.02-69.08	440.6556	311.0398	曾文坡
第五期	大墩	72.06-74.01	228.3124	156.742	林柏榕
第六期	干城	76.02-79.01	19.4306	13.16273	張子源
第七期	惠來	79.02-81.11	353.3983	202.5476	林柏榕
第八期	豐樂	77.07-80.12	148.7966	86.458	林柏榕
第九期	旱溪	79.04-83.04	120.3502	72.5515	林柏榕
第十期	軍功、水景	82.9-89.2	221.2018	118.0421	林柏榕-張溫鷹
第十一期	四張犁	82.02-86.08	141.0193	78.2623	林柏榕
第十二期	同心(福星)	93.08-97.08	81.050215	40.253708	胡自強

資料來源：<http://lohas.taichung.gov.tw:8080/ebook/indexc.htm>

及至 1977 年出身臺大政治系、無黨籍的曾文坡上台後，旋即推動諸多施政，最重要的當屬廣達 440.66 公頃的第四期重劃區、六十米文心路外環道和都市計畫(不包含大坑風景區)第一次通盤檢討。曾和臺中市過去市長不同在於，過去市長對於都市成長皆採取局部建設的空間規劃格局，缺乏整合性、全觀式的都市空間規劃藍圖(邱瑜瑾, 1996)。

通過對市內農業區的重劃，配合第一次通盤檢討，曾文坡既希望大規模的市地重劃舒緩緊張的居住問題，也希望對於房市亦起到以量制價的作用，並認為通過全盤檢討、全面規劃能遏制炒地皮的現象(邱家洪, 1995)。市地重劃豐厚的回收、顯著促進城市成長，以及其發還原地主比例優於區段徵收，開發阻擋亦較小，種種好處令後任市長們爭相開辦市地重劃。然而龐大的土地利潤也為政壇帶來風風雨雨，日後三位市長(曾文坡、張子源和林柏榕)均身陷重劃弊案傳聞當中，張子源和林柏榕更因此下台。而曾文坡開始的整體規劃政策和市地重劃熱潮，許多

學者均認為是以市長和地方派系為主的都市成長機器茁壯的契機(邱瑜瑾, 1996; 王振寰, 1996; 湯國榮, 1996; 賴志彰, 1997)。

60年代左右國民黨許以賴派、張派公車、信用合作社經營之寡占性經濟利益，到了70年代成為賴張二派進行土地炒作的雄厚資本來源。在此一基礎下，湯國榮(1996)指出地方派系運用下列方式從土地買賣中得利：「1.預售屋制度；2.透過政治的特權向省屬行庫高額低利取得大量的營建融資；3.透過都市計畫的過程從中牟利；4.透過人頭收購農地以搭配都市計畫的投機」。在此一背景下，市政府籌備的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再如何強調中立，亦免不了引發公私合盟的流言。事實上，就連都市計畫、市地重劃與建照預審等決議過程本身即充斥黑箱操作的爭議：無論是市政府官員或是專業人士，均在審議過程中承受極大的關說壓力，或者本身和親屬涉入旋轉門與白手套爭議，甚至直接運用職權向相關企業廠商索賄，更不用說普羅大眾被排除在決策和監督的議程之外(邱瑜瑾, 1996; 王光旭, 2005; 白錫鏗, 2011; 梁任瑋, 2013; 李建興, 2013; 劉東皋, 2013)。

對於市政府而言，市地重劃對地方政府財政的挹注甚豐，市地重劃既可讓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相關稅收又有地價稅、土地增值稅與抵費地的標售收入：這些重劃後的盈餘一部歸入地方政府財政局管理的平均地權基金，一部則歸入市地重劃基金。如此豐厚的條件致使追求都市成長的市政府難以因流言和抗爭而廢食。

辦理市地重劃不僅是財源，同時也是地方政府少數能獨自運用的發展手段之一。中央財政收支劃分法剝奪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導致地方政府財政自主率泰半不高，長期仰賴省府、中央的補助(湯國榮, 1996)。除了財政權外，無論是重要的經濟建設和文教建設，或是工商獎勵發展措施的制定，都需由中央主導，地方只能開闢道路和公共設施(湯國榮, 1996)，這也就是道路何以受到地方政府重視的原因之一(當然回扣也是重點)。

自曾文坡大舉開辦市地重劃成功後，土地增值稅與所得稅並列為二大重要稅源，臺中市政府的財政自有率一口氣提高至70%以上，同時也降低對中央政府的依賴。

市地重劃此後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成為臺中市(以及紛而效仿的各縣市政府)最重要的開發手段。李永展(1997)指出：「臺灣現有的區域計畫法，雖有法源，但屬指導性質，並無強制性；而縣市綜合發展計畫，雖無法源，地方卻做得如火如荼」，也就是說，相較經濟方面，縣市政府在土地運用方面掌握極大的自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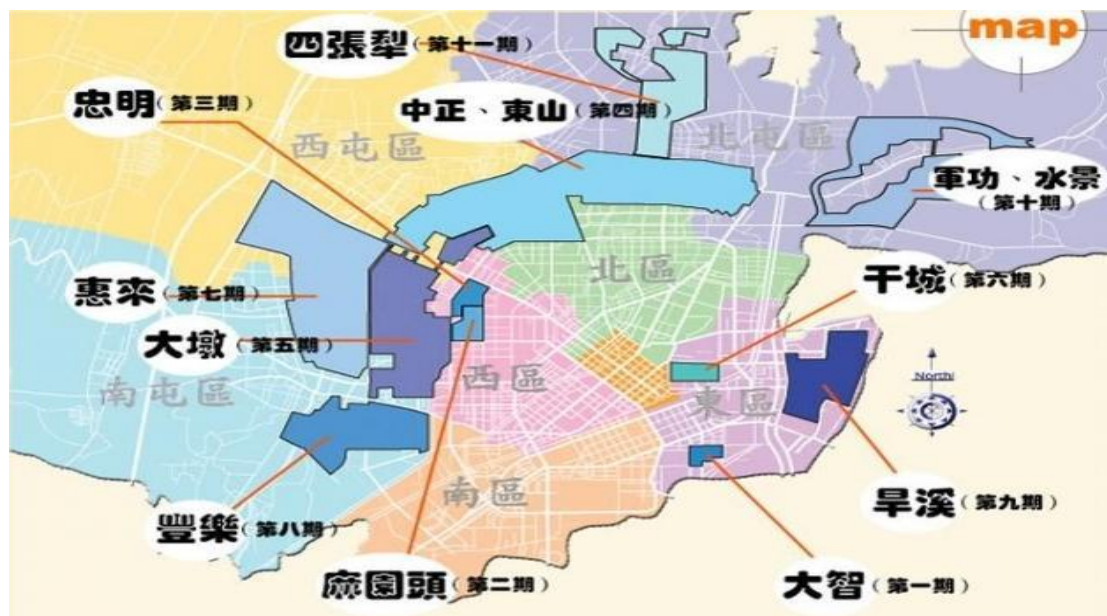


圖 3-4 公辦重劃區分布圖

資料來源：<http://lohas.taichung.gov.tw:8080/ebook/indexc.htm>

### 3-4-2 國際性商業文化城市

除了市地重劃，再現文化城和綠園道也是重要的成長戰略。文化城的項目偏向硬體建設，自 1973 年的陳瑞堂市長開始，迄林柏榕時代，近二十年間陸續完成孔廟(1976)、中正公園(1977)、臺中市立文化中心(1976)、臺中市立文化中心新館(1983)、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986)、臺灣省立美術館(1986)和中山堂(1989)等設立，加上多所大專院校落腳臺中，讓臺中重拾文化城的光環。

綠園道則是在張子源與林柏榕任上大力拓建，張子源首闢「經國大道」，其後林柏榕見成效良好，進一步對園道預定地(源自 1946 年的臺中市都市計畫)加以興闢，周遭亦興建住宅與商辦<sup>6</sup>。

在文化城復甦後，另一個影響臺中市發展戰略的關鍵詞彙「國際城」則由張子源正式喊出。張子源正式的口號是「國際性商業文化城市」，如同我們前面所說，「國際城」的說法早已存在，其它縣市也有類似口號，只是實際政策略有不同。

70 年代後期臺灣開始面臨產業轉型的難題。一般分成幾個不同發展的歷史

<sup>6</sup>不過若是稍加注意，可看到在林柏榕時期，公園里、綠地上、各種園道，大路的轉角等公地，紛紛蓋了一座土土地公廟，而且越蓋越大。曾任林柏榕市府主任秘書的邱家洪(1995)聲稱：「(這)都是因為里長伯(們)的神通廣大，咬耳朵叫林柏榕俯首點頭」。

階段(劉進慶, 1984)：1950 年代(1950-1962)內需導向，1960 年代開始的出口加工導向，1970 年代進行的深化工業化以及鄉村工業化的策略，1980 年代之後進行以微電子產業(PC, IC 等)為核心的產業升級。同時，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後，由於臺灣工資與環境上漲壓力，同時全球化經濟體系的確立，臺灣產業開始逐步大量的外移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等地區。

原本以機械工業、制糖和食品工業等產業著稱的臺中市亦在 1980 年代面臨產業結構的調整問題。一方面市政府向中央爭取航太工業和高科技園區(林柏榕第二任期)；二方面則希望通過將臺中市發展為國際城和文化城，能擴大臺中市的住商發展。國際城方面的具體戰略包含：臺中市升格為院轄市(提高政治地位、減少中央的政治與經濟控制)、興建國際機場和捷運，以及最重要的副都心的規劃。

### 3-5 成熟與衰退：1989-1997

整個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臺中市繼續高速成長、拓張都市範圍，並且隨著 1991 年到 1993 年的房地產狂飆時期來到巔峰。然而市地重劃的開發步伐在 90 年代前期就開始緩慢下來，但是空屋率長年居高不下，在都市開發上呈現假性擴張的現象(邱瑜謹, 1996)。

90 年代中期以後，六期重劃區以降的公辦市地重劃區的發展，陷入漫長的停滯期。六、七、八、九期重劃區因時逢房地產狂飆期，市府在短短 1990 年到 1994 年間就完成這四期重劃區的辦理。十期軍功水景重劃區雖然在 1993 年開始辦理，卻在不久後遭逢臺中市房地產開發的停滯期，直到 2000 年張溫鷹在任時才完成辦理。

六期干城重劃區地處市區，受到市區商圈多年淘空的影響，迄至今日仍停留在低度利用的階段。七、八、九期重劃區當中，又以七期惠來重劃區的開發困境最受人注目。

七期重劃區之受人注目，泰半因該區誕生在全臺土地狂飆時期。特別是在臺中市長達十年餘的炒地熱潮之下，重劃區幾乎等同獲取暴利的保證；其次是後期發展區(整體開發地區)的限建，1986 年通過的第一次通盤檢討中將大量農地劃歸後期發展區，待優先發展區(已開發重劃區)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開發(周美君, 2011)。限制農地他用的法令、分期限量的土地開放，和持續空洞化、卻難以有效重建的市區，均助長與堅定人民對重劃區增值空間的想像。

七期重劃區的特殊性，便捷的交通(鄰近中港交流道)不論，更重要的是區內的副都心特定區，鑒於臺中市市區狹隘與交通混亂的問題，早於曾文坡時期便已規劃在七期重劃區(1980年起辦理)建立副都心，並在1987年完成並公告副都心專用區細部計畫，計畫當中即以臺北市信義計畫區為模本(陳覺惠, 2005)，規劃市府、議會、國際機構、外國駐華機構、飯店、住宅、轉運站和公園綠地等建設，同時七期重劃區也是張子源意圖仿效美國大街廓(block)架構的具體體現。更在1995年第二次通盤檢討後從副都新調整為「臺中市新市政中心」，意圖實現臺中市發展的軸線翻轉(以及對七期重劃區開發的提振)。

因此七期重劃區時常與臺北信義計畫區相提並論，從而被賦予極高的投資/投機價值，因此即使七期重劃區的開發牛步化，偶而傳出的土地交易價格仍不斷攀升<sup>7</sup>。在這種預期心理的影響下，土地持有者惜售、進而採取土地閒置或養地，便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七期重劃區養地風氣由此特盛，特別以特種行業、汽車旅館、KTV、遊樂場和釣蝦場在這塊區域大行其道(沈國屏, 1996; 郭揚義, 2008)而聞名全國，更因七期南北通衢，而成為各縣市黑道的匯聚之地。形成七期重劃區難以開發的原因，除了極高的預期心理和重劃區低迷不振的房產買氣外，規劃之初較嚴苛開發法令規範也是原因之一(陳覺惠, 1999)。如同我們前面所說的，在美國城市和信義計畫區的想像下，七期重劃區實施高容積管制，更進行都市設計審議，後者是2000年前臺中市的唯一一例。這些因素，使得荒地、養地與窪地(與相鄰的五期重劃區對照)現象構成七期重劃區獨特的都市地景。

重劃區開發是臺中市長年以降實現成長之夢的重要手段，也是目的。張子源林柏榕共舉的「國際性商業文化城市」大槩，既以市地重劃為實現該戰略的重要財源，也是推動房地產投資的題材之一。

市地重劃在市政府與城市成長聯盟眼中，可謂萬靈丹、金雞母。林柏榕在1995接受遠見雜誌專訪時就稱：

臺中市的建設可以發展得那麼快，市地重劃功不可沒。我們這幾年用重畫的方式，一共有十二期，開發一千多公頃的土地，用編列三套特別預算的方法，開闢了七百多條道路、七八十座公園，以前的無尾巷都沒有了。此外，也開闢了第三期工業區。

---

<sup>7</sup>，此時期臺中新市政中心重劃抵費地標售底價每坪約40萬元~50萬元，但因適逢房地產最低迷的階段，標脫土地筆數不是寥寥可數，就是乏人問津，經統計自84年下半年起至94年十年期間共辦理10次標售，僅標脫12筆。



圖 3-5 臺中市都市計畫圖(第二次通盤檢討)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建設學院(2001)

無可否認的，在充斥利益輸送和公私掛勾之外，市地重劃的大舉開發確實為臺中市的財政和發展帶來飛躍性地成長。以公辦市地重劃最重要稅收的土地增值稅為例，從圖 3-4 歷年土地增值稅折線圖可以一窺市地重劃帶來地驚人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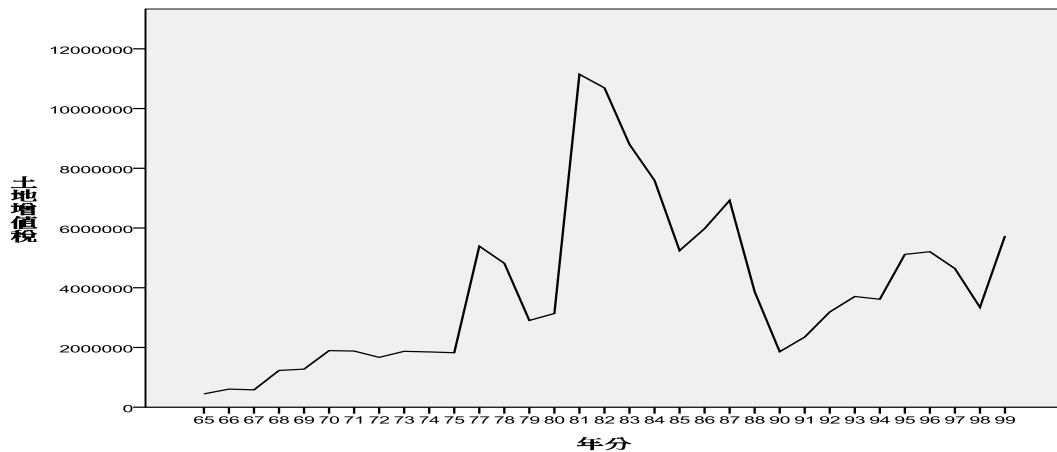


圖 3-6 1976 年-2010 年間土地增值稅折線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歷年臺中市統計要覽

然而政府帶頭炒房炒地的作為，是否形成普遍性的房價高企，以及是否阻止了移民和普羅市民的買房？或者是否波及民生物價，以致市井小民難以度日？還有，市地重劃的成長聯盟究竟侵蝕多少土地增值的實質收益，又有多少利益輸送導致公共利益被掠奪？

這些問題或許不易回答。不過我們能先觀察「國際性商業文化城市」戰略思考下的市政議程順位。

在臺中市議會第十二屆第三次大會上，時任市長林柏榕的 1991 年施政總報告，具體呈現臺中市當時的政策方向與重點(以下為原文順序)：

1. 發展交通，繁榮地方：開闢道路、大眾捷運系統規劃案；
2. 開發土地，興建國宅：市地重劃、新市政中心、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在林厝社區及鎮南社區辦理平價住宅、放寬容積率、臺糖臺中廠等大型土地開發案；
3. 整治水利，改善環境；
4. 辦好區運；
5. 推行社會福利；
6. 市政革新：市有公園、兒童遊樂場、停車場、市場及其他提供民間投資開發經營之公共設施用地，擬定有關獎勵投資開發經營作業規定

倘若林柏榕的市政總報告反映當時的市政議程，同一時間市議會議長林仁德的致詞則是直指臺中市在「國際性商業文化城市」願景下的戰略(按原文順序)：

1. 呼籲中央進行財政劃分法的革新
2. 臺中市合併升格、臺中港與大陸直接通航
3. 效仿新東京都廳及議會大樓之宏偉興築新市政中心
4. 發展臺中都會區捷運系統，應採與國外財團或工程公司合作的模式

諷刺的是，在「國際性商業文化城市」的口號之下，卻是文化預算的低落。從圖 3-5 可以看到，五座省轄市當中，1980-2000 年間臺中市每年的文化支出佔所有支出的平均比例最低，僅有 0.63%，是嘉義市(3.08%)的五分之一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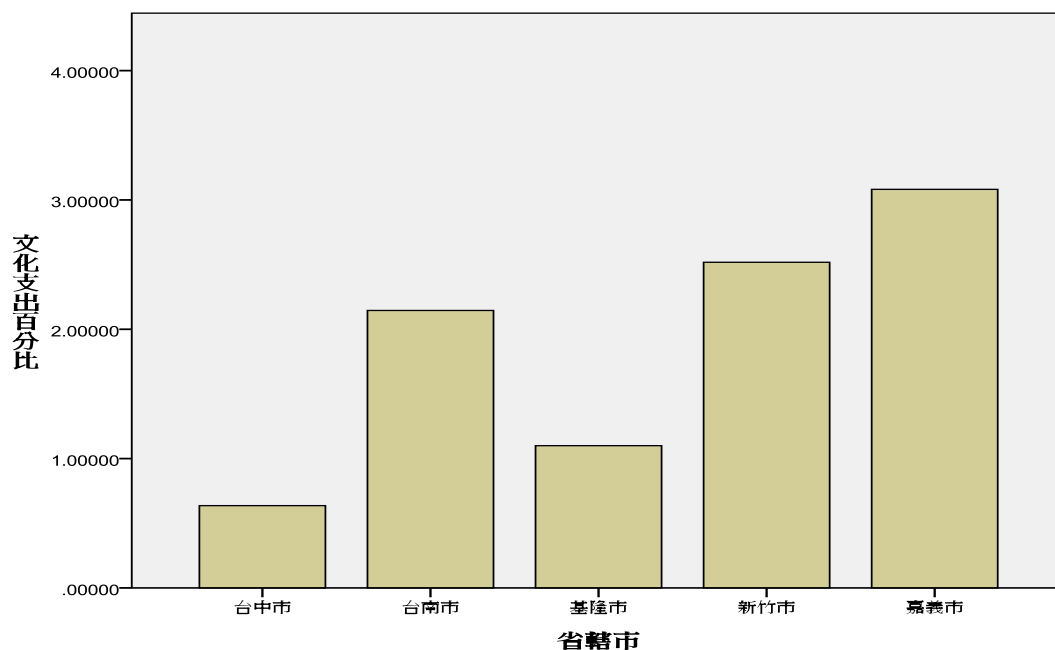


圖 3-7 1980-2000 年各省轄市每年文化支出佔所有支出的平均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各縣市統計要覽

與文化支出相較，道路建設支出雖然不見於統計年鑑登載，卻是以特別預算編列大舉進行的重要市政建設。特別是林柏榕第二次擔任市長時期，臺中市區已因市地重劃開發的步伐而蔓延到屯區，重劃區內部的道路之外，各種聯外道路與屯區舊有巷弄的開拓就此排上日程，目的除了選票和人情請託的壓力，城市的成長也是因素之一(湯國榮, 1996)。

然而在重劃區發展陷入停頓，原本挪用重劃區抵費地結餘的道路工程無以為繼，林柏榕轉向省政府借貸。1998 年停收工程收益費更致使臺中市由全省財政自有率最高的城市成為負債較多的都市之一(湯國榮, 1996)。

市地重劃既是市政府在成長價值觀下，遂行相關戰略(例如國際性商業文化城市)的少數手段和財源之一，然而這也強化臺中市成長聯盟對此發展模式的依賴性。

從七期的發展歷程中可以明顯看到此一戰略下的空洞蒼白。無論是「國際」、「商業」或是「文化」，均有服務於炒地炒房的嫌疑，一旦類似的題材不新鮮了，也就難以刺激供給失衡的房地產業。一旦重劃土地超量供給，加上大環境的變化，房地產產業易陷入長期性的景氣低迷，該發展模式和以此為基礎的戰略藍圖亦會受到衝擊，這在接下來的 90 年代可以看到。

### 3-6 臺中市的發展模式與路徑轉折

在第三章與第四章中，我們回顧了臺中市發展路徑與模式特性的形成，本節試圖對此進行小結。臺中遲至清末才基於政治考量建城，發展卻至為迅捷，除開短暫的清末省城時期，1895-1997 百餘年間各發展階段的發展條件和制度環境頗有差異，實際發展手段和路徑卻呈現高度一致性。

臺中市一方面做為中部區域的中心，另一方面做為地方政權長期位處國家政經中心邊陲，此一位置受限於不同時期的國家體制而有不同的自主性。在日治時期，作為帝國主義後進國的日本，致力於殖民現代性的打造。因清國遺留的省城框架，提供日本統治者極佳的城市試驗機會：通過推動都市計畫(市區計畫)以創造理想的現代化城市，同時也允許地方望族大姓有限的經濟權、文化權，甚至是政治權，是日治時期臺中市蓬勃的臺人文化和自治運動的背景。

臺中市近代的鄰里和地方派系關係基礎固可追溯至日本、乃至清領時代的聚



落型態，更多取決於國民黨政府遷臺後臺中市發展模式。此一模式結合 1.國府強烈權宜性和意識形態的土地政策，2.黨國—地方侍從體制，3.日治以降臺中市特殊的都市地位和都市計畫經驗。該模式遲至 1970 年代後期方隨著大規模的市地重劃正式浮現，不僅可歸因於臺中市的非國民黨籍市長上台，更應注意到 1970 年代後期全球與黨國的一系列政經變化。這段期間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兩次石油危機、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國內外的政治自由思潮，在在衝擊臺灣過去二十年間作為發展型國家的統理模式。國府既調整國土政策(參見下圖 3-6)、出臺以十大建設和大型工業區為首的重大經建因應衝擊；又改革稅制，特別是 1977 年頒布《土地稅法》和 1981 年修正直接規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前面數節的討論已能清楚看到這些建設和稅制的變化，對於確立臺中市以市地重劃為主發展模式的關鍵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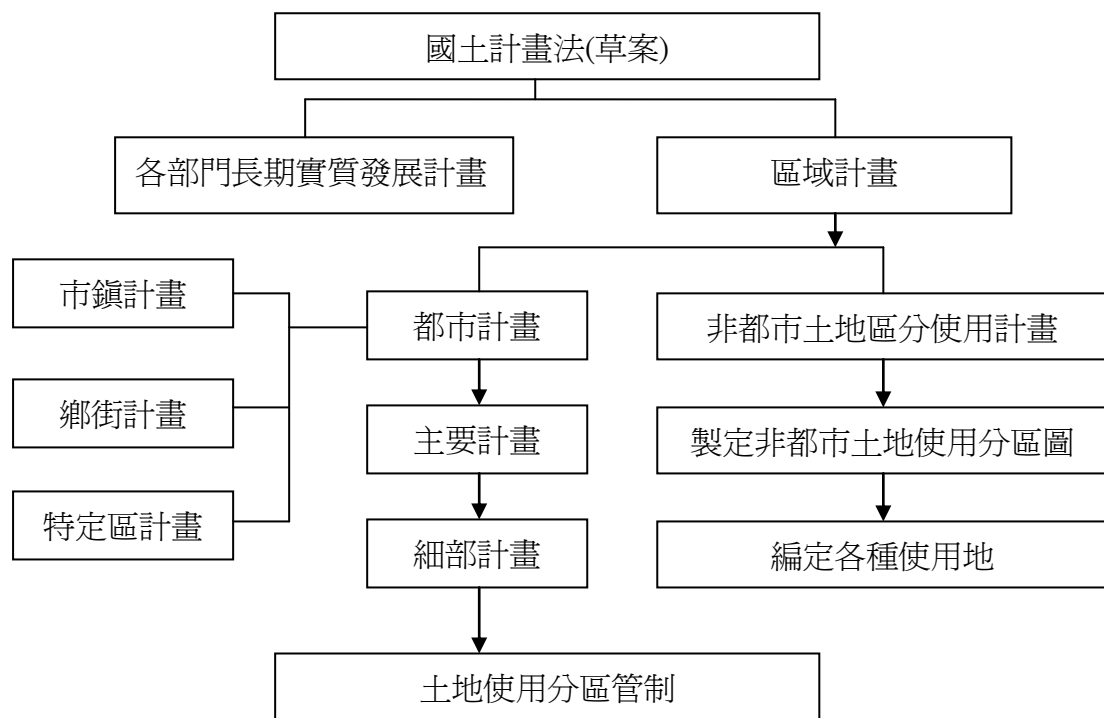


圖 3-8 我國土地規劃與管制體系 資料來源：引自徐世榮、廖麗敏(2012)

市地重劃為主的發展模式既有其歷史依循，也為臺中市發展烙印投機、炒地的色彩。然而也必須指出該模式對於臺中市城市化過程的助益，在發展型國家的結構性限制下，市地重劃是深具發展性格的臺中市政府(及其政權聯盟)有限的手段之一；同時可預期的高報酬率亦能有效成為市民參與重劃的誘因，大幅減少此一時期臺中市都市發展的阻力。

另一方面也能看到隨著大量的市地重劃，同時引進不少外移人口，甚至改變原有的鄰里與地方派系型態，促使臺中市走向都會型政治；然而土地資本化亦供給屯區地主厚實的政治經濟資源，支持地主(傳統望族大姓、地方派系和新興田僑仔)持續投入臺中市政治領域，以市地重劃為基礎的利益攫取模式基本不變(曾國鈞, 2002)，這也是曾文坡之後，歷屆市政府多傳與房地產商關係密切，而受炒地之譏，甚至市長自身被捲入炒地疑雲和官司(參見表 3-3)。

表 3-4 民選後臺中市歷任市長與相關弊案

在任期間	市長	黨籍	弊案及附註
1951-1954	楊基先	無黨籍	
1954-1960	林金標	中國國民黨	
1960-1964	邱欽洲	中國國民黨	
1964-1966	張啓仲	中國國民黨	停職(國校掛圖舞弊案)
1966-1967	羅立儒	中國國民黨	代理
1967	張啓仲	中國國民黨	撤職(掛圖案)
1967-1968	羅立儒	中國國民黨	代理
1968-1973	林澄秋	中國國民黨	
1973-1977	陳瑞堂	中國國民黨	
1977-1981	曾文坡	無黨籍	
1981-1985	林柏榕	中國國民黨	
1985-1989	張子源	中國國民黨	因七期八期市地重劃圖利傳聞調職
1989	黃鏡峰	中國國民黨	代理
1989-1995	林柏榕	中國國民黨	因衛爾康大火事件休職
1995-1996	陳正雄	中國國民黨	代理
1996	林柏榕	中國國民黨	因十期市地重劃圖利傳聞停職
1996-1997	林學正	中國國民黨	代理

在任期間	市長	市長	弊案及附註
1997	林柏榕	中國國民黨	判決無罪准予復職
1997-2001	張溫鷹	民主進步黨	
2001-	胡自強	中國國民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土地房產投機與公私利益輸送的風雨之中，我們試圖強調另一個同樣重要的面向，即臺中市的發展似乎過於依賴特定模式，該模式從價值觀、手段和政策論述均保持延續性，在既有的國家—地方格局下，我們難以直接對地方政府的作為驟下道德性評斷，然而可以注意到當發展型國家走到瓶頸的同時，該模式亦出現各式問題。

## 第四章 臺中市的全球化戰略

### 4-1 臺中市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困境：1997 年-2001 年

1990 年代，全世界興起地方民主與地方自主的浪潮(廖坤榮, 2005)，臺灣也不免於外。特別是當臺灣在 80 年代後期遭逢民主化與經濟衝擊，過去威權體制下的中央—地方關係出現動搖。於是到了 1994 年公布「省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臺灣的地方自治終於被法制化。1999 年公布「地方自治法」，地方自治團體為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且不僅能辦理「自治事項」，還能辦理中央的「委辦事項」。地方縣市的角色、權限、職能、功能和地位終於有實質的提升，並且逐漸落實地方自治的事實。財政方面，1999 年 1 月配合精省工程，財政收支劃分法進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修正，省在實質上被廢止。

此一治理變化的趨勢同時段亦在亞太各個發展型國家發生，城市政府開始自亞太地區浮現。同時期亞太區域普遍面臨的全球化挑戰，為各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帶來新的危機與機會(請參見第二章的討論)。

首先是政治面向上，臺中市政府領導人的角色日益突出。過去，除了代理市長，歷任臺中市市長各自頗具性格；如今更因城市政府權能的提升，市長領導越顯重要。

因國民黨與地方派系出現分裂，臺中市政府在 1997 年迎來民進黨首次執政。儘管張溫鷹本人亦有派系色彩<sup>8</sup>，在執政上卻汲取多位前任市長的教訓，刻意和派系與財團保持距離，加上其餘個人特質，地方派系對她頗有不滿，市政府與市議會關係亦時常陷入緊張(郭佳綾, 2010)。

另一方面，臺中市的地方政府權限固然擴大，卻沒有相應的財政權。面對此一困境，張溫鷹一則爭取臺中市準院轄市地位，同時將施政重心由大型建設(如張溫鷹競選時提出的國家音樂廳、捷運、巨蛋體育館、鐵路地下化、汙水處理廠、垃圾掩埋場等建設，這些大部分也是前任遺留的規劃)和市地重劃，轉向社區的景觀營造，並由此喊出「宜居城市」、「生活首都」的口號。在臺中市議會第十四屆第一次大會上，張溫鷹的市長報告除強調歲入陷入困窘，將採「總額預算法」，亦可看到市政議程因財政問題產生的變化(排列按原順序)：

---

<sup>8</sup> 出身臺中張家，公公是前市長陳端堂。

1. 行政革新
2. 交通秩序：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
3. 第三次都市通盤檢討
4. 社會福利：興建國宅

不過「宜居城市」和「生活首都」並非放棄以房地產為主要戰略核心，張溫鷹本人就曾於 1999 年推出「行銷臺中列車」、親自前赴臺北賣房子(劉秀英, 1999)。事實上，政府未能提出足夠吸引力的願景也是原因之一。劉曜華表示，從 1987 年興建科博館與美術館之後，就沒有大型的公共企劃案。大家都只在談未來的計劃，例如：捷運或機場(何道明, 2002)。

從國際城轉向宜居城市的戰略調整，可見與這一階段的財政、經濟困境有關。1995 年林柏榕主政時期，市府辦理新市政中心國際競圖，最後由瑞士的 Weber + Hofer AG Architects 建築師事務所得標，既是全臺灣各地方首例，也是臺中市以國際城作為戰略目標的重要宣示。然而就如同眾多只聞樓梯響的重大建設一般，國際競圖後新市政中心便以經費不足為由停建(另一理由是設計耗能，不符國際環保潮流)。

新市政中心的停建和臺中市在 90 年代初期眾多大型建設(如筏子溪風景區計畫、體育城、臺中都會綜合體育園區、巨蛋)難產不同，後者多因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遲遲不允補助而礙難推行，前者則因市政府財政困難而陷入長期停擺。兩者除了歸結於經濟大環境的困難外，地方面臨的困境也是顯而易見的。

如同前一章最後一節討論的，因房地產開發停滯(景氣不佳、缺乏資金投入、重劃區地價過高、國際建材原物料上漲)、道路建設舉債等原因，導致市政府財政結構不佳，進而影響市府重大建設的推動。

提到臺中市的發展，就必須提到的臺中市的房地產，亦在 1998-1999 年間遭逢三次重大打擊(挑戰)。一是 90 年代全台範圍內逐漸強化的容積率管制，以及法規實施前的搶建風潮推長泡沫；二是 98 年亞洲金融風暴引發的建商集團跳票潮：據瑞聯機構總裁周啓瑞指出，在 1993 年臺中市房地產全盛時期，涵蓋登記、未登記至少有一千家以上的建設公司，之後臺中大型建設公司更紛紛申請上市、企業多元化與財團化(彭杏珠, 1998)。然而過度融資進行擴張，以及 90 年代中期以降的房市不景氣，更重要的是 1998 年遭遇了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因實施容積管制，引發搶建(照)浪潮，造成巨量的餘屋滯銷，臺中就有眾多大型建設公司將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的資金壓在房地產上，形成龐大的財務壓力(夏鑄九、成露茜、楊友仁, 1999)。98 年從瑞聯建設公司開始，陸續有傑瑞、廣三等大集團爆發財務危機。三是 921 集集大地震，臺中地區受創甚深，房地產業亦是災情慘重。

房地產的供過於求，一般認為反應在臺中市高居不下的空屋率。彭建文(2004)根據住宅普查和「臺電用電不足度戶數」指出，臺中市在 1980 年時的空屋率為 15.06%，在臺灣各縣市中排名第 6 位；但是到了 1990 年時空屋率來到 19.69%，已是全臺第 1 位；在 2000 年時則是 26%，而臺中市的高空屋率自 1993 年突破 20% 後已持續了 7 年，並且穩定的高出所有縣市。

高空屋率通常隱含資源的浪費，特別是對公共資源而言。臺中市的空屋多位於市區，如何復甦空屋，或者是放棄<sup>9</sup>，迄今仍是難以迴避的挑戰。再進一步探究，相較於集中於市區的高空屋率(30-50%)，非正式部門在城鄉結合部，特別是工業區和大學外圍浮現，顯示臺中市在高空屋率的表象下，可能仍就長期存在對住宅的需求，尤其是能夠提供(臨近)就業崗位的中低價位住宅。

臺中市在上世紀末與本世紀初除了面臨有限的財政資源，還有在全球金融經濟網絡上的弱勢。在臺北都會區經歷產業再結構化、逐步進入服務工業產業模式(service industries)後，臺中市仍舊以消費型服務業和中小企業為主體的代工工業為主要的產業模式，技術密集的高科技工業遲至 2002 年中部工業科學園區(以下簡稱中科)行政院裁定籌備建設、2003 年正式動工開發以後才浮現。

臺中市在 1986 年以後，工業在產值及就業人數即呈現持續下降的現象，開始轉型以服務業為主，即進入了「脫離工業化」階段(逢甲大學建設學院, 2001)，在產業空間方面，製造業的大小工廠亦從市區轉到屯區。儘管製造業比例下降，卻仍然是大臺中地區的經濟基礎，特別是臺中的工具機與精密機械，多年來已在中部地區形成綿密的產業鏈。90 年代後，工具機產業處於全球技術與市場變遷以及臺灣制度與整體產業再結構的壓力下，面臨生產類別的擴張與生產地理區位的移動(呂靜瑜, 2002)，此點可以從製造業的員工數和產值的成長在 90 年代後期出現停滯可以看到。

文化方面，臺中市深陷治安與八大行業的困境。張溫鷹雖試圖大力掃黃掃黑，卻未能扭轉整體形象。箇中原因我們已在前一章最後一節中說明，重劃區過度擴張和炒地的惡果在此一時期表露無遺。公共安全、治安、交通等項目在不同的地方競爭力調查中都位居後段班(逢甲大學建設學院, 2001)。如何擺脫此一發展困境，遂成爲下屆政府亟欲改變的方向。

另一個較明顯的問題，也是烙印至今的負面形象：風化城。前面已說明七期的養地現象，事實上早在房地產狂飆的年代，隨著熱錢流入市區的還有八大行業的異色消費，以及全國前茅的刑事案件數。

---

<sup>9</sup> 關於對空屋的「放棄」，E Glaeser(2011; 2012)有相關的討論。

總結到 2002 年為止，「國際」、「商業」和「文化」流於口號而對資金的吸引力不再，更有人認為在各縣市競相喊出類似口號、推出類似建設，卻沒有實質內涵與差異時，臺中市已成為無特色的城市(邱瑜瑾, 1996)。即使政黨輪替、另將臺中市定位為「宜居城市」，依舊無法擺脫「無特色城市」的困境。臺中市的形象更代之以敗壞的治安和充斥異國風情的異色產業，形成另類的「國際文化城」。

在下一節我們將會看到，身處經濟全球化的陰影(產業流失)同時，臺中市政府更關切房地產「振衰起蔽」(特別是 921 大地震後)，以及取得更多、更重要的城市地位，它是如何與全球化搭起橋樑，並且「走向世界」的過程。

表 4-1 2001 年以前臺中市都市發展地位、性格與戰略目標

別稱	緣由
臺灣省城	光緒 11 年巡撫劉銘傳曾請清廷撥款興築臺中城做為統治控禦臺灣的政治中心，後因省城改建臺北，光緒 18 年終止築城。
小京都	在日據時代，日本人即希望透過綠川、柳川、臺中公園、臺中火車站等將臺中塑造成「小京都」的風貌。
文化城	1921 年成立的臺灣文化協會及 1934 年成立的臺灣文藝聯盟，使臺中的文化影響力幅射甚遠，成為臺灣最突出的人文薈萃之地，「文化城」的美稱自此開始遠揚。
省府門戶	1956 年省府遷入臺中市辦公，1957 年省府遷入中興新村辦公(人員與眷屬約有 3 萬人左右)，使臺中市成為通往省府的大門。
大學城	自 50 年代後東海大學與中興大學先後落腳於此開始，迄今大台中都會圈已座擁十餘所大專院校，並創造出逢甲、東海等大型消費商圈。
綠川城市	日據時代小京都的基礎，加上國府遷臺後園道的規劃，使臺中具有綠川、柳川、梅川及綠園道等獨特的景觀資產。
國際性商業文化城市	張子源提出的臺中市發展願景，係臺中市早期成形的戰略性願景，林柏榕繼承之。
消費城市	百貨公司、量販店雲集，容納了各十餘家的百貨公司及量販店。為中部各縣市消費中心，由衛爾康大火中燒死的六十餘人中僅三人為臺中市籍即可看出。
移民城市	從 921 大地震當中清查的大樓有 90% 未入籍臺中即可看出。

別稱	緣由
風化城	特種行業聚集，從以前的舊市區到四期、五期、七期、十一期重劃區等。
投機城市	研究者從「成長機器」的角度研究臺中市所用的名詞。
虛胖的城市	有學者認為：「臺中市這個青少年是個小胖子，有同年齡的小孩不該有的肥胖。這個只有百萬人的都市，如果晚上從高速公路走過，看見一片燈火通明，空蕩蕩的重劃區中只有幾點閃爍的霓虹燈，除了誘人的聲色場所外，你會懷疑這個城市真有其經濟實益嗎？從研究城市發展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虛胖的城市。」(中國時報，1995/8/17)
產業空洞(脫離工業化)的城市	依 1995 年完成之「臺中市都會區發展策略研究」指出，1986 年以後，臺中市製造業在產值及就業人數即呈現持續下降的現象，而服務業則相對的不斷在上升，依此推論，臺中市自 1986 年後即開始步入「脫離工業化」階段。
優質文化生活首都	2001 年在就職三週年的記者茶會上，面對媒體質疑臺中市由文化城變為風化城一事，張溫鷹呼籲勿以臺北看天下，並提出臺中市已成為優質文化生活首都。
最適居城市	1996 年遠見雜誌之臺灣最理想居住處排行榜中居第三位，僅次於新竹市及臺北市。2000 年康健雜誌評比一臺中市是臺灣最適合居住的「健康城市」第一名。

資料來源：修改自逢甲大學建設學院(2001)《修訂臺中市總合發展計畫 2002~2013》

## 4-2 領導、願景與戰略

2001 年中國時報、東森電視台合辦的〈地方競爭力調查(25 縣市)〉中，在臺中市幾個落後項目當中，「居民認同」就是其一(逢甲大學建設學院, 2001)。「居民認同」反應了他/她對所住城市的情感，也是因為這個城市缺乏足夠的願景和吸引力，這城市政府而言，不啻是一項的警訊。

胡志強於 2001 年上台後，在特定方面幾乎都是和他的前一任張溫鷹對反，比如領導風格、府會關係、政商關係、城市願景和戰略勾勒都有極大的不同。出身外交官的胡志強，顯然對形象和全球趨勢十分敏銳，並且注意到可資操作的戰略性題材。從後面的討論中，可以很明確看到其領導下的臺中市發展，「文化城」



與「國際城」不再僅是空洞無實的口號，而具有一定的戰略傾向，並且與全球趨勢緊密相關。

在領導風格方面，胡志強被認為較傾向授權、協商型首長，根據郭佳綾(2010)對張溫鷹和胡志強的領導風格研究，訪談數位市政參與者後，得到兩位臺中市領導人的領導風格(形象)比較如下表：

表 4-2 臺中市兩任市長領導風格(形象)比較表

領導型態三層面	張溫鷹	胡志強
角色類型	看守型政府	城市企業家
權力運作態度	衝突緊張	和諧尊重
政策執行導向	以臺中市民生活品質提升為主軸	創新策略、城市優勢競爭力提昇、塑造區域治理夥伴關係

資料來源：郭佳綾(2010)

兩位前後任市長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差異，即是胡志強上任時面對的中央不再是國民黨執政。地方和中央的關係很快就在古根漢事件中受到考驗並且留下了芥蒂<sup>10</sup>，然而胡志強的全球化戰略並未就此中斷，而是更為積極的利用一切舞台，不斷宣傳、不斷喊出口號。

如同我們在第二章分析的，全球化觀念和經濟文化影響，帶來了城市之間的競爭和學習效應。當過去的發展模式出現瓶頸時，全球化提供了改變的指引和說服力，儘管在地城市的各種條件與特質不盡然和模仿對象相符。

早在胡志強 2001 年競選臺中市市長之際，就已喊出「文化、經濟、國際城」的口號，並且在當選後迄今都未再改變。不過並不是說十餘年間未再喊出其它口號；相反的，在胡志強時代，光是他本人就提出逾十種城市口號(請見下表)。

表 4-3 臺中市近十年的城市戰略和城市定位

城市定位	提出時間點與背景
文化、經濟、國際城	胡志強於 2001 臺中市長選舉時提出以「文化、經濟、國際城」為議題，將在「地球村」中，朝著這三項主軸前進。
棒球首都	2007/01
亞洲遙控飛行之都	2007/10
國際之都	2008/05

<sup>10</sup> 胡志強在一場座談會中，說出「古根漢美術館失敗，是民進黨中央補助款未下來」，遭到民進黨市議員痛批推卸責任。(唐在馨, 2010)

城市定位	提出時間點與背景
世界的大臺中	2010/08，胡志強於(大)臺中市長選舉期間的競選口號
觀光大城	2011/12
蔬食首都	2012/04
世界蔬菜水果之都	2012/06
東方花都	2012/11
台萊塢	2012/11
臺中數位城	2012/12
創意之都	2013/01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2013)、自行製表

從上述眾多城市口號當中，一則最重要的仍是「文化、經濟、國際城」，其餘口號基本上並不出「文化、經濟、國際城」的範疇，特別是 2010 年後的口號，大多是針對舊臺中縣所作的宣傳；二則顯示了胡志強「創意」的特質，不過此一「創意」在性質上更接近房地產商慣見的行銷宣傳廣告，凡事不吝於吹、拉、捧。

然而這些口號代表的究竟是治理制度轉型，或者只是政府的政策論述？從下面二表我們似乎能夠看到臺中市「走向世界」的企圖和決心的證明。

表 4-4 近年臺中市獲選國際城市治理評比獎項

年度	項目
2007	入圍世界領袖論壇文藝城市獎
2011	全球 21 大智慧城市
2013	全球頂尖 7 大智慧城市

資料來源：自行製表

表 4-5 近年臺中市參與、主辦重要國際會議

年度	項目
2011	參與亞洲國際地產投資交易會(MIPIM ASIA)
2011	亞太清潔能源高峰會議暨國際展覽
2011	出席澳洲主辦「城市與地方政府聯合會亞太分會理事會」
2013	第 64 屆「世界不動產年會」在臺中市

資料來源：自行製表

胡志強早在第一任期之初，便常自詡是「店長」，提出「市政靠市場(marketing)，市長如店長」的說法，認為市長就是要讓「臺中市賺錢」，更有句名言「文化是門好生意」(胡志強, 2005)。除了如同 90 年代在歐美興起的「企業城市」一般，城市政府試圖將都市發展的主要驅力從公部門移轉到私部門(公—私建設與經銷

合夥)，胡志強更融合文化與國際行銷的概念，將全球化視作一種市場機會。他時常說「把餅做大」：(林倖妃, 2010)

大臺中合併後和香港、新加坡比，一點都不遜色。以土地面積來說，大臺中是香港的兩倍大、新加坡的三倍，人口卻不到香港四成，也僅是新加坡近六成，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腹地。...(中略)...只要港口、機場好好發展，五到十年後就會成為香港和新加坡的對手。

以臺中港來說，近年已成為全國第二大國際港口，載客和貨櫃運量成長幅度還超過高雄。但中央長期忽視清泉崗機場，還有人說不能過度發展，以免搶走桃園機場生意，令我非常不能接受，因為這是消極的失敗主義。**臺灣要做的是把餅做大，不要手上拿小餅，還天天擔心誰大誰小，有本事的政府就要把餅做大。**

胡志強時常在訪談中強調和其他城市競爭，而且還是和全球城市或全球化城市競爭，既是宣傳手法，也是和世界進行連繫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也強調區域合作，特別是臺灣其他地方政府的合作，這也是一種間接將臺中核心化的論述(公共電視，2011年1月3日，胡志強電視專訪)：

我覺得大臺中發展的潛力驚人。很少人知道，臺灣第二大商港是臺中港，而且成長的幅度超過高雄港；很少人知道，五年以前清泉崗，一年只有三千五百個國際航線的客人，現在三十五萬，成長一百倍，還會成長下去。所以我覺得，我們和**香港、新加坡**比，有地方不如它，可是我們的農業有沒有比它強？我們的工業、產業、投資有沒有比它強？我們的文化：媽祖文化、客家文化，還有原住民文化，有沒有比它多元？所以我們在很多地方，真的競爭起來，不見得輸他們。三、五年不一定趕得上，但是我相信十年左右，大臺中的競爭力，不會輸給香港和新加坡，這我覺得是我們未來努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把自己比做香港和新加坡。我們不要老是跟臺北跟高雄比，因為比來比去，大家都在臺灣，我們走出去跟別人比，當我們進步的時候，整個臺灣一起進步。所以我會注意到，**到時候千萬不要把臺北和高雄邊緣化。**

由此可以看到，胡志強企圖超越過去臺中市時常陷入的「邊緣化」焦慮，以「全球定位」超克「島內定位」。哪怕只是為了建立形象(表象)，都不能再類似過去臺中市領導人僅是泛泛提出國際城。

論述要有力量，不能只說一次；也不能光說而已，還必須要有項目、有議題。不過比起天下雜誌記者替胡志強送上「創意總監」的光環：「化不可能為可能，

化創意為成品」(張翔一, 2008), 市長更像是他自況的店長, 而且是「預售屋店長」。胡志強的全球化戰略思路, 即是「國際行銷引導計畫、政策與建設」, 他為臺中市定下的「文化、經濟、國際城」願景, 加上「藝術搭台, 經濟唱戲」, 構成「國際佈景、文化搭台, 經濟與房地產唱戲」的戰略框架。

下面三小節, 我們就要分別分析臺中市發展戰略的文化、經濟與房地產三支柱和全球化的關聯。

### 4-3 文化全球化計畫

「文化」能夠「搭台」, 能夠成為熱門搶手的「好生意」, 就代表它有話題, 能吸引財源, 這本來就是臺中市過去的一貫認知, 卻在九十年代以前飽嚙「風化城」、「文化沙漠」、「工業城」的惡名後難以再起。胡志強意圖重新提起並壯大「文化城」的聲勢, 作法正是將文化與國際進行連結, 也是透過文化將臺中市和國際搭橋, 第一彈即 2001 年提出的古根漢(The Guggenheim Museum)計畫。

這時期如同我們在第二章提及, 大約在亞洲金融風暴過後, 亞太城市掀起「文化轉向」的浪潮。在臺灣, 以臺北市於 1999 年成立臺灣第一個縣市文化局為開端, 高雄市市長謝長廷亦提出促進市民藝術文化, 讓高雄走出「文化荒漠」, 並接連推出「城市光廊」(2001)、貨櫃藝術節(2002)等等文化建設與大型活動(王俐容, 2006)。然而胡志強早在正式上任之前即已提出的古根漢計畫似乎又有所不同。

2002 年, 「臺中市政府與古根漢基金會締約」; 翌年, 也就是 2003 年, 「古根漢議題」一躍成為《藝術家》雜誌評選該年度十大美術新聞中的第一名。作為一個從未落成的「古根漢臺中分館」, 其意義重要之處就在於計畫本身、以及它的失敗之上。我們可以從都市巨型計畫(urban mega-projects, UMPs)的角度予以討論, 一般 UMPs 包括了下列要素: (Kirs Olds, 2001)

1. 其發展隨著時間推進, 伴隨了各式各樣的資本來源;
2. (各式各樣的資本來源)互相形構;
3. 經由建設師, 金融業者, 工程師和規劃師發展和計劃, 他們在全球其他城市裡承辦過 UMPs, 具備相關工作經驗和/或知識;
4. 發展同時包含明確的和不言明的國際化策略;
5. 向海外企業和高收入個體兜售以為將來的租約和購買;
6. 設計出 21 世紀全球都會(global urban)「烏托邦」的象徵

「古根漢臺中分館」計畫由於未能實現, 也難以談論全球資金的交匯, 然而

這座由具全球知名度的設計師 Z. Hadid 設計的古根漢，確實已經成功為胡志強的國際化策略和 21 世紀臺中的烏托邦想象奠定基礎。在都市發展理論中，都市巨型計畫常置於都市更新、都市縉紳化等議題之內，然而因著在地發展的脈絡不同，UMP 並不總是服膺於上列要素。討論 UMP 的異與同，可藉以辨識城市發展從想像到實踐的過程和落差。

許多巨型計畫包含了明顯備受矚目，能夠快速使城市融入國際形象的建築。UMP 同時也與我們現代高度地視覺文化相吻合(Kirs Olds, 2001)，UMP 由此將全球化進程和城市的形塑聯繫在一起。Appadurai(1996)亦認為，UMP 是檢視「全球化世界(globalizing world)中的場所是如何浮現」的適當「位置」(sites)。

儘管「臺中爭取古根漢進駐事件」最終以臺中市政府失敗告終，然而從相關研究中即可看出古根漢與全球化的連結：有從古根漢本身在世界各地的「成功」或「迷思」的模式加以分析(如秦裕傑,2004; 張怡馨,2005)，或是從「古根漢效應」探討其如何成為全球化現象、對臺灣文化政策的衝擊又是如何(如蔡昭儀, 2004)，將古根漢視作全球化下文化城市計畫的一環(洪佳君, 2002)，也有分析古根漢臺中分館計畫所突顯的都市發展問題或本土文化的反思(夏鑄九,2003; 黃海鳴, 2004)，更多是從政策、政治層面看待古根漢臺中分館的失敗(劉錫郎,2006; 曾翊昱, 2005)。

一方面 Z. Hadid 設計的「臺中古根漢」的極度幾何化和現代化風格，精準掌握全球化流動空間的特質(陳昀勤, 2005)；二方面，古根漢不僅以企業的方式操作、行銷，更試圖以西方霸權的符號象徵植入他者空間，成為新的奇觀。對臺中市而言，巨大建築與文化奇觀象徵了全球化、高科技與國際化的符號效果，特別是讓臺中獲得國際聲譽、能見度上升。

在「臺中爭取古根漢進駐事件」的過程中，胡志強一再援引畢爾包的成功案例，強調古根漢將帶來的驚人經濟效益，他更親自飛往紐約，拜會美國古根漢美術館基金會執行長 T. Krens，力邀後者到臺灣做一趟臺中的考察之旅(藝術家, 2002)；然而同樣的一件事，卻也遭到「花七千萬買一場大夢」的批評。此後一些大型的藝術嘉年華亦可見到類似的模式一再上演。

在古根漢失敗後，胡志強在巨型計畫的提出方面採取鴨子划水，選擇先從較軟性的臺中國際文化形象入手，並且提升臺中市民的「國際觀」。在 2008 年 1 月 390 期的天下雜誌報導，即再次強調了文化如何讓一座次級城市與全球搭橋：(馬岳琳, 2008)

擔任過外交部長的臺中市長胡志強，視野並不侷限在臺灣。他不僅僅

是以超越首都臺北為目標，而是將臺中定位為亞洲的藝術之都，「我不一定要做第一，但我要做唯一。」他用愛丁堡藝術節的氣勢想像臺中文化季，用東方維也納的規模期許臺中的藝術氛圍。

營銷學學者 M. Kotler 指出，雖然有些都市缺乏吸引力，透過增加新賣點以增加競爭力就是可行的方法，主要的方式有幾種：自然風光的強調，歷史與名人的連結，購物中心或是娛樂場所的建立，文化景觀的設計；節日慶典；建築、紀念物或是博物館；運動場或是重要賽事的舉辦等等(王俐容, 2006)。

臺中不斷地邀請世界級的藝文明星到臺中演出。包括了在 2003 年，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來臺的首場演出、2004 年知名大提琴家馬友友在臺灣唯一的一場「絲路之旅音樂會」、以及 2005 年帕華洛帝的「世紀告別巡迴演唱會」，他也選擇臺中為在亞洲最後一站的演出。在八年後市長指出藝術嘉年華的戰略卓有成效，不僅讓市民更親近藝術文化，也讓世界級明星親近臺中：(關鍵對話，2012 年 11 月 16 日，胡志強電視專訪)

我臺中就要做文化、藝術、展覽、表演、教育，以文化做為一張臉。臺中市平均一個市民，100 萬市民不到啦 92 萬吧，92 萬市民每一個市民一年參加 3.92 次文化活動，不到四次，一年不到四次，八年以後，一年 38 次，那這就是軟實力。我很謝謝臺中市民，當我努力辦文化活動，你記得嗎，從帕華洛帝，到波伽利，到明華園，到去年的 Lady Gaga，都是選擇臺中啊。

諷刺的是，從官方文宣到學術界的研究報告，自權威媒體到私人部落格，無不引用該數據與論證。然而考究該統計數據的出處及計算方式，係根據文建會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統計資料，以「活動總人次除以全市總人口數」做為該指標的統計公式。

換言之，該公式只有在「活動參與者全是臺中市市民」的前提下方有意義。實際上近年臺中市舉辦的大型文藝活動，無論是帕華洛蒂、還是 Lady gaga 的演唱，其龐大人潮相信有不少源自外縣市。雖不能就此否認臺中市民參與藝文活動頻率上升的可能性，但是若要做出「八年以來，市民的參與的次數成長了 8.14 近十倍」一類宣稱，進一步行銷臺中市的文化治理績效時，這樣統計方式無疑是相當不妥的<sup>11</sup>。從此一簡單的數字，也可看到臺中市文化全球化計畫的成果可能充滿了泡沫。

不過包含了高度爭議的藝文活動在內，臺中市近十年來從持續舉辦「逍遙音

---

<sup>11</sup>與此相對，臺中市市民的擁書率是五都之末(陳榮昌, 2013)。

樂町」、「臺中爵士音樂節」等文化活動，也有像臺灣藝術設計建築與展演中心這樣偏向地方化的藝術空間，臺中市在全力文化全球化的同時，仍保留了地方藝術的空間。



圖 4-1 「讓世界看見臺中」-臺中市的國際盛會之夢<sup>12</sup>

#### 4-4 經濟全球化計畫

90 年代以前，臺中市對全球層面的變化的感受和反應，多置放在發展型國家的框架下。比如因中國改革開放和國際原物料成本提高，臺灣迫切面臨產業轉型和升級的問題，遂在 1980 年成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並在全臺各縣市掀起科技園區的風潮。臺中市也在 80 年代初透過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先後規劃軟體工業區和航太工業區。

到了 90 年代中後期，中部地區出現產業空洞化，以及本章第一節所言的精密機械產業發展面臨轉型的問題，基於平衡區域差距、增加高科技產業的就業機會和結合精密機械產業鏈等理由，在 2001 年宣布第三科學園區的主園區落腳臺中。

胡志強時期的臺中市政府積極的進行工業區招商和開闢新工業區，從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2005 年第一期)到神岡豐洲科技園區，特別是近年臺商的鮭魚返鄉，令大臺中地區的工業區廠滿為患(陳良榕, 2011)，也嘉惠臺中港近年的成長。

表面上地方政府開發工業區的權限已比過去擴大甚多，然而受限於立法權與財政權仍舊低落的現實，以及存在跨縣市產業鏈結與資源整合的問題(張保龍等, 2011)。諸多研究者已提出一個成功的產業集聚區域，必須鑲嵌於厚實的制度文化環境(如 Saxenian, 1994)。至於怎樣的制度文化環境才有利於高科技產業等彈性生產工業的發展？Harvey 首先提出晚進資本主義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模式，在這個模式之上城市政府以企業主義的治理方式，引進市場機制、創新精神與行銷活動於城市發展政策中(莊翰華, 2005)，這些政策主旨在於經營豐富的社

<sup>12</sup> 2011 年 3 月 30 日筆者攝自新市政中心專用區。

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對一個次級城市而言，於資源缺乏的情形下，它唯有從自身城市政策和治理著手，強化高科技產業對在地的鑲嵌性，而非去鑲嵌化，在地居民的文化素質和品味中產階級化、國際化，對市政府而言應有助於強化波希米亞氛圍的形成，特別是吸引高科技和創意人才的移居。

以七期重劃區為例，開闊而筆直的林蔭大道，以及充滿異國風情的高級住宅與商圈，更重要的是新市政中心正座落該區域的核心地帶，不但是將東方主義、現代性與發展主義的焦慮加以空間化，更是藉由博物館、歌劇院等「高尚文化」將城市進一步階層化，且規訓市民一個文明化、現代化，甚至是彈性化、富創意生產力的身體。



圖 4-2 「全球運籌中心」：緊臨新市政中心後方，由民間財團英才文教基金會興建，四樓為「全球藝術中心」。該中心由胡志強落款。<sup>13</sup>

然而臺中市仍不能不直面中科和地方空間的緊張關係(例如東海大學近年的中科聯外道路爭議、中工空汙等問題)。特別是當城市的發展直抵大肚山山腳時，大肚山科技走廊恐怕將成為窒息城市的緊箍咒。

臺中市政府爲了拓展財源，除了在工業區積極招商外，公有土地開發也是管道之一。目前地方政府採用的公有土地開發模式主要有下列四類：(1)自行開發經營模式；(2)自行開發委託經營模式(OT)；(3)提供土地委託開發經營；(4)由民間出資興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所有權移轉給政府(BOT)的模式。其中第一、第二類多見於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設施(例如工業園區、國宅、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教育與文化建設)。第三類和第四類開發模式相近，BOT 模式較適用於大型交通建設或其他公共設施之開發，且通常在招標前已限定土地之用途；而設定地上權契約通常以住宅、商業百貨大樓或觀光飯店等大型建築爲主，以符合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等相關法令爲原則(林左裕, 2010)。

爲吸引民間資金，2000 年中央政府通過「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頒佈實施，之後陸續頒佈促參法施行細則及其他相關子法，各地方政府

<sup>13</sup> 2011 年 3 月 30 日筆者攝自新市政中心專用區。



隨後採納試行，BOT 自此成了地方政府較為安全且回收利益較高的開發模式。

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政策逐步落實於臺灣的公共建設後，臺中市政府開始將市有財產管理工作委託予民間執行(陳昭仁, 2006)。不過多數縣市多就欲委託民間經營管理之地方財產作類別式或個案式之立法，僅有臺北市、臺中縣和嘉義縣有總則性的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例如臺中市在 2002 年 2 月 7 日制定〈臺中市公園綠地園道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當中將臺中市豐樂公園之維護管理工作委託予民間執行。在臺中縣市合併升格後，並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頒布總則性的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相較於市政府出資營建、民間經營的模式(OT)，BOT 模式則時常應用在由民間規劃的商業型建設上。以臺中市近十年的 BOT 案為例，目前已開發完成的五件案例均是大型商場(請見表 4-6)，投資額度和權利金等亦不高。

表 4-6 近十年已開發臺中市大型土地開發案(BOT 案)

計畫名稱	參與者	民間投資	權利金	租金/年	辦理機關	設定期間	簽約日
1 「市 113」公有市場用地促進民間投資開發與經營管理案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	8.95 億元	3 億 2000 萬元	754 萬元	經濟發展局	30 年	95/08/16
2 「市 80」公有市場用地獎勵民間開發經營招標案	臺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	16 億元	2 億 200 萬元	200 餘萬元	經濟發展局	--	92/11/25
3 「市 81」公有市場用地興建營運移轉案	國泰人壽保險、IKEA(承租者)	18 億 6,886 萬元	4.2 億元	884 萬元	經濟發展局	30 年	101 /05/23
5 「廣兼停 101 公有用地」民間自行申請參與 BOT 投資興建案	模里西斯商史伯太科有限公司(法國迪卡儂集團)	10 億元	13.9 億元	460 萬元	經濟發展局	50 年	93/12/1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製表

這些已開發 BOT 案其實還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它們全是外國知名企業。唯一的例外是「市 80」的家樂福，不過它原本不應是例外—「市 80」最早是鉅眾集團與英商特易購合資承租，只是英商特易購在 2006 年退出臺灣。市政府提供該共通點的一個理由：家樂福、COSTCO「為臺中市都會創造國際化的視覺焦點，並吸引眾多觀光人潮，促進觀光發展」(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2012)。



圖 4-3 「市 113 公有市場用地」專案開發基地位置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市一一三公有市場用地 BOT 開發經營案」計畫執行簡報

和臺北市動輒數十億、甚至百億的 BOT 案相較，臺中市的 BOT 浪潮尚屬方興未艾。在胡志強努力運作下，臺中市即將迎來 BOT 的高峰——假使順利的話。表 4-7 是臺中市預計於 2012 年前辦理的四大指標性促參案件，可是直到今日，四大指標性促參案件都尚未完成招標，相關爭議卻始終不斷。

表 4-7 臺中市預計於 2012 年之前辦理四大指標性促參案件


案件名稱	公共建設類別	簽約金額 (千元)	民間參與方式
臺中國際經貿園區 BOT 案(水湳機場原址)	重大商業設施	46,000,000	BOT
臺中捷運 G9(1)聯合開發案	交通建設	3,747,000	公開招標
臺中市體二用地(臺中市都市翠谷案)	其他	3,316,000	公開招標
臺中捷運 G9(2)聯合開發案	交通建設	2,853,000	公開招標

資料來源：修改自財政部促參司(2012) <http://ppp.mof.gov.tw/PPP.Website/>

## 4-5 空間(房地產)全球化計劃

臺中市政府的空間(房地產)全球化戰略直接體現在近年重要地景的命名進行之上(請見表 4-8)，除了臺灣大道，會發現許多記憶就像日治時期的小京都、解嚴前的中國地方道路名一樣抹平一切重來，興許十幾二十年後會再次有新的創意和新的空間記憶。

表 4-8 地景命名學之「臺中建案化」

原名	更名後
公三(陽光綠園道)	 夏綠地公園(圖 4-7 <sup>14</sup> )
原名	更名後
臺中之緞經國園道	草悟道
大都會地標廣場	秋紅谷
臺中港路、中棲路、中正路	臺灣大道
臺中體二用地都更案	都市翠谷案
臺中港市鎮中心	美人魚購物中心
水滸經貿園區	大宅門特區
	清翠園
	泊嵐匯
	臺灣塔(臺灣精神塔)
	臺中林蔭大道
	臺中大學城
	生態住宅社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製表

無論是地景命名或是具備「國際觀」的各式建設計畫(參見表 4-9 胡志強時期-臺中市政府提出之重要計畫與爭議)，其提出與落實均和臺中市房地產緊密相關。根據內政部營建署公布的 2013 年第 1 季住宅需求動向調查，臺中市的房價所得比(倍)<sup>15</sup>來到 8.6 倍，該數據代表的購屋負擔僅次於臺北市(13.5 倍)與新北市(10.0 倍)，為臺灣六大都會區中第三位。實際上臺中市的房地產價格除卻 2008 年到 2009 年金融海嘯期間之外，基本長期處於上升趨勢。然而此一負擔倍數是

<sup>14</sup> 2011 年 3 月 30 日筆者攝自新市政中心專用區。

<sup>15</sup> 當地 30 坪的中古屋的平均價位，除以平均家庭的可支配所得，所得到的倍數，即是房價所得比。

否合理？是否如實反映各地區的住房與就業供需狀態？城市政府在當中扮演的角色與影響又是為何？在前兩節分別討論文化與經濟全球化戰略後，本節將探討空間(房地產)全球化計劃，並綜合該臺中市戰略三支柱，對這些問題及其機制予以分析。

我們在前一章最後一節曾討論到七期重劃區在 90 年代的困境，自開發伊始便號稱是臺中的信義計畫，更在 1996 年被定位為「臺中市新市政中心」。孰知正式開發迄至 1999 年，在陳覺慧(1999)的觀察中仍是「土地長期閒置」，他總結園因認為是這時期城市(空間)治理的經驗尚且不足，導致建商寧可將建地閒置來「養地」，也不願推出大型建案。往後直到 2004 年左右，七期的建地一坪仍徘徊在 40~55 萬之間的低價，其後不過短短二、三年，到 2006 年七期建地便已飆破百萬元(蕭宇呈, 2007)，而且至 2013 年為止，這塊區域的地價、房價仍在節節看漲，儘管漲幅趨緩，那也是因為另有一塊房地產明日之星(大宅門特定區)浮現的緣故。

何以七期的土地開發、「租隙」(rent gap)(Smith, 1987)會在 2004-2005 年實現？是否真的和胡志強上台後的一連串大型建設計劃(古根漢、國家歌劇院、圓滿劇場)和願景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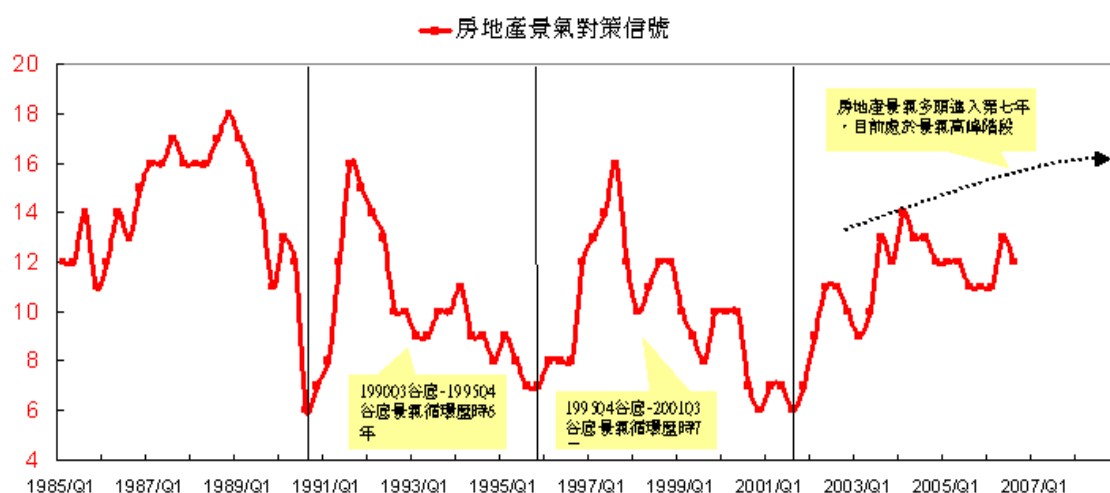


圖 4-4 1985 第 1 季-2007 第 1 季 全臺房地產景氣對策信號趨勢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調查、元富投顧繪圖<sup>16</sup>

從圖 4-4 可以看到，不唯臺中市，在 2004-2005 年間全臺房市景氣總體處於上升階段。因此暫無足夠證據顯示「古根漢博物館建案」係讓七期重劃區起死回生的重大功臣。當然不可否認的，古根漢博物館之後臺中市政府接連投出的利多

<sup>16</sup> 2013 年 6 月 22 日取自 Money DJ 理財網

<http://www.moneydj.com/kmdj/report/reportviewer.aspx?a=08a3a318-3640-4da8-88a4-a7f57fec6c85>

消息 (如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市政中心和國際會展中心等等)，促使七期重劃區「高速發展」的力道不僅不會半途夭折，更成為全臺灣除了臺北市之外數一數二的豪門地段。



圖 4-5 七期重劃區豪宅一景<sup>17</sup>

臺中市長期保持空屋率全臺第一，營建署根據臺電用電不足底度資料的推估，2002 年臺中空屋率是 24.1%；另根據行政院 2010 年住宅普查，2010 年臺中市空屋率高達 26.2 %。臺中的空屋率屢屢不降，與此相似的是房價的飆漲：2012 年最新公告的土地現值，29 個行政區全都調漲，平均漲幅 15.7%，居五都之冠，也創下 20 年新高，其中又以七期所在地的西屯區漲幅最大(27.13%)。

歷屆臺中市政府既以土地開發為重要戰略和資源，並認為提高住宅供給能壓制土地炒作和土地高漲，那麼臺中市房地產為何無法以量制價？

綜合前面的討論，我們認為該問題與下列現象相關：(1)檢視是供過於求是否成立：臺中市空屋率居高不下，主因之一可能是住宅市場交易品質及數量仍舊不足，與其無限度的開拓新市鎮，應先改善市五區空屋率，拆除空屋為公共用地，或是活化建築用途，以有效利用資源。(2) 臺中市推案偏向高價位市場，缺乏中低價位住宅推案：應雙管齊下，一則避免一味通過願景工程刺激房市想像，令建商和投資人囤地、囤屋居奇；二則以都市計畫或住宅社區開發案的總量管制，合理規劃、釋放與調節建案類型，保持市場供應的多樣性，進而預防房市賣方的卡特爾現象。(3)汽車導向的都市開發：大街廓、大幹道以及住商分離的發展模式，適合汽車導向的都市發展，也適合門禁社區的存在。倘若希望建立大眾運輸為基礎的都市空間，就必須檢討汽車導向的發展現況。

土地徵斂和炒作的問題素為眾人鄙視和憤怒。不過在傳統的官商(派系)結盟觀點之外，也可以將臺中市的發展戰略與願景一併考量。如同上面第二點所言，回顧臺中市的發展歷程和模式，我們可以知道在政府和地方派系或財團直接掛勾之外，城市戰略與願景亦有密切關係。

<sup>17</sup> 2011 年 3 月 30 日筆者攝自七期重劃區。





圖 4-6 臺中市城市戰略與房地產題材關聯之一<sup>18</sup>

也許在基本面(供需和薪資)外，我們不宜過度放大城市政府行銷手法對房地產的真實效益。然而或許是城市政府日益全球化的行銷創意，以及源源不絕的「題材」確保長達十年(SARS 後)房地產的「榮景」。當民眾的薪水資產少有變化，房價卻持續高峰，不知是否也是各級政府(不唯臺中市)全球化戰略的政績。是否有足夠且合宜的社區提供不同階層民眾租買是一回事；過去因國家—地方結構限制，令地方政府依賴土地開發開闢財源，如今各級政府恣意舉債建設、建商坐享房價追漲和土地重劃的利潤。無視民眾(1)薪資成長無力支撐房屋供需、(2)承擔房價上漲造成的民生物價波動、(3)背負一再瀕臨舉債上限的政府債務、(4)吸收為平息民怨而由政府發放的補貼和福利之成本；罔顧房地產是否已經形成泡沫，以及此次泡沫化後可能的社會後果。在中央國家不再如 90 年代強盛之際，這些風險是否能從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得到平衡或補償，在歐美中三大經濟體都走向放緩和緊縮的可見之未來，可能成了嚴峻的問題。

2004 年後，隨著後期發展區解禁，眾多自辦重劃區單元由數個開發商集團畫分動工。自辦重劃區固然減輕政府財政與人力負擔(形同將市地重劃 BOT 化)，卻因開發商的暴烈舉措、公私利益盤根錯節，以及相關法律與辦法的乖張曖昧而屢生爭端，例如位於安和自辦重劃區的「張慶興堂」於 2009 年 9 月 15 日遭到強拆；以及永春自辦重劃區的南屯天主堂土地爭議案。隨著臺中市空間日見狹隘，相似衝突只會增加，都市發展和社會空間更易陷入複雜的困局。如何在保存既有都市肌理的同時進行開發，臺中市應跟上全球先進城市的步伐，以更靈活和務實的手段看待城市房地產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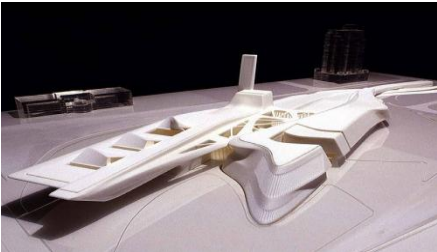
## 5-5 小結

<sup>18</sup> 2011 年 3 月 30 日筆者攝自安和自辦市地重劃區。

臺中市雖和臺北、高雄同樣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卻因處於國家/全球化發展中的雙重邊緣位置而備感落後焦慮。也由於城市位處國家/全球化的雙重邊緣位置，臺中市更具備地方國家的能動性與正當性以進行區域競爭。在經濟與財政開發處於限縮、不公平的情勢之下<sup>19</sup>，城市政府被迫另尋途徑以建構爭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發展型國家論述的權力裝置，「全球化戰略」的概念遂在此一脈絡下而被再生產。如同 Nash(2007)指出，全球在地化意味「在地性的生產乃是為了獲取全球市場利益的方式」，臺中的文化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或地名全球化也都不脫此一範圍。

借用胡志強在競選 2010 年大臺中市市長時的話，「標的出大臺中具有指標性的建築物剪影，象徵過去有政績，未來也要讓大臺中有國際觀」(喻文玟, 2010)。至於大臺中有甚麼樣的國際觀呢？請見下表 4-9 的整理。


表 4-9 胡志強時期--臺中市政府提出之重要計畫與爭議<sup>20</sup>

案名簡介	工程目標	進度、結果
臺中古根漢美術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002 年，胡志強爭取古根漢美術館到臺中設館。</li> <li>2003 年，古根漢美術館完成國際競圖，由伊拉克裔英國女建築師札哈 哈蒂設計得標，經費約 60 多億，納入行政院的新十大建設。</li> <li>2003/10/3 臺中市議會通過古根漢園區特別預算 80 億元。</li> <li>市政府籌備作業預算總計超過 8800 萬。</li> </ol>	<p>2004 年，因行政院未將古根漢美術館建設案預算編入新十大建設裡以及臺中市議會於年底亦未編列第一期預算，導致古根漢美術館臺中分館一案被迫終止。</p>  <p>圖 4-8 臺中古根漢模型<sup>21</sup></p>

<sup>19</sup> 胡志強接受沈春華電視專訪(〈從台灣看全球〉, 2012 年 12 月 30 日)時指出：「但是我真的很誠懇的講，我能體諒你，你能不能體諒我。有沒有從我們的角度看問題，不要總是大人管小孩一樣，甚至於我不愛聽，不要講話，我就是不想聽你講話，這種態度不可能解決問題，我們的溝通好不好，然後能不能體諒我們，能不能有效率幫助我們改善一切問題。」

<sup>20</sup> 某位市政參與者如此評論胡志強：「有時候點子很多想法很好，但是時常受到法令上的限制，到頭來還是被絆住了變成無法作…像古根漢、園滿戶外劇場。…在大事方面在做決定的時候都比較急性，雖然很有創意很有點子，可式通常都是經過媒體的喧囂炒作之後，你會發現他的落實其實都有很長的路要走」(郭佳綾, 2010)。

<sup>21</sup> <http://www.flickr.com/photos/eager/6508552631/sizes/m/in/photostream/>

案名簡介	工程目標	進度、結果
大都會歌劇院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最初為「臺中音樂藝術中心」</li> <li>2. 1992年，臺灣省政府將原先規劃的臺中音樂藝術中心變更為「國家音樂廳」，後依文建會建議改為興建「國家歌劇院」。</li> <li>3. 2005年，因已非國家新十大建設建案，文建會要求更名，9月7日將臺中國家歌劇院更名為「臺中大都會歌劇院」；9月21日降為地方級建設，全由臺中市政府負責。12月16日完成國際競圖，由日本伊東豊雄設計圖得標。</li> </ol>	<p>建設/主管層級演變：地方→國家→地方→國家</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大都會歌劇院接近完工時市政府卻希望能由國家接手經營，爆發「只顧生不會養」的爭議。</li> <li>2. 2013年5月22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通過，設定北、中、南各一座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成為國家級表演藝術中心，未來改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營運管理，正式名稱為「臺中國家歌劇院」</li> </ol>
臺灣塔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2010/8 臺灣塔國際概念競圖說明會，預定建在臺中水滸經貿生態園區。</li> <li>2. 2011/9/2 公佈第一階段競圖結果由羅馬尼亞籍建築師得首獎。</li> <li>3. 2011/11/11 公布第二階段競圖結果由日本籍建築師得首獎。</li> <li>4. 預計由市政府動用市預算斥資八十億元。計畫於民國 100 年的 10 月 10 日動土。</li> </ol>	 <p>圖 4-9 臺灣塔模型<sup>22</sup></p>
水滸經貿園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原址為臺中市水滸機場，臺中市辦理更新計畫，欲規劃成綜合園區。</li> <li>2. 2010/5 計畫審定完畢。</li> <li>3. 2010/8 臺灣塔基地預定位臺中水滸經貿生態園區內。</li> <li>4. 2010 因李安電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於臺中搭建片場，市府欲未來配合規劃成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2012/8 胡志強表示擬更名為「大宅門」，其英文是「Taichung gateway park」。</li> <li>2. 編列 88 億 3000 多萬元預算，至 2012 年底只動支八千多萬元。引起市議員們抨擊計畫與成效嚴重落後，並要求刪除明年預算。</li> </ol>

<sup>22</sup> 2011 年 3 月 30 日筆者攝自城市願景館。



案名簡介	工程目標	進度、結果
雙橡園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013 市政府規畫 2 億元興建仿美的雙橡園。</li> <li>觀光局長張大春強調雙橡園對陸客有吸引力，可提振臺中的觀光。</li> </ol>	因雙橡園意象僅跟胡志強曾就任外交部長有關，遭議員譏為馬屁建設。
臺中企鵝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009/2 胡志強宣布將利用魚市場現址改建企鵝館，希望最慢於 2010 農曆年節前開放。經費 1 億元。</li> <li>2012/7 市政府規劃 3 年內，編列 3 億元，於梧棲漁港附近興建。</li> </ol>	網路對中市興建企鵝館計劃反對聲浪眾多，臉書「反企鵝館粉絲團」網路連署已逾 9000 人。臺中市議會於 2012 年底刪除企鵝館預算。
國際會展中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001 市政府為「臺中國際會議及展覽中心」BOT 興建案做招商準備。</li> <li>2004 由鄉林建設取得 BOT 案。</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008/7 臺中市政府終止與鄉林建設合約，停工。</li> <li>2010/11 市政府將預定地改規劃為有人工湖的綠地景觀公園，強調其生態、休閒、排水功能，定名為「秋紅谷廣場」。</li> <li>2012/11/25 正式啓用。</li> </ol>
光之塔	「光之塔」是高速公路進入臺中市區的入口意象，2007 年 10 月興建，工程費 1300 多萬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遭市民批為「倒塌的鷹架」</li> <li>「1 個人就可決定蓋成光之塔」胡志強自行爆料。</li> </ol>
熊貓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006 胡志強選前曾表示爭取蓋熊貓館。</li> <li>市府表示已在大坑風景區的亞哥花園規畫熊貓館，佔地約 1000 坪，預算 1 億 2000 萬元。</li> </ol>	目前仍未有下文。
米其林餐廳	2006 胡志強出國訪查，宣稱將引進米其林餐廳至臺中。	2011 歡樂竹筍活動「試探筍趣食纖健康」，記者會上胡志強指示明年竹筍千人宴要邀法國米其林餐廳來臺。
國際百貨公司	多次出國訪查時，表示要讓國際的百貨公司進駐臺中。	<p>截至 2012/06/20。</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大遠百(遠東集團)</li> <li>金典酒店商場(勤美集團與太子建設合資改造)</li> </ol>

案名簡介	工程目標	進度、結果
哈洛德百貨	胡志強 2006 年出訪歐洲，回國後說哈洛德百貨可能於臺中開分店。胡志強甚至表示願意提供市政府土地給他們。	2006 年底哈洛德於臺中新光三越舉辦哈洛氏嘉年華暨英國生活展，2008 年 10 月新光三越於北中南三地設立哈洛德專櫃。
倫敦城購物中心	鉅眾集團與英商特易購合資參與臺中市政府的「市 80」BOT 案(2003 年)，原打算參照「倫敦城」風格。	英商特易購 2006 年退出臺灣後，賣場由家樂福接手。
臺中州廳都市更新 BOT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市府劃設更新欲導入國際觀光旅館、博物館及精品、購物商場。</li> <li>2. 2009 胡志強率團前往香港，在「亞洲國際投資展覽會」強力推銷「臺中州廳都市更新 BOT 開發案」。</li> </ol>	2013/6/19 舉辦招商說明會，近百家業者到場，除信和集團外，包括誠品、薰衣草森林、大買家，以及國泰、興富發、順天、豐邑等建商都出席。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製表

從上表我們能清楚看到，眾多全球化題材，到落實的層面卻往往遭遇各種困境，甚至乾脆流產。不同案例的失敗原因各有不同，它們誕生背後的機制卻是相似，多數更與土地增值和都市擴張有著高度聯繫。然而，無論成功與否，這些全球化計畫往往在漫長的實現過程中耗費鉅資，計畫的題材性對於前述的發展風險只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在大都會歌劇院和水滸經貿園區(大宅門)等大型公共建設傳出 BOT 失敗、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回營建或運營之際，再加上近期正在或預定兌現的臺中捷運、花博與申辦東亞運等重大題材，餅越做越大的同時，臺中市發展模式的系統性風險將進一步擴大。

隨著全球的大都會城市區域崛起趨勢，國家尺度的空間與治理重構日益受到重視。特別是和民族國家相較，城市政府逐漸被認為是回應和處理經濟全球化與市場自由化衝擊合適的治理尺度。如同我們在本章看到的，臺中市政府透過主動擘畫全球化計畫、參與全球化進程，試圖在既有的發展型國家架構外，回應並引導經濟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衝擊。

類似的趨勢並非只在臺中市發生，經濟全球化下的發展型國家危機同樣對臺灣各級地方政府構成影響。這些城市在依循地方發展的路徑的同時，也可能如同臺中市積極的從國外援引新興的城市概念和治理手段。然而在城市競爭與競爭力

在近十年成爲城市戰略與城市政治的核心概念時，各個地方政府競相效仿「成功」的發展模式亦成必然。故而我們能看到在緊湊的空間範圍內，一方面依附在國家—地方發展意識形態與法制正當性下的土地開發與片斷式空間規劃；二方面是同質性極高的經濟與文化建設不斷推出，特別是能夠刺激房地產市場的「概念園區」（經貿園區、文創園區、生態園區、航空城、大學城、水岸城市...）、在形象上連結全球的巨型計畫和國際盛會等象徵實踐，以及表徵都會現代化和促進觀光發展的公共運輸建設，例如捷運、輕軌、巴士快速交通(BRT)和空中纜車。

2010 年的縣市合併升格更推升此一趨勢，中央國家對此無法提出明確而整體的國土計畫，甚至在打壓房價的同時，又與地方分頭/攜手助長空間發展的零碎化。不但難以促發制度創新和經濟轉型，更在依循於過去的發展模式下創造更大的風險，結果很可能是臺灣(及其城市)在全球網絡的邊緣化。

## 第五章 臺中市全球化空間再結構化狀態

在探討臺中市城市戰略與發展歷程的轉變最末，我們要從具體的指標來考察臺中市社會空間的全球化歷程，以茲檢視城市的全球化戰略對於社會空間的實質影響。受限於國內相關統計資料的缺失，特別是 1.多數抽樣層級缺乏縣市以下層級 2.部分年期沒有足夠數據，我們難以對臺中市的社會空間展開全面性的探討。因此僅以「國外遷入人口相關指數」和「綜合所得變異係數」建構檢視臺中市全球化過程和分異模式的指標，並進行試探性的分析。

我們在第三章與第四章對臺中市各期發展的討論中，以 90 年代中期作為重要的分界線，臺中市在 9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前後遭遇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並在 2002 年後形成全球化相關的發展戰略。因此在進行縱貫的歷時性分析時，我們要盡可能涵納 90 年代中期以降的年度。

### 5-1 全球化戰略評估 I：國外遷入人口相關指數分析

「國外遷入人口」一般是城市全球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在本節中我們假設試圖檢視臺中市在近二十年間是否出現國外遷入人口集中化的趨勢，以及該趨勢是否與臺中市的全球化戰略相關。本研究運用內政部調查並發布之「人口遷移統計」既有的數據，配合前文的討論，取 1994 年到 2010 年為區間，分析各年度國外遷入人口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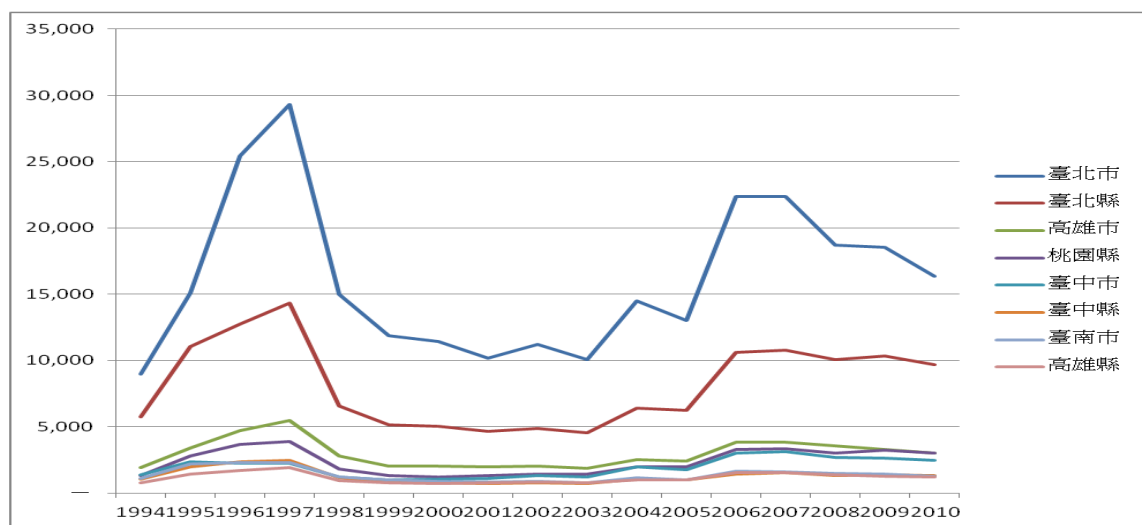


圖 5-1 1994-2010 年國外遷入人口逾千人縣市折線圖 (X 軸單位=年度；Y 軸單位=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遷移統計資料、本研究自行繪製

前頁圖 5-1 為「1994-2010 年國外遷入人口逾千人縣市折線圖」，圖中可以看到主要遷入縣市在這 17 年間呈現相似的趨勢，且大體集中在大臺北都會區。

圖 5-2 則是將臺北縣市剔除，得到新的「1994-2010 年國外遷入人口逾千人縣市折線圖」，可以更清楚看到有兩段遷入的上升期：第一段為 1994-1997 年，第二段大致落在 2004-2006(7)年，各主要縣市的變化趨勢是相似的。臺中市較為特殊之處在於，不同於其餘縣市(含臺北縣市)，臺中市在第二段上升期間的國外遷入人數明顯超過第一段上升期。我們可能得到兩項假設：1.第一段上升期臺中市的國外遷入人數增加幅度較同期縣市為低，2.第二段上升期臺中市的國外遷入人數增加幅度較同期縣市為高。配合前文的討論，可以粗略推估，臺中市的發展在第一段上升期期間已進入停滯期(參見第三章與第四章的討論)，吸引國外移入人數甚至與臺中縣相當，故而第一項假設有進一步檢證的價值。至於第二項假設，臺中市的變化趨勢與高雄市與桃園縣相當，倘若進一步考慮人口基數，三縣市的表現亦無太大差異，在此我們可以初步判斷臺中市在該指標的表現並無突出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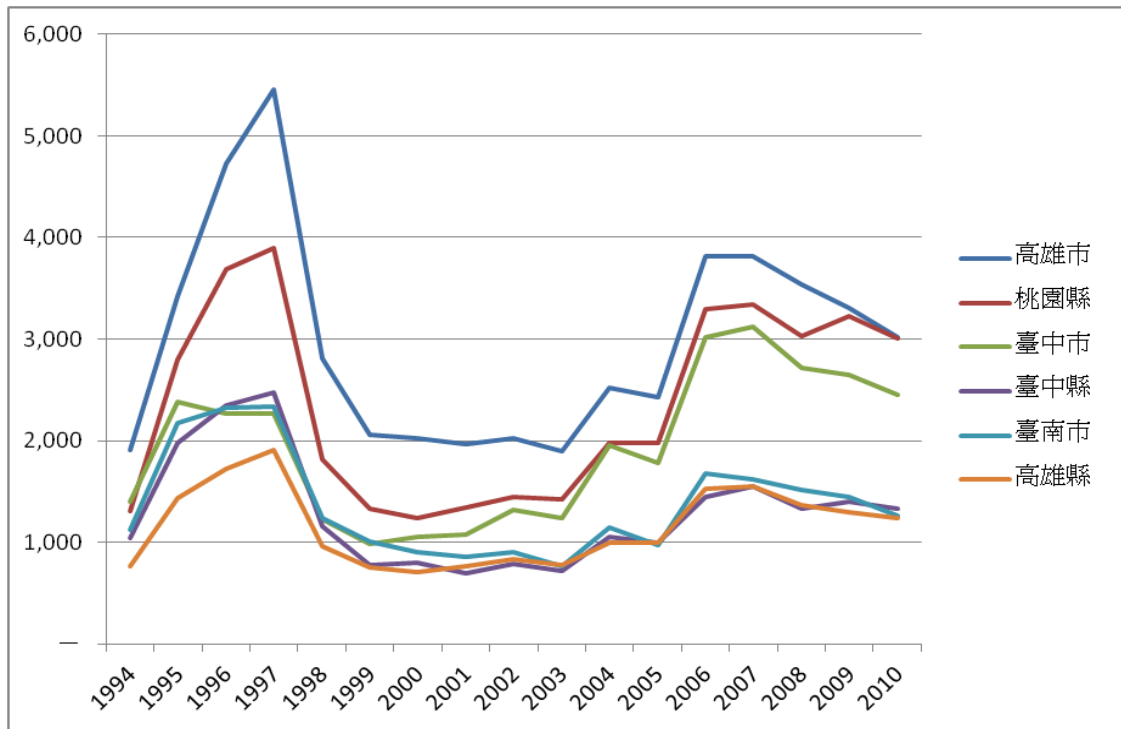


圖 5-2 1994-2010 年國外遷入人口逾千人縣市折線圖(扣除台北縣市) (X 軸單位=年度；Y 軸單位=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遷移統計資料、本研究自行繪製

實際情形雖有待後續更為細緻的研究，另一個明顯的趨勢卻是能夠就現有資料進一步探討，即城鄉差距出現擴大趨勢，特別是處於同一都會圈的臺中縣市，

前後兩階段的對比尤為明顯。據此，我們必須進一步釐清，同一個都會區下的大臺中市(臺中縣市)在全球化相關指標方面是否出現空間分異？以及，形成形成或未形成此一分異情形的原因可能為何。

為方便討論，我們將原臺中中縣市多達 29 個的行政區(鄉鎮市區)按區位和政經社性質重劃分為七個大區，分別是：第一區：中區，第二區：東區，第三區：西、南、北區，第四區：西、南、北屯區，第五區：太平市、大里市，第六區：豐原市、潭子鄉，第七區：台中縣其它鄉鎮。

中區為清代省城草創至戒嚴前期為止臺中市主要的發展重心，90 年代後陷入長年「衰退」的困境中；東區係後火車站和干城一帶，亦係清代省城的發軔之地，然其衰退破敗較第一區更早；第一區與第二區受限各種因素，在 80 年代後迄今的臺中市發展過程時常不若西南北與三屯受到矚目。

如同前文已述，70 年代後期開啓的市地重劃風潮，使臺中市發展戰略主要體現往外圍移轉。從圖 5-3 臺中市重大建設示意圖(2009 年)更可以看到新興且大型的都市土地開發計畫在 2009 年時集中在屯區。特別是科技園區、精密機械等較高端技術產業與高速交通網絡更是集中於屯區外圈，我們能夠合理假設相較中東二區，三屯與西、南、北區對國外移民的吸引當隨時間變化而增強。



圖 5-3 臺中市重大建設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2009)



本研究對應第三章與第四章的發展分期，將臺中市劃分四區。在臺中縣方面，按照發展的程度與區位粗分三區，當中豐原市多年係臺中縣的政治經濟中心，相鄰的潭子鄉則因有潭子加工區，亦為縣內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區，故而將豐原潭子歸為一區；太平大里亦為縣內較發達的地區，然而相較豐原市相對獨立的城市機能，該二區長年屬於臺中市都會中心的郊區，故劃為一區。其他鄉鎮則再合併為一區，作為前面數區的對照組。

由於我們關注的重點在於「臺中市的全球化戰略」形成的各區國外遷入人口分異情形，即 1998-2004 年間的衰退期和 2004 年到 2007 年的第二段上升期，遂在年期上縮減於 1998 年開始，另因 2008 年後暫缺足夠統計資料，分析遂止於 200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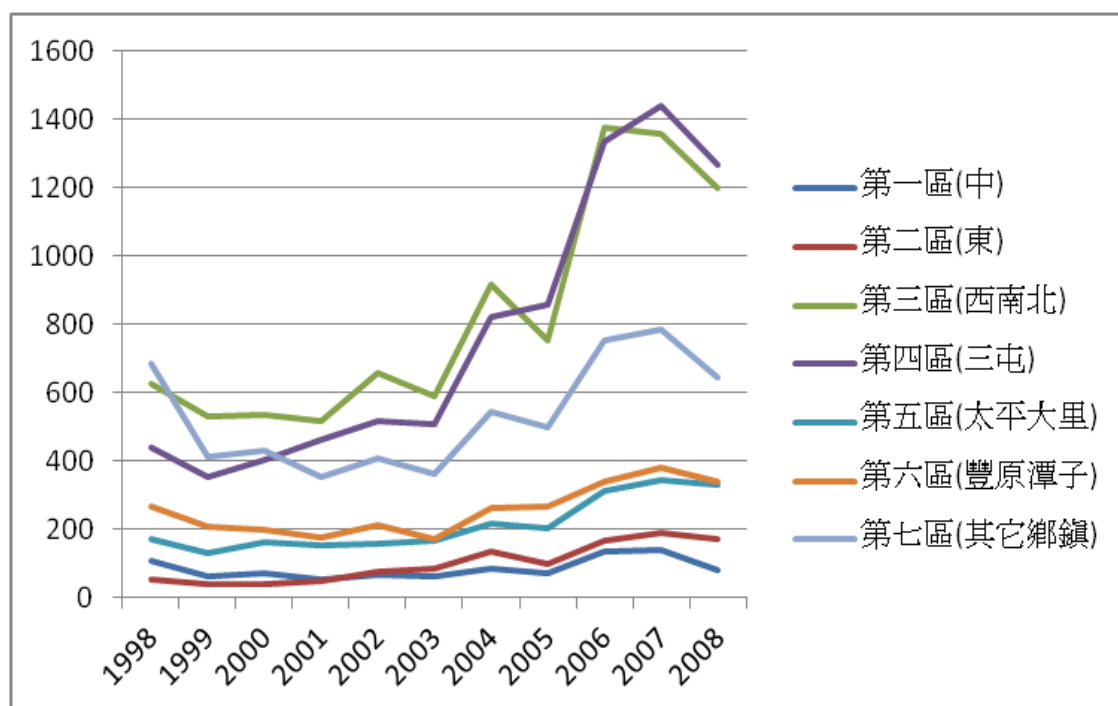


圖 5-4 1998-200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折線圖 (X 軸單位=年度；Y 軸單位=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遷移統計資料、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5-4 係大臺中市各區在 1998-2008 年間各年國外遷入人口折線圖，該圖可以看到在七區當中，三屯與西南北三區吸引移民人數最多，特別是三屯在 2003 年後的上升幅度更在三區之上。其餘區域除太平大里區稍大，變化幅度均不甚明顯(除臺中縣其他鄉鎮在 1999 年後出現較大的衰退)。

我們更進一步將人口基數納入考量，即下圖 5-5 的「1998-200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佔總人口比值折線圖」。該比值的算法係「(歷年國外遷入人口/各年度總人口)\*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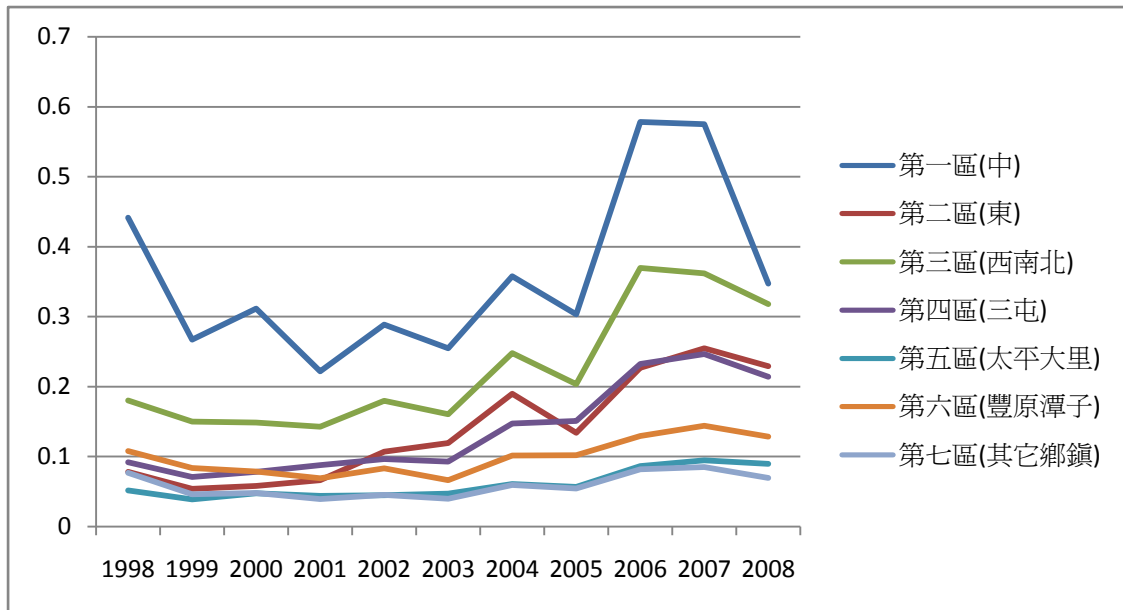


圖 5-5 1998-200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佔總人口比值折線圖 (X 軸單位=年度；Y 軸單位=比值)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遷移統計資料、本研究自行繪製

該圖呈現中區仍係各年度國外遷入人口比值最高的區域，可能受惠於較小的人口基數，以及其餘未知的因素，然而其波動亦是最鉅。東區亦基於類似原因而與三屯比值相近。與此相對的是西南北三區與三屯的數值，乍看並無特殊之處，倘若考慮到其人口基數數倍於中東二區，前二區，特別是西南北三區對國外移民的吸引力就格外顯著了，或可側面佐證臺中市的全球化戰略在該區形成的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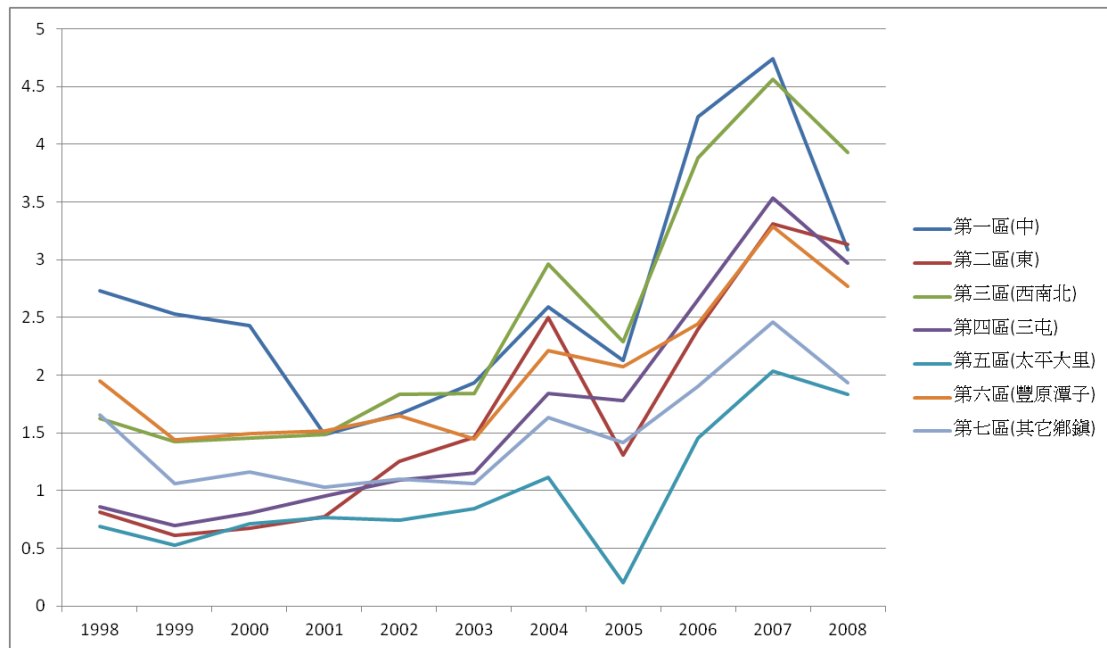


圖 5-6 1998-200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佔總遷入人口比值折線圖 (X 軸單位=年度；Y 軸單位=比值)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遷移統計資料、本研究自行繪製



前頁圖 5-6 則從各區國外遷入人口佔總遷入人口比值的角度來討論，該比值的算法係「(各區國外遷入人口/各區總遷入人口)\*100%」。從該趨勢圖主要目的在於觀察各區開發過程中，主要吸引的外地移民的構成差異。當中中區與西南北三區數度出現易位，三屯和東區，其比值都從最低的群組躍升，相對於臺中縣各區位階的停滯甚至是下降。為凸顯區域間的分異程度，我們將透過統計地圖的形式比較不同年度的遷入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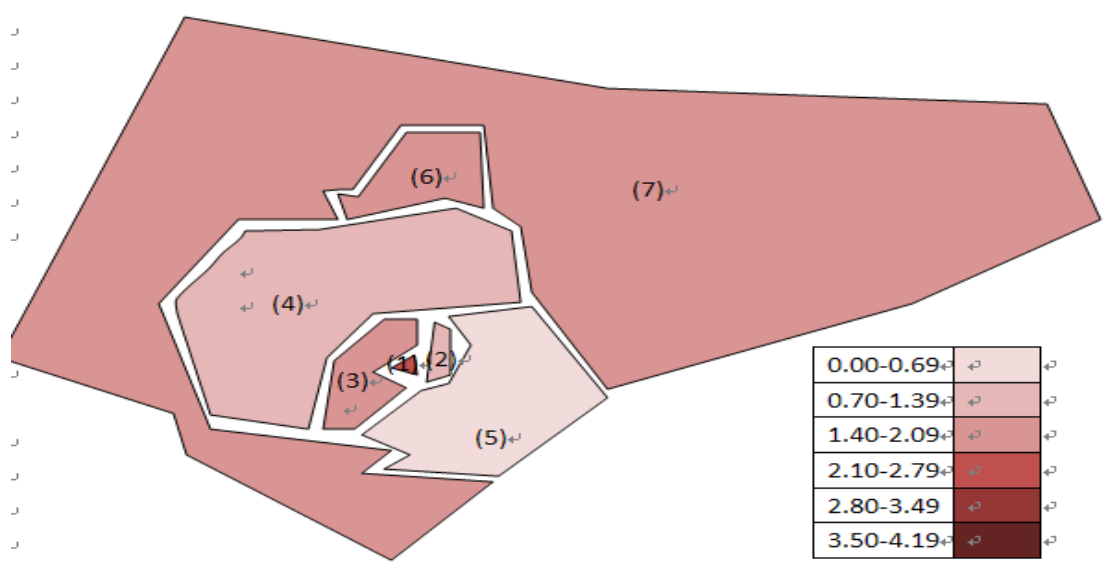


圖 5-7 199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佔總遷入人口比值統計地圖(示意)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遷移統計資料、本研究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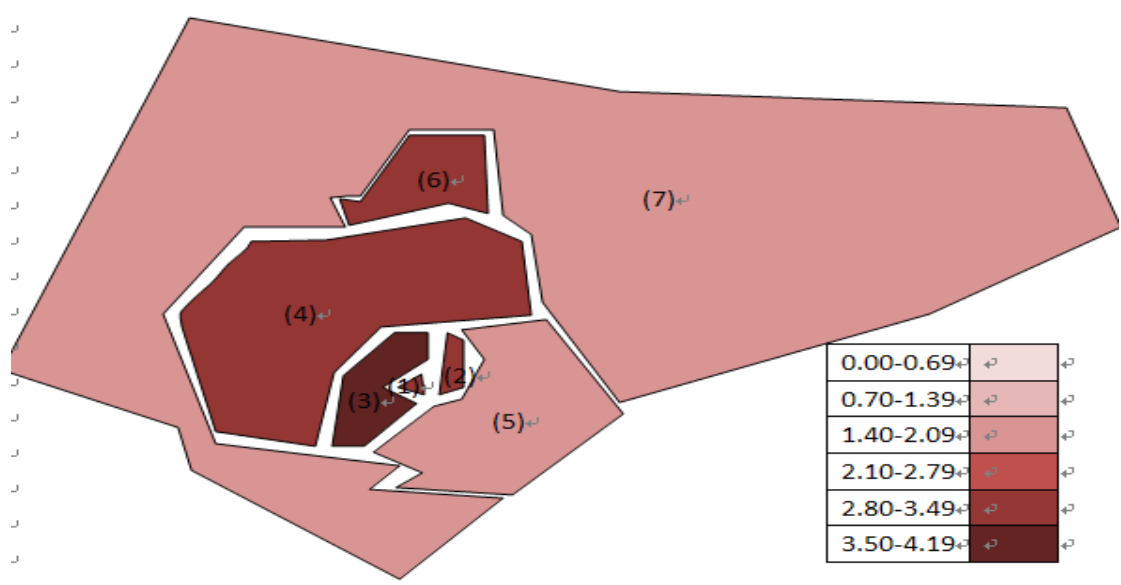


圖 5-8 200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佔總遷入人口比值統計地圖(示意)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遷移統計資料、本研究自行繪製

如上圖 5-7 和圖 5-8 所示，我們將比值劃分為六段色階，得到 1998 年和 2008 年兩個年度的分層地圖，顏色越深代表比值越高。根據圖 5-7，我們可以發現在 1998 年間，大臺中地區的國外移民主要選擇落腳中區(第一區)，其次是西南北三區(第三區)、豐原潭子(第六區)和臺中縣其餘鄉鎮(第七區)，再其次才是三屯(第四區)、東區(第二區)，最末階是太平大里(第五區)。

時序到了 2008 年，除了第七區，大臺中市各區移入人口中的外國移民比值均有所提升，然而位階出現變化，最明顯之處係地理集中趨勢和城鄉差距的形成，臺中市各區和豐原潭子相較於太平大里和臺中縣其餘鄉鎮的比值優勢相當明顯。透過 1998 年與 2008 年的分層圖比較，可以看到儘管整體外國移民比值有所增幅，台中縣呈現卻相對退步的狀態。

從 1999-2008 年間各區國外遷入人口集中指數的變化趨勢圖亦能佐證上述趨勢。各區國外遷入人口集中指數的計算係「歷年國外遷入人口比值(%)-1998 年國外遷入人口比值(%)」，以 1998 年國外遷入人口比值為基期，從中可以更清楚看到這十年空間分異的主要來源為三屯和其他鄉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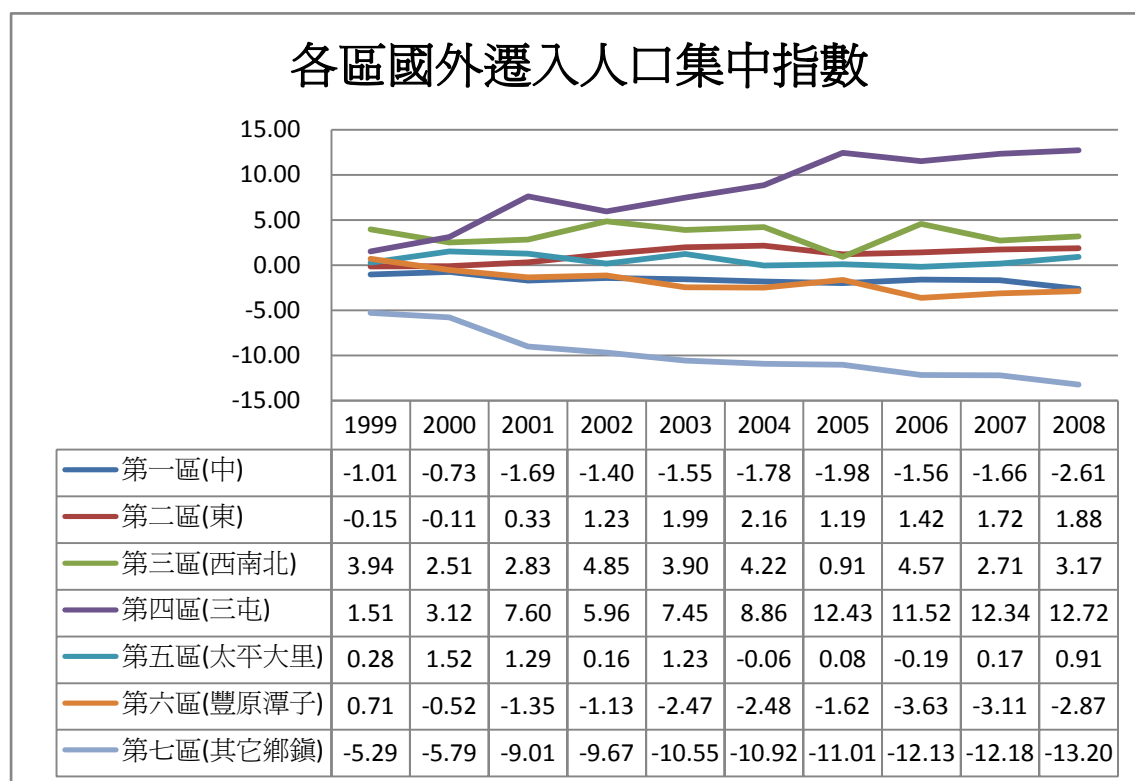


圖 5-9 1999-2008 年各區國外遷入人口集中指數折線圖 (X 軸單位=年度；Y 軸單位=比值)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遷移統計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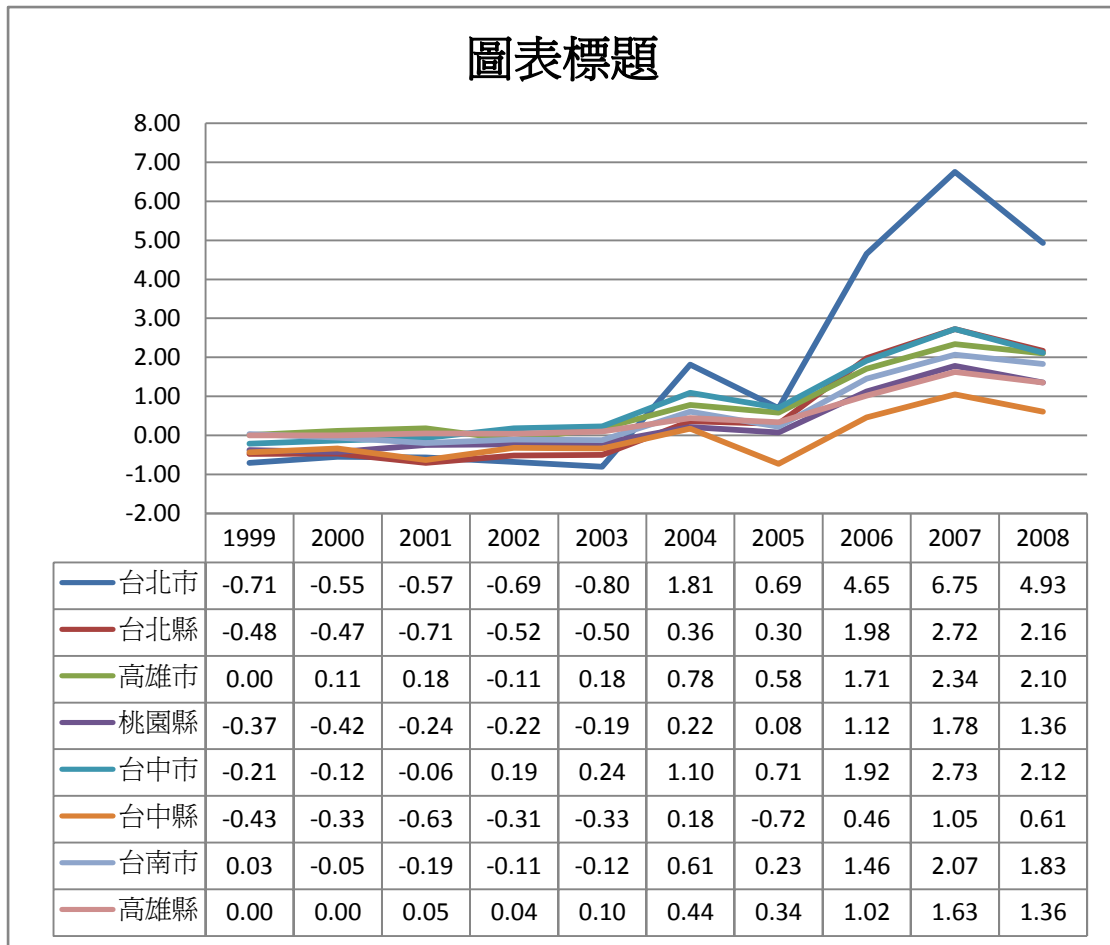


圖 5-10 1999-2008 年國外遷入人口逾千人縣市人口集中指數折線圖 (X 軸單位=年度；Y 軸單位=比值)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遷移統計資料

對照圖 5-10，我們在看到臺中市係除臺北市之外集中指數(歷年國外遷入人口比值(%)-1998 年國外遷入人口比值(%))最高的縣市，不過各主要縣市間變異的程度並不明顯(扣除臺北市)。結合前面所述，我們可以初步推估，外國移民比重在臺中市與其他主要縣市之間的分異趨勢大體一致，但是在組內，也就是大臺中地區內部則出現明顯的分異趨勢。因此我們傾向於假定在國內層面，臺中市的全球化戰略對於吸引外國移民方面尚未有帶來特殊的效應。此外，比起城際間的位階變化，城市內部的分異情形正在早一步發生。

## 5-2 全球化戰略評估 II：綜合所得變異係數分析

這小節進一步從雙元城市的觀點出發，探討臺中市內部是否出現極化的趨勢。對此我們考察綜合所得變異係數做為敲門磚，透過將 2000-2007 年各年度綜所稅

變異係數-1999 年度變異係數，我們得到各區綜合所得變異係數變化折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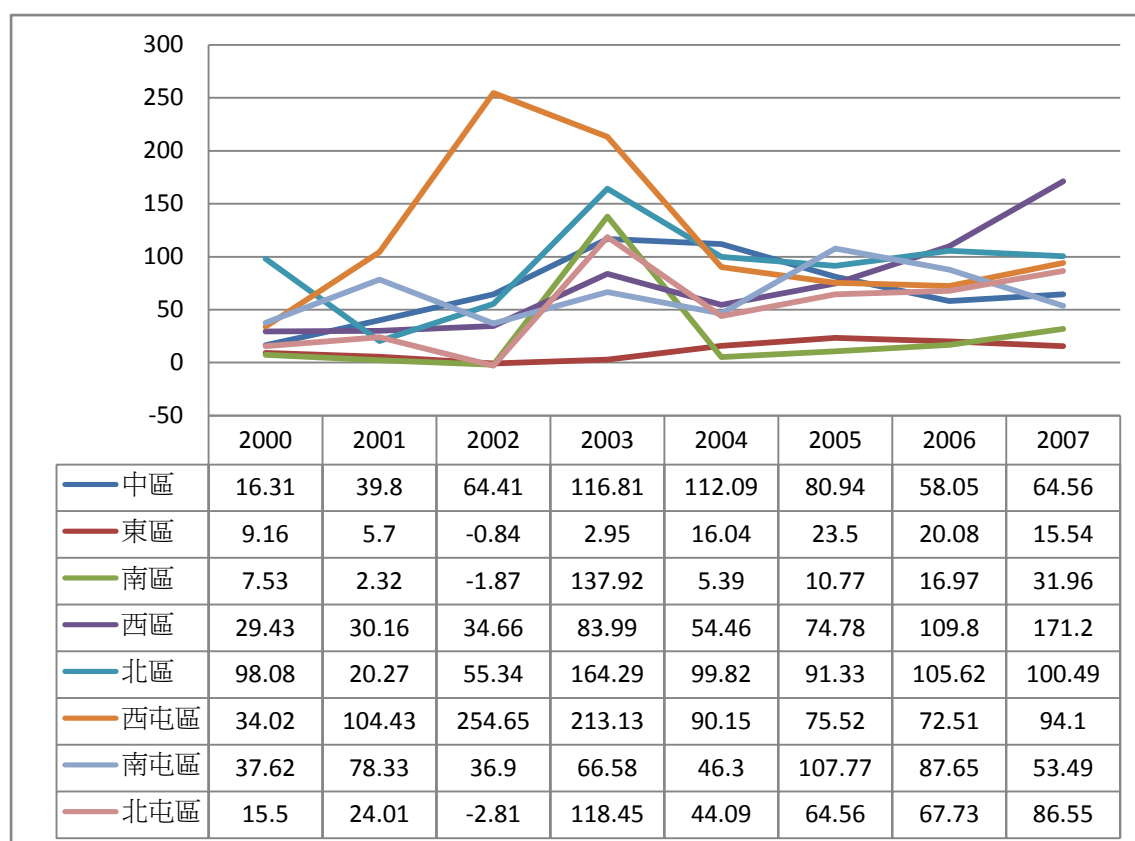


圖 5-11 2000-2007 年各區綜合所得變異係數變化折線圖 (X 軸單位=年度; Y 軸單位=係數值)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從上圖不易看到明顯的趨勢，較值得分析的是西區的綜合所得變異程度穩定擴張，應與該區持續的縝紳化發展有關(透過臺中市市地重劃與文化與空間全球化)。西屯區的變化幅度亦令人側目，特別是 2000-2003 年間該區綜合所得變異程度達到可觀的高峰，此一時期正逢臺中市土地開發的瓶頸期，隨著 2003 年後的房地產景氣復甦，所得變異亦隨之下降，箇中機制或可做進一步釐清。

### 5-3 全球化戰略評估小結

本章試圖探討，透過近十年的全球化相關戰略，台中市的全球化程度是否加深？是否較為接近全球城市的相關指標？以及相關戰略是否形成國外理論與實例中常提到的空間不平等，甚至是浮現都市極化與雙元城市的現象？

有關臺中市的全球化程度和城市位階變化的問題，我們以國外移入做為檢測的指標：就趨勢變化而言，台中市與其他城市之間沒有明顯差異；就組內(大台

中市內部)而言，台中市各區在吸引趨勢上則出現變化，不過傳統市區仍佔據優勢。

有關空間不平等的方面，國外移入指標雖已略有體現，綜合所得稅變異數則更能反映具體狀況：從綜所稅變異係數變化趨勢來看，儘管傳統市區所得變異較大，西屯區的波動卻是最為明顯，同時西區所得變異的擴張亦值得進一步研究。

若將上述現象與台中市近年的全球化戰略交互對照，我們尚無法找到台中市的全球化程度比同級地方政府顯著深化的徵兆，同時卻看到大台中市內部的區域分異情形加劇的情形日益明顯，甚至出現城鄉差距的傾向。表面上，分異的拉力極發生在台中市全球化相關戰略集中投入的區域(三屯與西南北區)，然則比起經濟全球化，其主要機制更傾向於是國內或區域內部的各式資本集中化與重分配的結果。果真如此，城市的成長將很大程度源自於區域本身(都會圈與國族國家)的增長，或者是源自區域內部的競爭。

固然，或許是規模與時間問題，也可能是我們研究自身的侷限，台中市的經濟、文化與空間全球化戰略造成的都市貧窮和極化情形或爭論並不明顯，更難以據此推論空間分異的趨勢是否可能如國外學者所稱將阻斷城市的經濟發展(成長)，進而在空間的脈絡上形成雙元城市(Mooney G.; Danson M., 1997)。

然而透過對台中市發展模式的歷程分析，我們在關注與檢證全球化戰略致力的經濟或文化全球化帶來的「大餅」及社會分異後果之外，也必須注意到隨著各地方政府的相似戰略模式而強化競爭與空間極化趨勢，可能正在重演與 90 年代似曾相識的土地泡沫風險；倘若說有所不同，大概在於此次的風險涉及的面向更為複雜與全面。

## 第六章 結論

### 6-1 總結

直至最近，對於世界/全球城市戰略規劃的討論幾乎集中於世界主要城市。對於經濟全球化的穿透和城市間的競爭，是否也會促使不同國家中的次級城市的願景論述、戰略規劃和致力的市政議程與項目出現趨同(Smith, 2002)，成為我們這份研究的起點。

受限於篇幅與資源，這份研究分成兩大部分。為了釐清全球化、城市發展和城市戰略的相關性，我們占用一章(第二章)的篇幅討論全球化與城市相關議題，從全球化的爭議出發，確立我們的轉型論傾向。進而從轉型論的觀點切入對世界/全球城市的回顧與討論，提出全球化城市論題無論是以客觀或主觀立場出發均能成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為更逼近這份研究選擇之個案，我們快速回顧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亞太國家與城市的困境與轉型。特別是指出它們時常被歸納至「發展型國家」的制度路徑，強調亞太城市發展與戰略深刻鑲嵌於歷史、文化與國家架構形成的路徑；然而我們也試圖指出，對於這些城市，全球化帶來的不僅是困境，視發展型國家與城市的應對戰略，困境還可能會成為城市發展的機遇。

為了研究全球化為城市帶來的各種機遇和影響，此次研究關注的並非國家資源集中投入的重點發展城市(世界/全球城市、全球化城市或首要城市)，而是長期位處世界和國家雙重邊緣的次級城市，於是曾經「幾乎」成為省城，之後做為殖民國家、發展型國家的地方城市—臺中市獲選為我們詳細調查的具體政策區域。我們認為透過對臺中市發展路徑和模式的考察，能夠爬梳、整理出臺中市面對全球化挑戰時採取的戰略根源，以及城市政府意圖進行相關戰略時，身處各種地方性壓力。地方性壓力可能源自於發展型國家的制度限制，也源自於臺中市在地的質疑與抗議，然而我們更試圖指出該壓力、甚至是困境還可能來自過去成功的發展經驗和城市特質。

我們對臺中市發展路徑的討論集中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基於討論的便利，我們策略性的將臺中市的發展路徑分成全球化戰略成形前和全球化戰略成形後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我們從清領時期開始，經日治和國府時期，直到解嚴後的90年代。經由追溯臺中市的發展過程和性質，發現臺中市以土地開發為基礎的發展和政治模式係受各個時期的歷史依循所影響。不同時期的結構性限制以及對這些限制的回應，形成臺中市多樣的都市面貌，以及近似的城市發展性格。

在日治時期，臺中市城市空間與劃平和再建造，深刻反映日本的殖民既受「先進」帝國主義影響，亦深受現代化的衝擊的雙重特質。臺中市的「文化城」風貌一方面是由殖民國所決定，另一方面則是在殖民國刻意容忍下孕育成形的市民空間。國府播遷來臺初期，臺中市的發展在空間上受到壓抑，同時重要的都市計畫遭到擱置。國家體制造成財政與土地的稀缺，一方面令臺中市難以形成戰略性的發展，二方面也造成住屋和空間的稀缺，為日後臺中市的飛躍式擴張構成有利環境。待至 70 年代中後期，國內外政治經濟情勢丕變，震撼迭起，連帶衝擊既有的國家—地方架構。在這一系列變化中，臺中市逐步確立以市地重劃為基礎的發展模式，並形成依附該發展模式的城市成長聯盟。

然而該發展模式亦有其限制條件，以及特殊的臺灣時空環境。向來緊繃的住房需求，加上 80 年代業已積累巨額外匯的民間亟需資金流通的管道，成就臺中市市地重劃點土成金的傳奇。市地重劃本身成本低廉(甚至零成本)，使規劃者與政策執行者或許忽略它的外溢成本，特別是道路建設、治安、文教支出與經常人事費用。其後果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特別是 98 亞洲金融風暴，暴露無遺。

第四章開頭我們使用一節說明臺中市在該時期遭遇的重大震撼和困境。不過同一時期國家層面上的權力下放，為看似喪失活力的臺中市喚起一絲可能性。「文化、經濟、國際城」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走進臺中市的戰略規劃之中。有別於過去已見類似的願景宣稱，「文化、經濟、國際城」有更為具體的相關論述、政策和重要公共建設支持，這些論述、政策與公共建設大多直接反映全球化的核心觀念，一如我們在第二章的討論，故而我們亦將之視作一種全球化戰略。

在活躍於國內外舞台市長的帶領下，臺中市不斷拋出新的國際/全球化計畫與項目，並進行反覆包裝和行銷，某種程度上成功攫取世人的目光。與此同時，是臺中市房地產開發的復甦，特別是重劃區的再度崛起。我們無法論斷重劃區的再度崛起究竟是市政府「文化、經濟、國際城」戰略起到決定性作用，還是受惠於 2002 年後全球經濟的溫和擴張，甚或自 2001 年以降國家長期的刺激房地產政策中得利。但是明顯的趨勢是臺中市全球化戰略的形構與擴張和房地產的榮景彼此呼應，進而互相形構：臺中市的各種文化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戰略與空間(房地產)全球化戰略提供房地產行銷(或曰炒作)的熱門題材。我們除了分析上述三種全球化戰略的項目和內涵，也嚐試指出此一新型戰略，實際上很可能仍是走在與過去相似的發展路徑之上，並且在時空條件互異的情形下，面臨的風險更遠而甚之。

最後本研究嘗試在第五章從相關的數據檢視台中市的全球化程度。按照轉型論的理論建議，我們特別強化時間與空間的向度，透過兩個向度的交叉分析與對

照，著重於展現台中市相對的變化趨勢，而非去除脈絡後的絕對性數值。我們發現台中市的全球化趨勢相較其餘重要縣市並無明顯的差異，其空間分異更多出現在城市內部與城鄉之間。

總結而論，在全球城市的經驗與理論層面上，我們提出對於全球化考察的新視角：從「全球化作為一種計劃」重新審視了全球化與全球城市之間的內在機制，提出方法論和實在論上觀點：

1. 全球城市框架不僅可用於考察當前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以及具備潛力的全球化城市(globalizing city)，對於那些位處城市等級邊陲的次級城市亦有解釋力。
2. 倘若全球化是一種策略，而不是一種「包羅萬象的事件」，我們選擇的個案應能恰當的反應此一論點。
3. 全球化穿透既有的觀念、制度、經濟、文化與技術等多種面向，各個面向對城市發展的穿透程度又深受城市化路徑的依循，進而阻礙城市的趨同，但是在特定面向上可能出現較強的趨同現象。
4. 在戰略計劃的面向上，全球化的力量得到確認(受到「競爭」概念的推波助瀾)，全球化過程已在各等級城市間浮現，並透過各種戰略予以再現/再想像。

在臺中市的全球化戰略之經驗個案上，我們考察臺中市發展的歷史脈絡，結合戰略—行動分析，提出以下的論點：

1. 臺中市的全球化戰略並非完全是當前的產物，而是百年來反覆形塑的政治文化和價值觀的路徑依賴結果。它長期做為臺灣第三或第四大城市，從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其在臺灣整體區域發展的半邊陲地位，同樣在發展型國家危機中面臨轉型困境/機遇。
2. 自日治時期以降臺中市即以市區重劃為主要的利基和發展手段，殖民時期形成的城市發展模式、價值觀與戰略題材影響至今。
3. 為令土地與房市開發得以持續，基於臺中市特殊的地理人文的淵源，構成臺中市「文化」、「經濟」與「國際」的三個基本的發展戰略藍圖。
4. 該發展戰略未有足夠的圖景和論述，因而在土地與房市遭逢衰退之際，很快就遭到放棄。
5. 新「文化、經濟與國際城」的戰略以巨型計畫、文化盛會與土地開發為核心。
6. 為了強化臺中市與國際(城市)的網絡連結，臺中市政府熱衷參與各式國際城市會議，希望能提升臺中市的國際能見度，其戰略對象同時面對國際(旅客、資金)和市民。
7. 當臺中市政府要結合經濟、文化和土地開發等議程時，全球化戰略是有效的政策工具。全球化為城市的成長與發展，提供更為新穎和細緻的願景，它指



引城市透過增加國際能見度的經濟與文化論述和政策，刺激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和都市的擴張。

8. 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和都市的擴張的主要趨力和重組的空間分異現象，大多仍取決於區域內部的資本投入與流動，而非國際資本(受全球化戰略影響)差別投入與增長分異的結果。

臺中市(乃至全國各地方政府)常以願景帶動土地開發，並透過相關工程(市地重劃、道路建設)從中獲益。由於過往發展的路徑依循，土地開發是臺中市政府的主要發展手段，我們在這篇研究中歸結出土地開發作為臺中市政府的主要發展手段的源由：(1)臺中市腹地廣大；(2)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重劃基礎和傳統；(3)發展型國家的「成長意識型態」；(4)多數發展手段和資源為中央政府控制，土地開發(特別是市地重劃)是地方政府少數能自行主導之政策和獲利來源。

該發展模式在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1 年間遭遇瓶頸，特別是 98 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及 99 年的 921 大地震，先是賴以持續成長的主要手段/財源的市地重劃陷入瓶頸，其次是城市願景和戰略失去既定方向。

然而困境也是轉機，發展型國家在該階段前後也面臨權責下放的國際趨勢，在政治地位與職權方面，進行精省與公布地方自治法；財政方面，則有新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和促商法。

國家結構性的改變之外，世界更是產生巨變。在亞洲金融風暴、911 和 SARS 危機後，全球的城市網絡已經成為重要的治理層級，並且提供新興國家的城市能見度更高的機會。

臺中市新領導人抓緊此一機遇，形構臺中市的全球化戰略。該全球化戰略主要目標是增加臺中市的國際能見度，而臺中市的文化全球化則有助於該目標的達成，最終是吸引更多的人流和錢流進入臺中，促進臺中市的經濟全球化。然而在不斷強調全球化、甚至以全球化殖民、抹除城市的記憶時，這座城市仍然無法擺脫面對國家與世界的焦慮，也難以正視自身與生活在此地的人們，以及真正對於成長新的想像。

## 6-2 研究限制與建議

首先，可能需要強化衡量戰略的指標與概念。我們雖然已經在第一章做了定義，卻仍然容易模糊於口號、願景、規劃和手段之中。

第二個問題是本研究的一手訪談不足。儘管研究的一開始就排除訪談法，但是要了解行動者，特別是決策者決策的侷限和觀念的根源(雖然回溯侷限和觀念總是困難的)，才能對全球化戰略進行更有說服力的分析，這也是後續可以加強的部分。

第三個問題基於這份研究的性質，它勢必是一種跨多重領域的研究。雖然大多數領域在相關議題上已累積豐富研究成果，然而受限於研究者的視界甚淺，以及若干資料難以取得和有所缺陷(特別是政府的統計資料)，以致於無法提出更成熟的論點和足夠證據力的推斷。

在後續研究上，應當同時進行更多比較研究，特別是強調臺中市與其他城市之間的競合關係。近年全國各地方政府越來越多相似性質的建設與計畫，應有必要一併討論。

## 參考文獻

### 中文書籍

1. Allen, J.(著), 王志弘(譯), 2009, 〈權力與影響力的城市：定著的形構〉, 出自 Allen, J. (編), 王志弘(譯), 2009, 《騷動的城市》。台北：群學出版社。
2. Appadurai, A. (著), 1996, 鄭義愷(譯), 2009, 《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台北：群學出版社。
3. Castell, Manuel(著), 1995, 夏鑄九等(譯), 1998, 《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出版社。
4. Harvey, David(著), 1989, 〈從管理主義到企業主義：晚期資本主義都市治理的轉變〉, 收錄於 Harvey, D. (著), 王志弘、王玥民(譯), 2010, 《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台北：群學出版社。
5. Held, D.等(著), 沈宗瑞等(譯), 2004, 《全球化衝擊》。台北：韋伯文化。
6. Kotkin, Joel(著), 謝佩姣(譯), 2006, 《城市的歷史》。台北：左岸文化。
7. M. Hardt & A. Negri(著), 2000, 韋本、李尚遠(譯), 2008, 《帝國》。台北：商周出版。
8. Nash, Kate(著), 2000, 林庭瑤(譯), 2007, 《解讀當代政治社會學》。台北：韋伯。
9. Rose, Gillian(著), 2001, 王國強(譯), 2006, 《視覺研究導論》。台北：群學。
10. Said, Edward(著), 1978, 王淑燕等(譯), 1999, 《東方主義》。台北：立緒。
11. Sennett, Richard(著), 1994, 黃煜文(譯), 2003, 《肉體與石頭》。台北：麥田。
12. Urry, J. 著, 葉浩(譯), 2007, 《觀光客的凝視》。台北：書林。
13. 王振寰(著), 1996, 《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
14. 巫永福(著), 2003, 《巫永福回憶錄--我的風霜歲月》。台北：望春風出版。
15. 周美君等(編), 2011, 〈走在光中-張子源先生紀念集〉。台北：財團法人祥和文教基金會。
16. 林左裕(著), 2010, 《不動產投資管理》。台北：智勝文化出版。
17. 邱家洪(著), 1995, 《暗房政治》。台北：日臻出版社。
18. 胡志強(著), 2005, 《市長如店長—胡志強的施政實錄》。台中：台中市政府。
19. 徐世榮、廖麗敏(著), 2012, 〈建構民主人權的土地政策〉, 出自台灣農村陣線(編), 2012, 《土地正義的覺醒與實踐：抵抗圈地文集》。台北：台灣

農村陣線、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共同出版。

20. 黃樹仁(著)，2002，《心牢：農地農用意識形態與臺灣城鄉發展》。台北：巨流。
21. 劉進慶(著)，1984，《戰後台灣經濟的發展過程》。台北：台灣風物。
22. 賴順盛、曾藍田(編)，1989，《臺中市發展史》。台中：台中市政府。

## 中文期刊

1. 王光旭(著)，2005，〈都市計畫審議機制之制度分析：以台中市為例〉，《行政暨政策學報》41:35-80。
2. 王俐容(著)，2006，〈全球化下的都市文化政策與發展：以高雄市「海洋城市」的建構為例〉，《國家與社會》1: 125-166。
3. 王振寰、黃書緯，2001，〈從社會主義城市到世界城市：上海城市調節模式的轉型〉，《台灣社會學刊(26)》：55-104。
4. 何春寰(著)，2004，〈古根漢全球化經營行銷策略發酵：擴張主義與認同危機〉，《博物館季刊》18(4):7-17。
5. 何道明(著)，吳孟樺(譯)，2002，〈台灣大道：為台中串起了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收錄於《康百視雜誌》，2002年9月號。
6. 李建興(著)，2013，〈公益、私利喬不攏 衍生三大爭議：市地重劃開發利益龐大 公設常被犧牲〉，《今週刊》856: 126-127。
7. 李慧菊(著)，1997，〈政府放地，人民更窮〉，《遠見雜誌》127(1)。
8. 周志龍(著)，2012，〈臺灣大都會城市區域競爭與治理之新格局與挑戰：兼論 2010 年縣市合併之後行政區劃問題〉，縣市改制直轄市 2 週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發表。
9. 周素卿(著)，2003，〈全球化與新都心的發展：曼哈頓意象下的信義計畫區〉，《地理學報》34:41-60。
10. 林倖妃(著)，2010，〈專訪胡志強、蘇嘉全：我的台中市願景〉，《天下雜誌》455。
11. 夏鑄九、成露茜、楊友仁(著)，1999，〈經濟危機、國家與都市運動：台灣對亞洲經濟危機之都市回應〉，《城市與設計學報》9/10: 1-56。
12. 馬岳琳(著)，2008，〈台中 自由奔放的創意競技場〉，《天下雜誌》390。
13. 張怡馨(著)，2005，〈發現畢爾包的夢幻奇蹟〉，《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5(5):72-81。
14. 張翔一(著)，2008，〈亞半球創意城市—台中 文化搭台，讓經濟唱戲〉，《天下雜誌》398。
15. 梁任瑋(著)，2013，〈點土成金新推手 地價每坪一萬變十萬 「市地重劃幫」暴富傳奇〉，《今週刊》856: 118-123。
16. 郭揚義(著)，2008，〈從廣告看板「汶來」到「京都」：台中市街道符號與

- 都市地景展讀》，文化研究月報(83)。
17. 陳良榕(著)，2011，〈製造力再起—專注技術創新 精密工業在台中大爆發〉，《財訊雙週刊》380:102。
  18. 陳明通，朱雲漢(著)，1992，〈區域性聯合獨占經濟、地方派系與省議員選舉：一項省議員背景資料的分析〉，《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1):77-97。
  19. 陳覺惠(著)，1999，〈新建築實驗室與 Las Vegas-台中市七期重劃區空間現象觀察、解析與反思〉，《建築師雜誌》1999年5月號:128-139。
  20. 彭杏珠(著)，1998，〈十年一覺台中夢 贏得股市投機名〉，《商業周刊》1998年48期:48-52。
  21. 曾國鈞(著)，2002，〈市地重劃對台中市政治生態之影響(一)、(二)〉，《現代地政》2002年10月號、11月號。
  22. 黃海鳴(著)，2004，〈古根漢美術館的都市再造神話〉，《典藏今藝術》142:129。
  23. 楊欽堯(著)，2009，〈巴爾頓與台中市區規劃〉，台灣文獻館電子報(31)。
  24. 廖坤榮(著)，2005，〈我國統籌分配稅款之制度效能評析與改革〉，國立國父紀念館第二屆中山學術與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25. 劉坤億(著)，2002，〈全球治理趨勢下的國家定位〉，《行政暨政策學報》34:57-83。
  26. 劉東皋(著)，2013，〈台中市地重劃 細節裡很多魔鬼〉，《新新聞》1371: 80-81。
  27. 魯炳炎(著)，2003，〈中央與地方財政法制：立法委員觀點之分析〉，《行政暨政策學報》36=119-154。
  28. 蕭富元(著)，1995，〈雙面夏娃—台中市〉，《遠見雜誌》，114(12)。
  29. 簡博秀(著)，2008，〈趨同與趨異世界城市的範型與世界城市的假說〉，《地理學報》54:27-49。
  30. 藝術家編輯部(著)，2002，〈與藝術競走 打造城市版圖的理想策略〉，《藝術家》55(2):327。

## 簡體中文書籍

1. Cohen, R. & Kennedy P. (著)，2000，文軍等(譯)，2001，《全球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Edward W. Soja(著)，王文斌(譯)，2004，《後現代地理學》，北京：商務印書。
3. Giddens, A. 著，田禾(譯)，2000，《現代性的后果》，譯林出版社。
4. Harvey, David. (著)，胡大平(譯)，2011，《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 Hohenberg & Lees L. (著)，1995，阮岳湘(譯)，2009，《都市欧洲的形成》，上海：商务印书馆。

6. Royle M. & Rogerson R. (著)，郭爱军、周振华(譯)，2009，收錄於《城市研究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7. Sassen, S. (著)，2001，周振華等(譯)，2005，《全球城市：紐約、倫敦、東京》，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8. 余佳(著)，2010，《全球城市：經濟特質與二元勞動力市場》，上海：學林出版社。
9. 周振華(著)，2007，《崛起中的全球城市》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政府出版品與公開資訊

1. 台中市政府，2010，《台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四七次會議紀錄》。
2. 逢甲大學建設學院(著)，2001，《修訂台中市總合發展計畫 2002~2013》，台中：台中市政府。
3. 臺中市統計年報
4. 臺中市統計要覽
5. 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http://www.taichung.gov.tw/>
6. 台中市議會秘書室(編)，1991，《第十二屆第三次大會議事錄》。台中市議會發行。
7. 台中市議會秘書室(編)，1998，《第十四屆第一次大會議事錄》。台中市議會發行。
8. 內政部營建署(編)，〈內政部營建署 2013 年第 1 季住宅需求動向調查結果〉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426&Itemid=54](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426&Itemid=54)

## 碩博士論文

1. 呂靜瑜(著)，2002，《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發展與轉型--從生產網絡的發展到策略性網絡的形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2. 林怡秀(著)，2008，《都市綠園道發展之探討-以台中市為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學系碩士論文。
3. 邱瑜瑾(著)，1996，《解嚴後台中市都市發展型塑的社會機制》。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4. 張嘉玲(著)，2004，《台中市都市空間體系的建構與擴展》。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5. 郭佳綾(著)，2010，《領導風格與城市治理之探討：以台中市長為例》。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6. 陳昀勤(著)，2005，《企圖超越現實的全球流動之夢-台中古根漢美術館論述形構》。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7. 陳昭仁(著)，2006，《民眾對都市公園委託民間經營管理之滿意度研究~以台中市豐樂公園為例》。逢甲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
8. 陳美智(著)，1994，《地方財政之國家與地方菁英影響力的運作機制-台中市個案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9. 湯國榮(著)，1996，《臺中市空間發展政治經濟史考察（1945-1995）》。逢甲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
10. 劉智年(著)，2008，《上海建構全球城市之路徑以 1992-2006 年建設四大國際中心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11. 賴志彰(著)，1996，《投機城市的興起--戰後台中市都市空間轉化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12. 魏蓉華(著)，1991，《日據時期台中都市發展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英文書籍

1. Albrow M., 1996,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 Cohen R., 1981,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rban hierarchy*, in Dear M and Scott A J ed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Methuen, New York and London), pp. 287-315.
3. Dicken, P. 1998, *Global Shift, 3rd edition*. New York: Guilford.
4. Foucault, M. 1997, *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living*, In P. Rabinow (Ed.), R. Hurley and others (Trans.).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one, Ethics* (pp. 81-85). London, UK: Penguin.
5. Hall, P , 1966, *The World Citie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6. Hutton T., 2005, 'Servic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Service Industries and Asia-Pacific Cities: New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edited by Daniels P., Ho K., Hutton T., Routledge.
7. Hymer S., 1972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Bhagwati J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Macmillan, London, pp. 113-140.
8. Jewson N., Macgregor S. ed., 1997, *Transforming Cities*, Routledge.
9. Markusen et al, 1999, *Second Tier Citi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0. McMichael, Philip. 2004,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A Global Perspective. 3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11. McMichael, Philip. 2005, *Globalization*.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 State, Civil Societies, and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Thomas Janoski, e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587-606.
12. Neil Brenner & Bob Jessop & Martin Jones & Gordon Macleod, 2003, *State/Space: a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13. Newman. P. & Thornley. A. 2005, *Planning World Cities: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14. Porter, Michael 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15. Pred, A, 1977, *City-Systems in Advanced Economies*. London: Hutchinson.
  16. Scott, Allen edited,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New York: Oxford.
  17. Taylor, P J, 2003,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in Johnston R. and Williams M., ed., *A Century of British G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Martin A., 1996,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9. World Bank, 2000, *Cities in Transition: A Strategic View of Urban and Local Government Issues*. World Bank (worldbank.org/urban).
  20. Wu, Nai-The,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英文期刊

1. Burawoy, M., 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6:1 March 1998:26.
2. DiMaggio, P. & Powell,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147-60.
3. Douglas M. 2001, Land conflict of the Cotabato Manobo people. *Philippine Studies* 49:215-235.
4. Douglas M. 1998,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ECHO Agricultural Missions Conference, North Ft. Myers, Florida. November 10-12, 1998.
5. Friedmann J.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69-83
6. Geoffrey, Garrett, 1998, "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787-810.
7. Guillen, M. 2001, "Is Globalization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A Critique of Five Key Debat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235-260.

8. Harvey D., 1978,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ume 2, Issue 1-4, March-December 1978: 101–131.
9. Heenan DA , 1977, 'Global cities of tomorrow',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55: 79–92.
10. HILL, R. C. and KIM, J. W. 2000, 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al states: New York, Tokyo and Seoul, Urban Studies, 37:2167– 2195.
11. Sassen S. 2001, '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alist States: How to Derail What Could Be an Interesting Debate: A Response to Hill and Kim'. Urban Studies, Vol. 38, No. 13:2537–2540.
12. Smith, N. 2002, "New globalism, new urbanism: Gentrification as global urban strategy", Antipode, 34(3): 427-450.

## 日文書籍

1. Kevin Lynch & Yi-Fu Tuan , 北原理雄等(譯) , 1974 , 《時間の中の都市 内部の時間と外部の時間》 , 東京 : 鹿島出版会。
2. 山本剛郎(著) , 2001 , 《地域生活の社會學》 , 兵庫 : 關西學院大學出版社。
3. 篠原正巳(著) , 1996 , 《台中・日本統治時代の紀錄》 , 財團法人 台灣區域發展研究所台灣文化研究所。
4. 小田亮(著) , 2001 , 〈都市と記憶喪失について〉 , 2008.01.16 取自 <http://www2.ttcn.ne.jp/~oda.makoto/toshi.htm>

## 新聞報導

1. 白錫鏗 , 2011 年 11 月 11 日 , 〈審建照索賄百萬 廉政署起訴教授〉 , 2013 年 6 月 22 日取自聯合報。
2. 唐在馨 , 2010 年 10 月 21 日 , 〈誰殺了古根漢? 民進黨斥胡說謊卸責〉 , 2013 年 6 月 22 日取自自由時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oct/21/today-center6.htm>
3. 張明慧 , 2013 年 5 月 24 日 , 〈重大建設全委外? 中市議員痛批市府〉 , 2013 年 6 月 22 日取自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4/7918068.shtml#ixzz2Wx5xMbBO>
4. 張明慧 , 2013 年 6 月 22 日 , 〈1 人決策? 光之塔變廢鐵 台中市長要究責〉 2013 年 6 月 22 日取自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4/7979679.shtml#ixzz2WvWq68rj>
5. 陳榮昌 , 2013 年 5 月 28 日 , 〈中市書籍五都最少卻號文化城 民代抨擊指

- 汗顏〉，2013年6月22日取自NOWnews 今日新聞網  
<http://www.nownews.com/2013/05/28/11689-2944197.htm#ixzz2Wz8X4foy>
6. 喻文玟，2010年8月16日，〈世界的大台中 胡推競選看板〉，2013年6月22日取自聯合資料庫。
  7. 廖本福、楊佩純，2001年11月26日，〈準市長談政見 胡蔡針對色情 張溫鷹談違建〉2013年6月22日取自NOWnews 今日新聞網  
<http://www.nownews.com/2001/11/26/10140-1227651.htm#ixzz2WvbenDt3>
  8. 劉秀英，1999年3月27日，〈中市工地大促銷 400 台北人捧場〉，2013年5月21日取自聯合資料庫。
  9. 蔡智銘，2013年1月8日，〈胡志強口號多「像玩模擬城市」〉，2013年6月22日取自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108/34755699/applesearch/%E8%83%A1%E5%BF%97%E5%BC%B7%E5%8F%A3%E8%99%9F%E5%A4%9A%E3%80%8C%E5%83%8F%E7%8E%A9%E6%A8%A1%E6%93%AC%E5%9F%8E%E5%B8%82%E3%80%8D>